

#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鶴見俊輔  
邱振瑞 譯



鶴見俊輔

#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邱振瑞 譯



鶴見俊輔

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1931-1945



263 261 241 219 199

原子彈的犧牲者

戰爭的終結

回顧

後記

解說

加藤典洋

## 致台灣讀者序

本書呈現在台灣讀者之前，首先，我要以日本本地住民的身分，向一八九五年起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灣表示歉意！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這本書為了呈現當時至今住民的記憶，以及作者的愧疚，雖然論述得並不充分，但我仍努力把台灣、朝鮮、千島群島、庫頁島和南洋群島這些地方納入本書的範疇。

在移住台灣斯土成長的日本人之中，尤其在戰爭時期的日本有獨特功績的人並不多見。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些人——特別是尾崎秀實和埴谷雄高。孩童時期，他們始終無法理解包括自己父母在內的日本人為什麼不能善待殖民地時期的台灣人民？即使他們返回日本，這個記憶仍未消失。在日本的知識人之中，他們二人終其一生的活動，在精神深處顯然都烙印著殖民地（台灣）的記憶。

日本政府以戰爭為目的的「解放大東亞」，把台灣、朝鮮、千島群島、庫頁島和南洋群島的住民全納入日本的支配之下，但現今的日本政府卻昧於事實，日本國民也故意視而不見。

大東亞戰爭戰敗後的情況又是如何？整個日本仍在持續自我矇蔽。換句話說，日本人沒有對此做出清醒的反省之前，恐怕很難跟世界居民做密切的交往吧。正因為我見證過戰爭時期至戰後的種種經歷，所以我如此堅信。

正如拙著續篇《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揭示的那樣，與戰前的日本文化比較起來，戰敗後的日本文化特色在於對金錢和慾望的解放。在這股潮流中，邱永漢的賺錢術以及謝國權的男女性關係論的著作都帶給日本國民巨大的影響。儘管日本的作者也在同領域發表諸多著作，然而邱、謝二人的著作，顯然要比日本在地者的論述出色得多。其論點獲得讀者青睞的原因在於，他們並沒有把賺錢或男女的性關係建築在人壓榨人的基礎上。現在，縱使他們在日本文化論述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其著作中仍存在著長年來飽受日本人打壓的苦悶餘緒。

雖說日本和台灣同屬於漢字的國度，但對漢字意涵的掌握卻不相同。在此謹向克服箇中艱難、翻譯拙著的譯者致上謝意。

寫於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鶴見俊輔

## 導讀

李尚霖（開南大學應用日文系）

### 戰爭、現代日本、以及鶴見俊輔

一九四五年，日本對美投降，二次大戰宣告結束。然而，戰爭雖然結束，如何回顧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歷史，在日本國內始終是個問題。而這問題延伸到東亞的地緣政治上，更變成一顆隨時會被引爆的炸彈。最為典型的例子，便是二〇〇一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首次參拜靖國神社後，引發國際社會的一片嘩然；小泉此舉，同時，亦在日本國內引起了所謂的「靖國問題」，激盪出一連串的討論。



然而，在有關於「靖國問題」的激烈論辯中，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跳出正反意見的對立，指出「靖國問題」的最大問題，在於一般日本民眾不曉得「問題」在哪！他指出，由於能正確理解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為何會成為問題的日本人不多；因此，能明白問題所在並擁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參見高橋哲哉《靖國問題》，筑摩書房，二〇〇五年四月）。

高橋哲哉所點出的這個問題，由漫畫家小林善紀的作品《戰爭論》及《台灣論》這些肯定日本「大東亞戰爭」的著作在日本暢銷一時，可大概管窺一二。日本對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的世代，一般稱為戰後世代。或許是有感於戰後世代對戰爭的陌生與無知，二〇〇三年日本文化界邀請了分別任教於東京大學、慶應大學的上野千鶴子與小熊英二，由這兩位隸屬戰後世代的學者，以三天的時間，密集訪問一位戰前出生的學人，請教他對戰爭的看法，以及對日本近、現代史的體悟，而後集結成書。而這位代表日本戰前世代接受訪問的學人，正是本書的作者鶴見俊輔（參見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合著《戰爭が残したモノ》，新曜社，二〇〇四年三月）。

鶴見俊輔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十五歲時前往美國留學，就讀哈佛大學哲學系。鶴

見俊輔家世顯赫，父親鶴見祐輔、外祖父後藤新平，均是日本政界的大人物。然而，這樣的家世背景似乎既是他的資產，同時也是他的壓力。鶴見俊輔自陳年少時乃「不良少年」，父母親由於見他無法適應日本的教育環境，始將他送往美國留學。留學期間，美日開戰，他因無政府主義的傾向被美國政府逮捕，並於拘留所內完成畢業論文。

鶴見俊輔可說是日本現今少數可以稱得上「思想家」三字的學者之一；他與丸山真男、竹內好、吉本隆明等日本重要的知識分子，都有互動往來。鶴見俊輔除了著作等身之外，《思想之科學》這本影響戰後日本深遠的雜誌，亦是由他主導創刊。對戰爭的反思，一直是鶴見俊輔的一項重要職志。值得一提的是，鶴見俊輔除了勤於筆耕之外，同時也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六〇年代他參與日本國內反越戰運動；九〇年代，他參加從軍慰安婦之求償運動；而二〇〇四年六月，他更參與「九條會」的發起工作。日本憲法第九條明文宣示放棄戰爭、不行使武力等主張，近年日本右翼團體思忖修改憲法第九條。而所謂的「九條會」，其成立宗旨便在於反對日本右派團體修改憲法第九條的企圖，以維護現今日本憲法和平主義的精神。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鶴見俊輔並非學術象牙塔裡的學者；他除了學者的身分外，同時也是個身體力行的社會運動家。

「轉向」與「非轉向」

本書，即是鶴見俊輔早年的代表作。如何理解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戰爭？一般日本史學界將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的軍事行動區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即一九三一年的滿州事變，一九三七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以及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太平洋戰爭。但鶴見俊輔首開風氣，將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一連串戰事，視做一個整體，稱之為「十五年戰爭」。此十五年戰爭之史觀，由於能相當程度地掌握滿州事變後日本軍事擴張行動的內在關係，而有助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理解與批判，因此被廣泛採用。本書所討論的時代背景，即是這十五年戰爭時期。

如何捕捉與解析這十五年戰爭期間日本人的精神軌跡呢？作者的研究方法是將分析重心放在所謂的「轉向」現象上。「轉向」這字眼在日文中具有特殊的政治涵義。書中提到「轉向」二字在日語中之所以普及化，乃是因為一九三三年日本共產黨的重要幹部佐野學與鍋山貞親發表「轉向」的共同聲明，宣佈放棄以往反天皇制及反殖民主義等主張，轉而支持日本國策。而對戰前日本知識分子之「轉向」，歷來因研究者的不同而各

有不同之定義。在這裡，鶴見俊輔定義「轉向」為：「由於國家強制力行使的結果，造成個人或個人所屬集團發生思想上的變化。」

而為何國家權力會要脅知識分子，迫使知識分子「轉向」呢？作者認為此一現象的產生，可歸咎於日本之文化性格以及天皇制國民國家的設計上。作者指出日本江戶時代實施的鎖國政策，對爾後的日本文化性格，有著重大的影響。文化上的鎖國性，乃是因為二百多年的鎖國政策，造成日本人一方面安於自己國境之內的生活，產生了內部具「自我完結性」的感情迴路；而另一方面，與情感無直接關係的思考邏輯面，則深受外來優勢的文化與語言影響。

而這樣的鎖國性格，也影響到明治時代打造日本近代國家體制的設計師們。作者指出，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新政體，可分為顯教部分與密教部分。顯教部分尊崇日本自古以來的天皇制，以天皇為國家象徵；密教部分則取經於西方文明，以近代國民國家體制為宗。這樣的設計，是為了方便一邊在情感上統合日本傳統社會，一邊學習西方，以求迎頭趕上。

而如此的政治企圖之所以能夠成功，「國體」這一概念發揮了極大的功用。書中提到，「國體」二字最早出於幕末吉田松陰與山縣大華的論爭中。吉田松陰以「國體」二

字來指稱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精髓；山縣大華則否認這種觀點，認為如果真有「國體」這種東西，亦應是普世皆具，各國都有各自的「國體」，不應是日本特有的東西。

「國體」這一概念雖在誕生之初，並未受到全面的肯定，但在明治維新之後，卻成了維繫新政體於不墜的重要概念。作者指出，「國體」這概念，在明治維新以後演變成用來指稱當時日本政治體制的特殊性。也因此，儘管明治以後日本採行西方的國家體制，但「國體」這個概念，卻讓一般民眾產生明治以後的政治體制還是古代天皇制家天下的錯覺。

如此的顯密雙重結構，雖然成功地讓日本一舉躍入世界強國之林；但不幸的是，代表西方理性的密教部分，卻在日本國內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擴張的狀態下，逐漸被顯教部分天皇至上的主張吞沒。在這樣的背景下，「轉向」的現象於焉產生。日本知識分子在國家權力的壓迫下，有的投降、有的堅持、有的部分妥協；作者便是透過比較這些「轉向」的不同案例，來追溯與反思日本十五年戰爭期間的精神史。

然而，在作者提供史料，告訴我們大批日本知識分子在國家的壓迫下被迫「轉向」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又呈現一些不肯與政府多做妥協、頑強的「非轉向」典型。而這些

「非轉向」的典型，卻多非知識分子，多半是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下層階級；有的是忠於自己宗教信仰的民間人士，有的則是混跡於日本社會最底層、但求溫飽的朝鮮族勞動者。

作者在書中引用日本左派知識分子中野重治的小說《村中的家》，為日本知識分子與民眾在面對「轉向」時態度上的差異，下了一個鮮明的注腳。中野重治本身亦經歷過「轉向」的痛苦經驗，這本小說也可看做是他個人對「轉向」的反思。小說的主角出身於日本沿海農村，大學畢業後參加左派政治組織，後來被捕入獄，在獄中被迫簽署「轉向」聲明。小說的主軸便是圍繞著主角和父親在面對「轉向」這行為時態度上的差異。主角在獄中儘管遭受拷問、禁錮，但並未因此出賣自己的友人和同志，亦並未承認自己在思想上有所偏差，只是向政府承諾不再從事政治活動。但對主角父親來說，這樣子還不夠，他認為既然兒子身為組織的領導者之一，兒子便有責任為貫徹自己的主張而死，因為有無數青年為呼應他的主張而遭受迫害！但主角卻想保留有用之身，以另一種方式反抗政府；回到家鄉後，主角繼續從事寫作，批判政府。但主角的父親無法認同主角這種慎重的政治謀略，認為主角既然無法為自己選擇的信念而死，便沒資格再提筆寫作，這才是做人的道理！

## 國家權力、知識分子、民眾

戰前的日本政府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大力美化、宣傳與敵人同歸於盡的「玉碎」思想之外，亦運用所謂的「鄰組」組織，讓百姓互相監視彼此。在這樣的狀況下，作者一方面以「轉向」的知識分子精神、行動上的掙扎、變化為中心，來描繪戰爭時期日本的精神史；另一方面，卻也視日本下層民眾為「非轉向」的典範，似乎不懂複雜政治謀略、只知道簡單的「做人的道理」的民眾，才能真正抗拒極權的壓迫。書中，作者雖未直接對日本知識分子有何批判，但這種對照性的春秋筆法，可以看出作者對日本的知識分子有相當程度的失望。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作者的這種隱喻式的批判並非只是情緒上的抒發或只是感傷，而是有其學理上的根據。

他以「東大新人會」這個東京大學的校友會組織告訴我們，知識分子，不管是支持政府的也好、反對政府的也罷，其實除卻他們的政治立場，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很可能都是同一路的人。因此，作者指出，明治維新所造就的日本新知識分子，其實是一種學歷社會下的新「身分制度」。引進西方文明的結果，雖使得西化的日本新知識分子在日

本社會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造成日本知識分子在反抗國家權力時無法徹底、大量「轉向」，因為日本近代知識分子在權力結構上與國家權力極為接近。因此，在國家權力擴張無度之際，日本社會中真正能挺身對抗到底的，往往不是知識分子，而是下層民眾。

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下，作者一方面重視因宗教、民族因素而抵抗國家權力的下層民眾；另一方面，亦大力讚揚戰前沒有投票權的日本婦女。在討論戰時日本的日常生活一章中，作者敘述戰爭末期，由於大半男丁都被國家徵召，日常生活百般大小事，全賴婦女張羅。作者指出，由於戰時日本配給制度的不合理，日本婦女不得不從事黑市買賣，違反國家法律，以維持一家生活所需。他讚揚這些婦女，「避免與現存國家秩序正面衝突，但仍遵守超越公認秩序的道德與習慣」（參見本書頁一八四）。而這種「超越國家公認秩序的道德、習慣」，在作者看來，似乎正是日本未來的希望所在。作者指出，戰後的日本各地出現自發性的反政府運動，而這種非由知識分子主導的運動，「已由內部衍生一股力量，要與向來代表日本文化特徵、此後也將留傳後世的鎖國性格戰鬥下去」（參見本書



## 小結

作者受過嚴謹的哲學思考訓練，本書可能的缺失，諸如以近、現代史為研究對象時所面臨的困境、「轉向」研究的侷限等等，作者已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中，盡皆夫子自道，筆者在此不用贅述。然而，即使本書如作者自述，在史料的抉擇及方法學上存在若干問題，但在探討日本思想史與精神史的研究上，本書的重要性卻是毋庸置疑的。

本書的特殊之處，首先，在處理「精神史」這一看似專屬文化菁英的題目時，作者除重視在文化上佔有發言權的知識分子之外，觀照的對象亦擴及一般民眾。這種在思想史研究上注重民眾思想、精神的態度，乃是戰後日本學界在歷史研究上的一大突破。二戰結束初期，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在日本的歷史學的研究中舉足輕重，佔有領導地位；然而，一九六〇年代以後，色川大吉、鹿野正直、安丸良夫等日本學者，對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過度強調上層結構的歷史觀，抱著強烈的不滿與懷疑，起而發掘底層民眾的思想和精神。

其中，色川大吉的著作《明治精神史》在一九六四年問世。在這本探討明治時代

日本精神史的著作中，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等明治時代日本的大思想家被略而不提，整本書徹頭徹尾都是以民眾及地方的知識分子為中心書寫而成。色川大吉在書中自陳，他之所以要以「精神史」為名，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與狹義的思想史做區別。他認為所謂的「思想」，乃經過體系化，是純度較高的思考結晶物；而所謂的「精神」，則是指潛藏在社會底層，未經分化的意識，換句話說，也就是民眾未經組織化、規範化的生活意識（參照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下，講談社，一九七六年八月，頁三三八—三四七）。色川大吉的這本著作，可說是日後類似研究的先驅之作。

本書以「精神史」為名，重視包括朝鮮族在內的日本底層民眾，視他們為「非轉向」的典型，凡此種種，在在都顯示受到色川大吉的啟發。而以戰前日本知識分子的「轉向」為主軸，透過拋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西方理論的日本知識分子，藉由他們的行動與思想，來思考戰爭時期的日本精神史。這種手法，則衍生自鶴見俊輔早期與久野收、市井三郎等人合作的「轉向」共同研究。

五〇年代前半，鶴見俊輔與上述久野、市井等人合組「思想的科學研究會」，開始了長達七年之久的「轉向」共同研究。這項研究以實證的調查為主，密集地搜羅了有關

戰前日本知識分子「轉向」的各種史料；而後，研究成果集結成三大冊，在一九五九年開始陸續出版成書。而這由鶴見俊輔主導的共同研究中，有關「轉向」的定義，正與本書相同，認為所謂的「轉向」乃因國家權力的強制所造成的思想變化。

此一定義對日本有關「轉向」的理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此之前，日本對戰前左派知識分子「轉向」的理解方式不外兩種。一種是站在政治的立場，認為這些知識分子背離了自己原本的政治主張，是日本共產黨的「叛徒」；另一種則是站在倫理道德的立場，認為這些屈服於戰前法西斯政權的左派知識分子，亦必須擔負起部分的戰爭責任。在這樣的狀況下，鶴見俊輔所揭櫫的定義，成功地擺脫了有關「轉向」的政治及道德束縛，讓「轉向」這一歷史現象，有機會回到歷史本身，開啟了「轉向」研究的多樣可能性。

本書日文原版出版於一九八二年，至今在日本仍再版不輟。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間，鶴見俊輔於加拿大馬奇爾（MCCLELLAN）大學以英語講授日本近現代史。本書即是他在加拿大授課時的講稿改寫而成。鶴見俊輔在這本書中如同大匠揮斧般，大開大闔又不失細膩，將複雜糾結的戰爭時期日本歷史，以概述又不失嚴實的方式，交代給對這段歷史不

甚熟悉的讀者。本書曾獲得朝日新聞社第九屆大佛次郎獎的肯定，可說是本兼具學術與啟蒙價值的好書。

鶴見俊輔在加拿大的講學即將結束時，據說曾寫下了荀子的「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幾個字，以明己志（參見本書加藤典洋之〈解說〉，頁二六九）。在回顧過去國家權力過度擴張的年代，如果僅站在政治或道德的立場去思考過去，往往容易陷於以今非古的迷思之中。這點，不論是日本還是台灣，情況都是一般無二。唯有信其可信，疑其當疑，才有辦法就歷史論歷史，才能夠真正理解過去的歷史。鶴見俊輔這種治學的態度，值得現在思考與關心台灣歷史和文化問題的人們參考學習。

編輯說明：

- 一、本書根據岩波書店二〇〇一年之單行本譯出。
- 二、原注之註解標號以阿拉伯數字（1. 2. 3. ……）標示次序，譯注則依序分別以\* # ※ § ◎符號表示。
- 三、本書中以（）表示者，為譯者的補充說明。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向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趨近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

從現在開始，我要談論的主題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精神史；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先說明幾點隨想。

首先是語言問題方面。由於以下談及的事物大都發生在日本，所分析的思想，原本也以日語表述。現在，由於身處在這使用另一種語言的國度，於此，我打算揚棄對日語的依賴，試著鋪衍論述。我想在這裡建立一個我們之間的共通規則，亦即只用英語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然而，我選定的這種方法，旋即令我，乃至我們陷入一個困境之中。怎麼說呢？我抱有一個信念，這信念雖說在邏輯上難以成立，但卻可以得到統計上的支持。那就是，說英語的日本人不值得信任。一九四五年至五二年美軍佔領日本的期間，我曾就此再三向遇見的美國人說明。因此，對我來說，我希望各位在我試圖談論日本之

際，對我所說出的話，都能稍打折扣，再予思考。隨著美軍佔領日本的時代的遠颺，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的記憶也逐漸淡遠，英語侵入日語之中，因此現在日本的日常生活充斥著源於英語的語彙。在報紙的廣告中，我時常可以看見類似「シックなドレスのファッションショー」\*的語彙。這句廣告詞中，源於日語的單字只有「な」和「の」兩個連接詞而已。

再舉一例。有個美籍學者研究日語多年之後來到日本，某天在圖書館閱讀日本的綜合雜誌時，他碰到一個無論如何翻查字典、任憑想像仍不得其解的語詞。他抄下那句語詞，請教日本的學者。原來就是這句「ヒット・アンド・ラン」\*。片假名讓他百思不解。由於這些語彙的使用，已超出原本的語意脈絡，若非日本人在很難了解。現今，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外來語俯拾即是，因而我還是堅信先前我所說的「信念」，是有某種根據的。

在我看來，借用歐化語言的表述，未必意味著思考本身的歐化。但由於在短期間內，從歐洲語言中借用如此之多的語彙，就某種意義而言，現代的日本人可說也變得難以了解自己。確實，在某個層面而言，我們已經失去自覺自身思維方式的理路。

第二，我想強調的是，我希望這門課成爲一種開端，藉此讓我們理解戰爭期間日本



發生了什麼，日本之外的地方又發生了什麼，以及非戰爭期間的時代，日本和日本以外的地區發生過什麼樣的各種狀況。在日本，「轉向」一詞，最早出現在一九二〇年代，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之後已被廣泛使用。這個字眼並非源於歐美的語彙，它是在日本戰爭期間的政治氛圍中，所衍生出來的語詞之一，而這個概念也對十五年戰爭期間，日本的知識和文化的走向有重大影響。這一語詞的形成，除了能以世界精神史的範疇來討論之外，亦可從其中發現日本獨具的特徵；因而從其形成的模式中，我們有可能從中爬梳出一些端緒，藉此理解日本以外、世界其他各國的趨勢，及其與「轉向」事件的關係。亦即透過這個理論模式，可以讓我們理解到，對當今世界局勢的努力，有實踐的可行性。

\*意為「時髦服裝秀」。 #Hiraudun, 打帶跑。

1. 為了方便授課，我省略掉參考文獻的出處，現在以「注」的形式補充一些。

我探討「轉向」的文章得助於「思想之科學研究會」編的《共同研究·轉向》上·中·下（平凡社，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甚多。此書的改訂增補版（平凡社，一九七八年）由共同研究的成員自行修正觀點並評定新資料。對增補版提出批判的是出席我這門課程的學生，他先用英文撰寫，後來用日文發表。從這批判中，我受益良多。（辻信一〈轉向論の新しい地平〉上·下，《思想の科学》一九八一年五月号、六月号）。

這種批判是從筆者居住的加拿大亞洲少數民族間的轉向經驗中所得，鮮明地展現出轉向研究可能存在的各種觀點。

在「思想之科學研究會」的共同研究之前，已有本多秋五的《轉向文學論》（未來社，一九五七年）與共

第三，在文化史和精神史的研究方法中，那些被當成脫離標準範式的現象，反而更能表現出該社會的文化特徵。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日本所發生的事情，不能視為明治初年以來，近代日本史中的一個偶發事件而加以抹煞。仔細探討的話，它既告訴我們諸多值得積極繼承的事物，又揭示許多我們應該否定的東西。我們是經由錯誤成長，並且是經由自覺到我們所犯的錯誤中，包含的真理與價值而成長。

第四，以歷史的區分而言，我們在此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肇始，設定於一九三一年中日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二年日本的陸軍領導者在中國的滿洲開啟戰端，並進而在這個地區建立日軍的傀儡政權。這種方法對整個世界而言，實乃前所未見。因而後來也導致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國的希特勒都加以仿效。因此我們可視一九三一年始於中國東北地區的中日戰爭，為一個全新趨勢的開始，影響著整個世界。如此，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的日本歷史，對全世界而言雖說不過是地方史，但已然成為二十世紀日本史與世界史連接的一個環結。

同研究同時進行的論述，對我們最具衝擊的有吉本隆明的〈轉向論〉（《芸術の抵抗と挫折》未來社，一九五九年）。

2. 有關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的戰爭時代，到底是日本近代史上不太重要的時期？抑或是理解近代日本的重要時期？已成為現代日本論的爭議點之一。關注的焦點不同，所走的路線自然不同。

一九六三年，我當時任職的同志社大學曾邀請美國大使賴肖和（Edwin O. Reichenauer）舉行討論會，針對賴肖和主張儘量不要把一九三一至四五年看成是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觀點，我曾提出若干異議。由此看來，美國統治階層的觀點和日本統治階層的觀點，在這一點上幾乎一致。當時出席的有：歐第斯·凱利、賴肖和、豬木正道、坂田吉雄、鶴見俊輔等，會議紀錄（日本の民主主義——過去・現在・將來）刊載於《日米フォーラム》一九六三年六月號。

\*即「九一八事變」。

3. 在我的童年時代，戰爭的訊息紛沓雜來，比如九一八事變爆發、上海事變爆發、中日事變爆發、大東亞戰爭爆發等等。從主觀上掌握訊息容易造成戰鬥行為是零散進行的錯覺。我是在戰後才覺得（這種印象）有點奇怪，因此，我認為把它當成有其連續性的戰鬥行為比較接近事實（不是我意識上的事實）。如此大言不慚，又盡舉些小事論證，實在有點惶恐。不過，當時大為暢銷的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合寫的《昭和史》（岩波新書，一九五五年）的書腰上，標出「短短三十年，我們經歷兩次戰爭！」的警語。我認為這樣看待昭和史並不妥當，於是寫了一篇文章〈日本知識人のアメリカ像〉（《中央公論》一九五六年七月号），批判這本《昭和史》的書腰文字（不是批判內容），希望在現代史中把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的戰爭界定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我想出「十五年戰爭」這個名稱，得自於西格蒙·諾依曼（1904-1962）著、曾村保信譯《現代史——未來への道標》（原著，一九四六年；日譯本，岩波書店，一九五六年）這本書的啟示。這本書用「三十年戰爭」一詞，來指稱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整個時期。後來逐漸有人開始使用「十五年戰爭」一詞。正如家永三

第五，我也想談談十九世紀日本向西方開放門戶之後，流傳於西方各國的日本情趣。當時，寫過日本的有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 1850-1904），以及里奇（Bernard Leach, 1867-1979）等。雖說此外還有許多人，但其中我對陶藝家里奇最感興趣。他是少數對日本不失青年時代之熱情，對日本文化不表失望的人物之一。至少，他跟同為英國人的張伯倫和小泉八雲相較，對比強烈。這其中似乎包含幾個理由。

理由之一，在於里奇很早就對中國文化和朝鮮文化抱持一份親密感；亦即他在親近日本文化的同時，也對中國文化和朝鮮文化抱有一份親密感。因此，他很早便擁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將日本文化視同中國文化、朝鮮文化，加以吸收掌握。正為如此，日本文化對里奇而言，才不致於突然從某個時期開始，由原本的清純，轉變成醜陋、可厭。

由朝鮮審視日本，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令人厭惡的一面；從中國看日本，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淺薄的一面。來自其他的外國研究者，大都從自己停留的日本經驗來研究日本，所以當他們把目光投向中國或朝鮮時，難免對日本文化感到失望。當然，倘若外國人對日本的興趣僅僅是出於異國情調，他的愛好與觀點必然維持在其出生國所受的各種文化

薰陶；在這樣的情況下與日本文化的接觸，只是在其原本的各種價值觀上，蒙上一層日本文化的外衣，整個內涵依然沒有改變。這樣一來，難免會在某個時期對日本文化突然感到失望，或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正。然而，如果認為接觸另外一個國家的文化極為重要，同時有意把這異國文化的異質價值，納入自己原有的文化價值體系中，抱持這種信念的人，其接觸日本文化的方法，便是將日本文化與朝鮮文化、中國文化以及其他亞洲各國的文化並置，同時放入視野中。如此，應較能掌握日本文化的真貌吧。這個理解日本的方案，是在空間的架構下，將日本與朝鮮、中國結合，一起思考；倘若要再加上與此相對的時間架構，那為了理解現在的日本，掌握日本在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漫長爭戰中的歷史背景，就變得至關重要了。

郎在《太平洋戰爭》（岩波書店，一九六八年）序言中所述，他就是採取「十五年戰爭」這種劃分法。

至於我為什麼使用「十五年戰爭」一詞，我在《日本知識人のアメリカ像》一文已經表明，亦即把太平洋戰爭或大東亞戰爭看成是對美國的戰爭並不恰當，因為這種戰爭觀點無法掌握這次戰爭的結構，而且這樣會使日本人淡化戰爭的責任。

根據目前調查，最早使用「十五年戰爭」一詞是《知識人の戰爭責任》（《中央公論》一九五六年一月号）這篇文章，解釋其創詞來源的是拙作《日本知識人のアメリカ像》（《中央公論》一九五六年七月号）。

我想先從缺點方面，清楚表明我對主題的趨近方法。在這門課程中，無論是資料或詮釋上都存在著各種缺陷，請各位特別留意。

我先談談資料的問題。研究現代史，要達到蒐集所有必備資料加以檢證的嚴密基準，可說是相當困難。相較之下，古老時代的歷史似乎較有嚴密的基準，因為重要的文獻大多已經散佚。如果是中世紀史，它在研究上似乎比現代史容易達到完美的境地吧。但僅憑這樣就說中世紀史的研究對照於中世紀的實際狀況已臻於完美如實之境，那又令人存疑。若單就留存於世的資料而言，或許我們可以讀盡現存的所有文獻；而根據這些資料寫成的記述，其撲顛難破之處，更是現代史研究所難望項背的。然而，現代史研究，包括文化史和精神史，甚至連想要達到字字難以推翻的自我滿足的境界，都是困難的。

至於資料的詮釋方式，也無法輕易地就能達到共識。如何詮釋現代的事件，常因我們平時抱持的偏見而有所歧異。我們必須尊重和正視這種無可避免的諸多詮釋。在這門課程中，我們盡可能地對所見的必要事實做一番粗略的鳥瞰，如果與實際報導有所不同，也要忠實地把這些差異紀錄下來。而且也必須指出，單靠被報導出的事並不足恃，

因為未被報導的事也包含許多重要的事實。我們也不該忘記，這些未被報導的重要事實，也許今後將會出現，但也可能完封如初未被揭示出來。

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努力，增進我們積極討論的機會。我們得以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是材料或解釋方法本身都存在著諸多缺陷，更要認清互為矛盾的解釋往往是建立在極可疑而又不充分的材料上。現在，我們打算以此方法來描繪現代史的共通畫卷，並衷心期待這個努力能激發出更多踴躍的討論。

## 關於轉向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

首先我說明一下「轉向」的背景。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結束，對日本而言是個嶄新時代的開端。自一八六七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來，約莫四十年間，日本國民都生活在必須攀登文明階梯——如果說真有這種東西的話——的使命感之中。這類虛構之物，相信只要身為「國民」，不管身處何國，都可感受其存在；並且，我們可以說這類虛構之物，長期以來，在國民的想像力中不斷地發揮作用。因此可以這樣說，從明治時代開始，「文明階梯」此一虛構物，對日本國民的想像力始終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日本對俄的戰爭，乃在沒有敗北的狀況下結束戰爭；其在政治、軍事上的一大事業成就，可說是凌駕拿破崙和希特勒。由此我們可以推論，這項大事業的背後必定多士濟濟，有具備國家領導能力的人在掌舵。



日本自廢除鎖國政策大開門戶之後，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便被推翻，在新的國家政策推行以來，培育出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新觀點：即不以封建制度下的身分來判斷人的價值。參加推翻德川政權運動的青年們，創造出一種默契，亦即在跨出藩國界線、脫離藩屬之後，彼此都平等相待，視彼此為志同道合之士。這些依自己意志斬斷與藩政府關係的武士們，把做了同樣決斷的武士視為同志。這些「脫藩浪士」們之間所顯現的同志關係，影響力極大，甚至令那些願為同樣目的獻身，但選擇留在藩內沒有脫藩的武士們，彼此之間也產生了類似的氛圍。

在反德川政府的運動中，被捕殺的人不計其數。在運動進行時，沒人能夠預測誰可以活下來成為新政府的領導者。運動的倡導者在權力實際轉移之前，幾乎都為理想捐軀了。例如，吉田寅次郎、橋本左內、坂本龍馬、高杉晉作等人。其後，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被視為實現這些先烈的構想，成功地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的重要人物，也先後在明治維新後十年間相繼死亡。西鄉隆盛發動叛亂兵敗自殺，大久保利通遭到暗殺，木戶孝允則是抑鬱而終。明治維新之初的重要領導者中，只有岩倉具視一人長壽，挺立過維新之初兵荒馬亂的年代，成為當時活躍於日本政壇的重要政治家；

但除了他以外，幾乎所有的主要領導者，都在明治維新後十年內相繼凋零。也因此，在進入明治時代之後，這些志士們短期間依然保留著一種敏銳的自覺，清楚地意識到，參與推翻幕府運動中的菁英分子都已不在人世。

這份謙虛的自覺，和為免淪為西方各國的殖民地、協力守護日本的共同意識相結合，賦予倖存的日本後繼領導者，某種勤勉質樸的特質。他們拚命學習趕上西方文明的方法，即使在日俄戰爭方興未艾之際，日本的國家領導者對國家面臨的處境仍未喪失冷靜的判斷力。他們清楚知道，必須趁日本的國力和英、美國民的同情心尚未耗盡之前，儘快結束對俄戰爭。他們並未被打敗俄國的幻覺所欺騙。正因為領導者們都有這種共同的自覺，陸、海軍的最高司令官才贊同內閣儘速簽訂和約，即使這和約只能為日本帶來些許的表面利益。這些領導者不怕違背日俄交戰之時，所醞釀出的輿論動向而作出決斷。在此，我不以明治維新為起點，而談及幕末到日俄戰爭這段期間領導階層的氣氛，主要是想凸顯明治時代的領導階層，與承繼其後的大正、昭和時代領導階層的對比。而剛剛所列舉日俄戰爭期間，日本的政治及軍事領導階層各種特徵，在昭和時代的十五年戰爭開始前，便已消失無蹤。

日俄戰爭結束後，還活在世上並成為新政府領導者的維新志士，認為已經趕上西方的先進國家，原本緊繃的神經因而緩和下來。他們自視為「華族」，自封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作為慶賀。日俄戰爭期間的陸軍次官，能受封男爵；按這標準，軍司令官能受封子爵，陸軍大臣則能受封為伯爵。然而，有資格受封最高位階的人卻都已經死了。明治初期以來功勳彪炳的領導者，雖有少數幾人在這時肉身猶存，但他們的狀況，猶如傑柯博士\*原本的身體中住著另一個海德先生一樣，體內住著不同的人格。他們往後就是不斷努力地宣揚明治維新的豐功偉業，在反覆的陳述中，他們在這個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愈顯得偉大。從實用觀點來看，這個方法對他們攀升貴族階級的階梯幫助甚大。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曾有所謂短暫的後悔時期。在這短暫的後悔時期結束時，日本的輿論出現了要求一一恢復往昔制度的呼聲。這些要求幾乎涵蓋了每項往昔的制度，但明治以來持續至戰敗為止的華族制度，卻是少數的例外。據我印象所及，戰後的三、四年間，報紙上從未出現過「要求恢復華族制度的社論或讀者的投書」。儘管明治時代以後，制定的身分制度沒發揮多少作用；至少在這一點上，整個戰後時期的輿論是完全一致的。

相反的，明治中期制定與此稍有不同的身分制度，也就是基於學校入學考試制定的身分制度。儘管近來持續有學生進行抗議，這項制度現在仍然受到國民普遍的支持。這項入學考試制度，原本是模仿中國的考試制度，在日本創設出來的。但是，明治時代以

\*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作品《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中的主角。

4.有關戰後日本人對於華族制度一致的輿論，筆者得自於葦津珍彥（葦津珍彥〈尊皇攘夷とは？〉）、鶴見俊輔編《語りつぐ戦後史》（思想の科学社，一九六九年）。葦津珍彥〈時の流れ〉（神社新報社，一九八一年），收集葦津氏戰敗以來在《神社新報》續寫的時論。其中一篇談及華族制度，他總結戰後七年間的輿論這樣寫道：

「作為明治憲法的支柱，而在社會條件中被消解的著名事例之一，就是華族制度。明治憲法的議會制度是建立在貴、眾兩院的制度上；沒有華族制度的前提，貴族院就無法成立。然而，在戰後得知所謂『斜陽族』（語出太宰治的小說《斜陽》，指沒落的上流階層。）真相的國民們，終究不會同意華族制的復辟。其他種種社會條件的變化也難使它復活。縱使修訂憲法時堅決強調明治憲法優點的人，現在也不再主張恢復原來的條文，頂多只想恢復其優點，以制定出新構想的制度。」（〈講和発効後の難問題、憲法全面改定論の予想〉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号）。

前，這項入學考試制度並沒有開放給所有階層的人。考試制度和學校教育結合，而且開放給社會上所有階層，是明治時代以後才有的。也因為這個理由，現在的日本仍舊廣泛信奉考試制度，以及據此運作而來的學校制度。

明治時代以前，初等教育已有相當程度的普及。據說，明治初期，男性的識字率約為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女性則為百分之十五，而且這些人也具有算術等實用知識。這是德川時代的教育遺留給明治時代的資產。這種教育是和民眾的日常生活相結合，並非與選拔考試的教育制度結合。<sup>5</sup>

明治以後，新政府所採行的教育制度，並不打算將明治以前的教育制度加以延長，而是改採以歐美制度為藍本所創設的新教育制度。他們設置東京帝國大學作為最高學府，只要能通過不斷的選拔考試，任何國民都有希望能進入就讀。這制度也成了刺激全體國民的向學心，讓日本追上西方文明的有效手段。

誠如羅納德·多爾在《學歷社會》中所述，日本政府早在一八八〇年就已經使用考試制度選拔公務人員。當時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任職公務人員不需經過考試，並且保證一開始就能擔任較高的職位。這樣的制度對產業也造成影響。一九一

○年以前，非政府的絕大多數的私人企業，都已養成只從大學畢業生中錄用新進人員的習慣，報社也跟著建立這個慣例。就這一點而言，日本比產業革命發祥地的英國還更先進。

多爾還舉出一個例證，一九五五年《日本紳士錄》裡所登錄的人士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大學畢業或專科學歷。而在英國同類的名人錄裡，一九五八年企業界董事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具有大學畢業學歷。英國前兩百名主要公司的負責人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為大學畢業或專科畢業。

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日本的政府官僚、產業界及新聞媒體等各個領域的領導階層，仍然是由大學畢業生所佔據，當中又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為中心。這種現象並未因為始於一九三一年的十五年戰爭失敗而有所改變，也沒有因為其後美軍佔領日本而改變。

5. R. P. 多爾 (Ronald Philip Dore) 《學歷社會·新しき文明病》(George Allen and Unwin·原著·一九七六年；日譯本，岩波書店，一九七八年)。有關明治以前的論述，有多爾的前著《江戶時代の教育》(Keegan Paul·一九六五年；日譯本，岩波書店，一九七〇年)。

為了解「東大新人會」的重要性，必須瞭解上述的現象。一九一七年發生的俄國革命，帶給日本大學生極大的影響。翌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日本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米價上漲，因而造成「米騷動」\*。暴動始於距離日本首都很遠的鄉下，再擴展至大都市。這場暴動並非由政治人物策動的，而是始於地方人士自發性的抗議行動。因為日本人自己體認到「米騷動」是群眾力量的展現，意味著日本開始進入新的時代。

因為日本有艱難的入學考試制度，所以能夠通過公立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青年（從公立高中畢業後，進入帝國大學並不困難），都覺得已經取得進入帝國大學的資格，不久後將成為日本未來的領導人。十八歲左右就能達到如此成就，說來或許有點誇張，實際上卻是如此。通過舊制高中考試的十八歲日本少年，覺得整個人生中最困難的競爭部分已經結束了。接下來六年的學校生活，這段期間可以用來描繪日本未來的藍圖。俄國革命和「米騷動」，對置身在這段期間的年輕人（高中生、大學生）的構思能力影響極大。

就在這時候，被視為日本民主思想的代表——東京大學法學院政治學教授吉野作造，接到要他與右翼運動領導者同台辯論的挑戰書。此時的吉野似乎身陷於危險的處境中。然而，公開演說的當天，會場聚集的聽眾多半是大學生，他們都明顯地支持吉野的

論點，使暴民們無法威脅吉野教授的安全。吉野教授的學生們覺得日本已經出現新的歷史浪潮。

演講會舉行後半個月左右，正逢俄國十月革命後一年又一個月，赤松克麿、宮崎龍介和石渡春雄三名東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創立了「東大新人會」，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組織綱領是由赤松起草，內容如下：

- 一、吾人配合世界文化之勢——人類解放新氣運，並努力促進之。
- 二、吾人致力從事現代日本之合理改造運動。

這項運動從東京大學擴展到其他大學，甚至擴及到兩三年後，即將成為帝國大學學生的高等學校裡<sup>6</sup>。

\*日本以米價暴漲為導火線而發生的民眾暴動。一九一八年始於富山縣的魚津而漫及全國，民眾襲擊投機米商，政府出動軍隊予以鎮壓。

6.關於東大新人會，是出自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約九十人的舊東大新人會成員，集合參加紀念新人會創立五十周年聚會時的發言紀錄（石堂清倫、豎山利忠編《東京帝大新人会の記録》，經濟往来社，一九七六年）。



學生運動很快地就超越了他們老師所主張的溫和的民主主義原則。吉野作造認為，民主主義的原則是一種規範，所有社會文化的習慣中都含有這種規範，因此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發揮作用。不只在所謂的文明國家，縱使在不算是文明國度的國家也能發揮作用。由此看來，吉野教授的觀點和「東大新人會」成員的觀點並不相同。

在當時的日本，吉野教授正致力於廢除國會的貴族院與天皇的統帥權。如果這個目的能夠實現，那麼派駐在殖民地的陸軍部隊指揮官們，就無法獲得未經選舉而出任國會議員的人士支持，藉機擅自發動未經宣戰的戰爭了。

吉野作造溫和而實際的目標，在學生運動以意識型態為本位的基準看來，未免太過溫和而無意義。「東大新人會」的成員們與社會主義政黨的工會結合起來，後來，有部成員成為共產黨員。這群新人會的成員對於一九二〇年代，組織共同陣線阻止軍國主義的議題並不感興趣。吉野辭去東京大學教授的職位後，全心投入了翻印對明治文化的形成具有影響的重要紀錄的事業。

不久，新人會的創始人和創始成員背離了社會主義運動，轉而趨向國家社會主義。新人會創始人赤松克麿，一九二二年加入日本共產黨，其後又脫離共產黨，一九三〇年

出任社會民眾黨的書記長。此後，他開始闡述天皇的責任，認為天皇的責任就是保護國民的利益。這種觀點導引他把滿洲事變\*的發生，和建立滿洲國的舉動正當化。他已經在替日本尋找，可以和定為國策的侵略中國政策並存的民主化與社會主義化的道路了。

另一位新人會的創始人宮崎龍介，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的時期，即以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公爵的密使身分進行活動，勸說中國國民黨與日本合作。

新人會創始成員之一的麻生久，以一九三〇年代社會黨重要領導人的身分，曾推動工會的領導人與傾向國家社會主義的改革派軍官結合。在其他創始成員之中，以佐野

另有美籍歷史學家亨利·D·史密斯(Henry Dewitt Smith)發表的〈資料のJungle——新人会を追跡する〉(《勞働資料》一九六八年一月号)，文中論及「思想之科學研究會」編《共同研究·轉向》所收錄筆者的論文(後期新人會員)(上卷)，他的調查指出，我在文中列出的五十五人中，至少有十四人不是新人會的成員，兩人身分不詳。史氏根據這調查寫成Henry Dewitt Smith II, *Japan's First Student Radicals*, 1972. 一書。出版後，亦有日譯本(《新人会の研究——日本学生運動の源流》松尾尊允、森史子譯，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八年)。

\*指「九一八事變」。

學（1892-1953）最為重要。他二十七歲時，以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的身分參加「東大新學會」。一九三三年，他四十一歲，擔任日本共產黨的委員長，同時也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與同為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鍋山貞親，在獄中發表「轉向」的共同聲明<sup>7</sup>。

佐野學與鍋山貞親撤回他們之前所有的主張：廢除天皇制、賦與包括被殖民的各民族在內所有民族的自治權等；並且，他們也撤回了原本所有論點的總結——反對日本政府的滿洲事變政策。他們改口說，要從蘇聯的桎梏中解放自己，對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價值表示尊敬，以發展日本的社會主義。

他們的共同聲明立刻引起極大的效應。共同聲明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其後一個月之中，所有未決犯中有百分之三十與共產黨有關（一千三百七十人中有四百一十五人），百分之三十四的已決犯（三百九十三人中的一百三十三人），改變了政治立場<sup>8</sup>。三年內，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已決犯（四百三十八名中的三百二十四名）聲明「轉向」；另外，堅守不「轉向」立場的，則有百分之二十六（四百三十八名中的一百一十四名）<sup>9</sup>。

共同聲明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日本共產黨的最高負責人佐野學，並沒有提出退黨

申請，即起草否定以往立場的聲明。此一共同聲明的特徵，在伴隨著共同聲明發表而來的混亂與憤怒中，並沒有引起注意，但是它卻能表現出「東大新人會」所隱含的邏輯，也完全契合十八歲少年心性的框架。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正如剛通過最困難的入學考試而當上人民的領導者那樣，並且是用民主又公平的方法被選拔出來的。他們有一種信念，只要是依據這個方法所選出來的領導者，即使在心中政治上的意見有所轉變，仍然能繼續擔任領導者。從結果來說，追隨者表現出來的反應，也顯示他們接受領導者所默認的前提。

7. 對於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等的共同聲明已「把自己的轉向視同為黨的轉向，在領導上顯露出這種病態」，藤田省三作如下表示：

「他們開始活動時，身兼二七年綱領的支持者，以及負責實行該綱領的領導者的身分；但他們在轉向之後，還試圖要領導黨政，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個人的轉向是他們自己的自由，可是轉向的方式及形態應該受他們所處的公共立場所制約。他們應該在轉向的同時辭去他們領導人的地位。至少必須在事後提出退黨聲明，然後才能提出天皇制社會主義運動的綱領。」（藤田省三〈昭和十五年を中心とする転向の状況〉《共同研究・転向》中卷・平凡社，一九六〇年）。

8. 內務省警保局編《昭和九年度に於ける社会運動の状況》（一九三五年）。

9. 池田克〈左翼犯罪の覚書〉（中央公論社編《防犯科学全集》第六卷《思想犯罪篇》一九三六年）。

佐野與鍋山的共同聲明發表後，「轉向」一詞變成那個時代的流行語。這個詞彙被一般民眾納入日常生活用語之中。不過，這句話在被如此廣泛使用之前，還有一段歷史。倖存的明治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在《前衛》雜誌（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月合併號）發表一篇題為〈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轉換〉的文章，闡述前衛分子必須回到無產階級的群眾中。山川的看法是說，前衛分子必須對人民群眾為日常生活中部分要求與特殊要求所展現的鬥爭，表示更高的敬意。相對的，在德國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後回到日本的年輕教授福本和夫，則批判山川的理論是折衷主義——山川倡議的方向轉換本身就應該被轉換。按照福本的理论，共產主義者應該自覺本身的思考方法，並使之轉向，以此對同時代的社會能有所行動。於是「方向轉換」被縮寫而產生「轉向」一詞，意指人要自覺其自身思索的過程，並給予符合自身思想水準的新方向。也就是說，在這個意義下，「轉向」之前的思想是一種順從社會習慣行動的惰性思想<sup>10</sup>。

在學生間成為流行語的「轉向」一詞，後來被依治安維持法設置，對危險言行進行調查的思想警察所採用。治安維持法在一九二八年修正公布。思想警察為改變激進派大學生的觀念下了工夫，還出版如何技巧協助「轉向」的手冊。轉向並不能只靠逮捕入獄

和加以拷問。根據池田克檢察官所寫的手冊，警察局長應該從拘留所將被捕者叫到局長室，讓他們坐在局長的椅子，然後要自掏腰包叫來外送的親子丼。所謂的「親子丼」，就是雞蛋包裹雞肉的蓋飯，這樣可以讓人聯想到親子的關係。手冊上還說，吃飯的時候，盡可能不要談論政治思想之類的事，只能說些「你的母親很擔心你」之類的話；而且不能多談父親，否則反而會造成學生對權威的反抗意識。「轉向誘導術手冊」就是這樣進行的。被置身在這種技巧下受到誘導的青年，雖然以前依循福本和夫定義的轉向之路前進，但現在卻不能像以前那樣體現自己所信奉的政治理想，而覺得作為他意識型態的上層建築已然崩潰，於是朝著思想警察所定義的另一個路徑轉向了<sup>11</sup>。

10. 「轉向」一詞的誕生，出自藤田省三〈昭和八年を中心とする転向の状況〉（《共同研究・転向》上卷，平凡社，一九五九年）。

11. 池田克、毛利基合著《思想犯篇》（《防犯科学全集》第六卷，中央公論社，一九三六年）。

池田克（1893-1977）於東大法學院畢業後，一九一七年歷任候補司法官、司法省刑事局長，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被（盟軍）解除最高法院檢察次長職之前，為思想檢察官系統中的核心官僚，十分活躍。戰後開業擔任執業律師。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被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至一九六三年退職（《現代人物事典》朝日新聞社，一九七七年）。

「轉向」的另一個條件，是日本民眾對滿州事變的熱烈頌揚。因為他們全心奉獻的對象——人民，卻支持與他們本身信仰相背的目標。此時，他們有一種孤立於人民、周遭親友和家人的感覺，這種孤立感使他們決定轉向<sup>12</sup>。一九四二年警方做出的統計，刊載於一九四三年政府內部秘密的刊物上。統計上顯示，轉向者所自述的轉向動機可區分為以下幾類：出於信仰的佔百分之二·二一；發現理論矛盾的佔百分之十一·六八，因為被拘禁而後悔的佔百分之十四·四一，因家庭因素的佔百分之二六·九二，因國民自覺的佔百分之三十一·九十<sup>13</sup>。

這就是一九三〇年代以後，「轉向」一詞被納入日本日常用語，並廣泛使用的整個歷史經緯。主要的意義在於，在國家權力之下造成思想的轉變是可能發生的。這個現象有兩個層面：其一是國家強制力的運用；其二是個人或團體在面對壓力時，他或他們自己所選擇的反應。對這種現象來說，強制力的作用和自發性，是兩個不可或缺或缺的層面。依據這種具有引導性的記述的定義，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不囿於價值的判斷，詳述日本在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間，所發生的轉向現象。<sup>14</sup>

此一「轉向」的概念，有必要從一系列的同類詞中加以區別。首先，我認為「轉向」一詞——大致意為在國家的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這時所展現的強制力，就是國家的強制力。另有所謂的「悔悟」，這是指源於個人選擇與決斷所產生的思想變化。再來有所謂「意識型態的變化」，這名稱是在研究與「轉向」為同一現象時，將關心的

12. 轉向的主因是因為大眾的孤立。吉本隆明的轉向論中有精闢的分析。吉本隆明〈轉向論〉。

13. 司法省保護局《思想犯保護對象者に関する諸調査》（《司法保護資料》第三三輯，一九四三年三月）。

14. 本多秋五〈書評 思想の科学研究會編 共同研究〈轉向〉上〉（《思想》一九五九年七月号）。

該書評指出，「思想之科學研究會」的轉向研究因為擺脫以往對轉向負面評價的判斷，因而獲得了新的視野；同時也指出正因為這種觀照方式而失去觀察力。

辻信一的〈轉向論の新しい地平〉，含有對身體的自我意識（亞洲人第二代、第三代的）觀點。同樣從身體論來討論轉向，指出「思想之科學研究會」的共同研究的缺失有松本健一的〈轉向論の基軸とは何か——鶴見理論と吉本理論にふれて〉（《現代の眼》一九八一年三月号）。這篇文章把轉向論置於市川浩、津村喬、菅孝行等提出的脈絡中。該期《現代の眼》刊有菅孝行、松本健一、岡庭昇、中島誠、飯田桃、笠井潔、高橋敏夫等人參加的研討會——〈現代轉向論は可能か〉的討論紀錄。



主軸置於研究意識型態變化方式為主的術語。還有所謂的「脫離」，這術語將同一事件視為相同的現象，但主要用於研究個人與黨派的關係中。

「研究「轉向」時，那些從穩健的自由主義，轉為狂熱的法西斯主義者，有時候很難引起注意。從我的觀點看來，這種變化在日本戰時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應該視為「轉向」加以研究。今天我所提到的都是與共產黨有關的人士，因為討論那些人的經歷，脈絡比較清晰而容易瞭解。有關來自其他思想的轉向事例，以後再行討論。

至於「背叛」——這個詞帶有明顯的貶損意味。有人向警察密告自己以前的同志時，就用這個字眼，這種場合或許可以稱作背叛。然而，如果我們將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日本所發生的轉向現象，一律都以「背叛」的惡名統稱的話，我們就會喪失從謬誤中發掘真理的機會。我認為研究轉向的價值在於，錯誤中包含的真實部分，比真實中包含的真實對我們更為重要；當然，前提是真實中真的存有真實的話。如果我們能對錯誤中包含的真實，更用心地加以深入定義，我們就能具備透過錯誤探尋真理的方向感，如此便能掌握真實的真正核心。

我不斷地問自己下面的問題：在漫長的人生中，有人能不經歷「轉向」的嗎？導引這些人「轉向」的條件是什麼？他們如何將他們的「轉向」正當化？經歷過戰爭後，回顧「轉向」的時候，他們是怎麼思考的？

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在我們研究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間的日本時，是極為重要的。

## 鎖國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兩三天前，我在書店購買了加拿大的地圖。這和我平常看慣的日本地圖非常不同，因此頗為訝異。這張加拿大地圖是由一家名曰國際地理（Geographic International）公司所出版，大概是加拿大到處都買得到的普通地圖，所以對你們加拿大人一點也不稀奇吧。

我對這張地圖感到訝異的是，地圖的主要部分——佔最大篇幅印出的部分，並沒有展現加拿大的整個版圖，連東北地區加拿大領土在何處結束也沒有標示出來。對這種可以放在口袋裡帶著走的地圖來說，或許加拿大真的太大了。如果有個加拿大人也和日本人的想法一樣，他在出版加拿大的地圖時，我想他會依照比例尺的比例製作出容納整個加拿大的地圖。

這張加拿大地圖的另一個特色是，在下方，也就是南方部分清楚地標示出邊界。這種邊界線的概念是日本人所沒有的，因為日本人從未有越過邊界的體驗。

日本人始終抱有一種感覺，認為自己一直住在，並且也能繼續住在自己金甌無缺的土地上。在這塊固若金湯的土地上，日本人往往覺得若要走出國境之外就必須抱定決心，只要身處日本便不用害怕會突然遭到外國人的攻擊。這是日本人的一般體驗且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一，只是很少在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思考方式中顯現出來。我們可以把日本人思考方式的此一層面稱為「鎖國性」。

除了從先天上視為國土的土地，獲得安心感的保證之外；從文化上來說，日本人始終認為，日本被遠遠隔離在世界較先進和較普遍的文化之外。這種意識形成一種自卑感，深植在日本人內心的潛意識中。這也是能激起日本人好奇心與學習力的原因，使日本人擁有一股吸收外界新知的衝動。

日本處於較日本文化普及的中國文化之邊陲地帶，中國文化是經由朝鮮流傳到日本。另一種源於印度的跨國文化，則是經由中國流傳到日本。最後，一五四三年，葡萄牙海難船員把火繩槍帶到日本的種子島，源於歐洲的另一種普遍性的文化始傳進日本。

這種情況也反映在街頭賣藝的世界裡。平安時代以來，我們有太夫、才藏這種一搭一唱表演歌舞和對白的傳統。每年年初，這樣的一組藝人便造訪宮廷，預言新的一年會帶來各種好運。接著他們就去拜訪老顧主，表演同樣的技藝。隨著時代的推移，這種表演變得帶有滑稽的性質，持續至今。進入日俄戰爭之後，大眾社會已在日本產生，新的大眾文化也應運而生，太夫、才藏這種「萬歲師」\*的組合便躍上舞台，也經由唱片、廣播、電視等媒體成為現今最受歡迎的娛樂節目之一。我們可以把這種民藝，視為各自擁有不同之複合人格的「太夫」和「才藏」間，長達一千多年來的漫長對話。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記載以前。根據折口信夫開拓的民俗學式的日本文學的研究指出：日本娛樂表演的最初形態，始於招待貴賓舉行酒宴時的餘興<sup>15</sup>。在這種宴會上表

\*「萬歲」為日本一種類似中國對口相聲的表演，其中兩人一組的表演組合稱為「萬歲師」。

15. 折口信夫《日本文學啟蒙》（朝日新聞社，一九五〇年）。《折口信夫全集》第一二卷（中公文庫，一九七六年）。

池田彌三郎《日本芸能伝承論》（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二年）一書，對折口信夫所提的假設進行廣泛的資料查考，內容更加確定。

不僅是日本的表演藝術，古代的文學也源自宴會中的對話。現今，日本的許多地方或祭典中仍可找到其原型的痕跡；在折口信夫的著作中時常提及。

演的即興技藝，是以遠方來的貴客\*和沒有受過文化洗禮、不諳儀節的土地神相會為本，不斷推衍而成。其中有衝突、對立，最後以遠來做客的神明勝過土地神而告終。這種情節與當時中央政府和地方豪族間的關係相呼應。倘若再配合中央政府派任的地方知事\*，擅於中國式的文章或擁有中國的古典教養，我們就可以在這種對話中，看見中央文化與在地本土文化的交會。在日本，形式完整的文化難以避免的是外來文化；非固定形式的日常文化則為本土文化。在兩者交會的場面中，能言善道者是外來文化的代表；沉默寡言者是本土文化的代表。還有一種表現，即說話流暢的是身著宮庭式服裝、儀態端正的人物；沉默卻偶爾出聲應和的則是穿著本土服裝的人。不久，一個戴著愁眉苦臉的面具的男人出場了，那原本是扮演土地神角色的人所戴的。愁眉苦臉的面具很快地就換上火面具\*。說到火面具或許大家一時難以理解，我曾經在英國的旅遊書中，看到一個英國男子在最會變臉的比賽中勝出的照片。他先把所有的假牙取下來，然後讓自己的臉有如橡皮般柔軟，再做出愁眉苦臉的表情。這張照片讓人想起日本宗教儀式中跳舞的人戴的火面具。

以邏輯的一貫性試圖說服他者的人，大都是根據外來文化的脈絡進行；向對方訴諸心性氣氛的人則依本土文化的脈絡進行，以達到說服的目的。粗略地說，這種二分法已經在日本的精神史與文化史中存在一千多年了。

跳過一千年，回到我們現在的主題——戰爭時期日本的思想史吧。伊藤整是優秀的知性主義派作家，在一九三〇年代，受到詹姆士·喬伊斯<sup>85</sup>等西歐心理主義文學影響，以身兼詩人、小說家和評論家而聞名。他跟被捕後遭拷問致死的無產階級文學代表性小說家——小林多喜二唸同一所學校。個性謹慎的伊藤整始終小心地避免與左翼政治扯上關係。他受到喬伊斯及馬歇爾·普魯斯特<sup>86</sup>的影響，運用意識流的形式寫下具有新心理主義技巧的小說，這個寫作實驗在中日戰爭期間持續進行著。但是日本和美國

---

\*此處指「神明」。

#類似台灣的「縣長」。

※為眼睛一大一小，嘴尖的醜怪面具。

<sup>85</sup>James Joyce，二十世紀重要的作家，愛爾蘭人，代表作為《尤利西斯》。

<sup>86</sup>Marcel Proust，二十世紀的重要作家，法國人，代表作為《追憶似水年華》。

爆發戰爭時，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的知識階級——為了不讓這感動消退〉的雜文，翌年又在同一家報紙發表題為〈戰爭的文學〉（〈戰爭的文學〉）的評論<sup>16</sup>。

〈我的知識階級——為了不讓這感動消退〉一文，描述他擔任英語教師時期，在日本模仿英國人和美國人而耗費了半生，為內心鬱積的自卑感找尋出口，至今才得以驅逐這種自卑感云云。在〈戰爭的文學〉一文中，他主張不存在所謂的個人，只有美國人或日本人，文學應該描寫所謂的日本人或美國人，也就是描寫這兩國的國民。戰爭結束後，伊藤慢慢從戰後的挫敗感中恢復自我，也自覺到在戰爭期間自己文學作品所展現出的愚蠢面向，陸續寫出一九五八年的《氾濫》，為其巔峰的大作。《氾濫》反映出主角隨著社會地位的上升，而改變想法的存在狀態，宛若是一種對照戰後時代的「轉向小說」。

戰爭結束後，伊藤將 D. H. 勞倫斯\* 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翻譯成日文，卻因為翻譯這本書而招致被判猥褻罪。雖然最後被判決有罪，但在審判的鬥爭中，他成功地編織出一種表演理論——亦即人們可以藉由能被當代人接受的形式，來批判現存的秩序。他用嚮往無秩序的生命，和欲使整個社會成員置於政黨中央委



員會命令下的組織，這兩者對照性的圖式來分析文學的生態。他心懷這樣的想法，努力撰寫明治以後的《日本文壇史》，但他沒能完成這部鉅著就去世了。<sup>17</sup>

16. 伊藤整聽到對美英宣戰詔書後，有如下感想：

「……聽到這件事後，我倚靠在地下室白色牆壁的凹陷處，彷彿全身突然被冷水澆溼了。沒錯，在我看來，確保民族的優越感驅使著我們，而這正是必須的作為。這場戰爭並非政治的延長，或與政治表裡相關。而是為了由衷相信大和民族在地球上是最優秀的民族，遲早必須一戰的戰爭。」（伊藤整〈我知知識階級——この感動萎えざらんが爲に〉（1）〈都新聞〉一九四一年二月一四日）。

我並不是為貶低伊藤整的作品才援引這篇文章。在戰前，伊藤整即因翻譯喬伊斯和勞倫斯，評論集《新心理主義文學》（一九三二年）和長篇小說《典子の生き方》（一九四一年），以知性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聞名；戰後更以紀實小說《裁判》（一九五二年）、長篇小說《氾濫》（一九五八年），獲得日本代表性知識分子的崇高地位。但是在他聽到對美英宣戰詔書時，仍不免落入鎖國性的侷限中，像這樣表明與戰前、戰後截然不同的思想面向，正反映出日本知識分子的精神軌跡。

這種現象既是大正時代的知識分子想像不到的，也是高度成長期的現代知識分子難以想像的。

\* David Herbert Lawrence，通常寫做 D. H. Lawrence，二十世紀重要的英國作家，同時也備受爭議。

17. 伊藤整（1905-1969），一九五二年開始動筆，最後仍未完成的《日本文壇史》，由瀧沼茂樹續寫後出版。講談社。

透過伊藤整的一生與著作，我們既可以見到自由主義轉向的事例之一，也可以在戰後時代從轉向回復的過程中，看到自古以來的街頭技藝的復甦。

有關日本人時而明顯、時而隱蔽，並在心中持續發酵一千多年的文化自卑感，在此暫時打住。如果我們的目光更明確地移向政治的領域，就會遇到源於國家的孤立——鎖國性的問題。

在日本漫長的歷史中，也曾遭受過外國勢力的侵略。那就是發生在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的蒙古侵略。在長達一千年的期間內，日本遭受到外國侵略只有二次，一是蒙古攻登九州之役，另一次是一九四五年聯軍的登陸沖繩\*之戰。也就是說，一千年來只發生過這兩個戰例。對波蘭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歷史而言，在民眾記憶深處或潛意識中，至今仍殘存著害怕外國人越境侵略的恐懼；與此相比，日本人除了在十五年戰爭後期之外，被外國人侵略的恐懼並沒有那麼強烈。

四周環海和四周被劃上國界線的陸地情形完全不同。四面環海，意謂著即使自己不努力促成民族的統一，也可以得到大自然的賜予。住在四周環海的島民，使用相同的語言，藉由同類形態的符號體系結合在一起，使生活在這島上的住民們有一種全是遠親

的感覺。鎖國政策雖然實施於一六三九年，卻也為少數荷蘭人、中國人和朝鮮人留下往來的通路。但是，鎖國令更強化了此後二百年間，日本人早已存在的自我封閉性。一八五四年形成的開國並未去除這種自我封閉的特質，這種特質也成為至今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徵之一而留傳下來。這種現象經常出現在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小泉信三的戰時日記中。《海軍會計上尉小泉信吉》這本日記，是他在其子小泉信吉戰死後，為了紀念兒子的生涯於戰後出版的<sup>18</sup>。他自己經常引用這本日記。太平洋戰爭方興未艾之際，小泉信三寫下這場戰爭所帶來的災厄。在書中，他用戰歿者的軍階身分——海軍上將山本五十六，以及許多海軍軍官和士兵等，加以區別敘述。由此看來，即使在私人日記中，小泉信三的想像力也沒有超越日本人的侷限。這種現象若跟小泉信三年輕時留學英美，以身為具有國際視野的經濟學者而聞名的事實綜合觀之，就更值得注意了。日本戰

\*琉球王國，十五世紀初期，由中山王尚氏在沖繩諸島建立的王國，國都首里。日本慶長十四年（一六〇九年）被薩摩藩武力征服併吞，但它同時仍向中國朝貢，至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年），明治政府設置為沖繩縣。

18. 小泉信三《海軍主計大尉小泉信吉》（私家版，一九四六年；文藝春秋，一九六六年）。

敗後，他成了皇太子教育上的輔佐者，提議皇太子與平民的企業家之女聯婚，藉此把皇室包裝成符合戰後的民主時代。這場婚禮藉由電視的轉播讓更多人民得以參與，拉近皇室與日本一般市民的家庭生活氣氛。由於導演這場傳媒廣為報導的婚禮，小泉信三帶給日本人極大的影響，其影響力甚至超越戰後所有的意見領袖。他將日本的皇室連接到歐美的舞台。然而，一旦被投入戰爭的危機中，就連在戰前和戰後都能具有國際視野的日本人，也失去了超然獨立的形象。

在加藤周一與萊休 (Michael R. Reich) 和利夫頓 (Robert Jay Lifton) 合著的《日本人的死生觀》(《日本人の死生觀》·岩波新書·一九七七年) 中，以眾所周知之四十七浪士的歷史事件為例，解析日本文化的特質。這個事件發生在一七〇二年，四十七浪士為主公報仇雪恨而殺死貴族的故事，在此後三百年間無數次被搬上舞台，或在說書場演述，或寫成小說，時至今日還被拍成電影。根據加藤\*的「診斷」，這個武士集團的領導者充滿卓越的知性，也為實現最初擬訂的舊主復仇計畫獻上他所有的想像力。該集團的目標在行動伊始就已固定，集團本身的知性僅用於如何保持集團的團結，和如何朝著最初設定的目標進行，根本不曾用來修正最初的目標。<sup>19</sup>

四十七浪士的故事能持續三百年仍然受到歡迎，是因為它合乎日本人所嚮往的理想。和四十七浪士一樣，明治以後的日本人也配合政府揭櫫的理想，為攀登文明階梯作出努力。換句話說，儘管日本人置身在其經歷的最後一場戰爭中，他們也不會去批判戰爭的目的，只知道盡最大努力朝著目標前進。縱使這場戰爭失敗之後，他們仍會重新訂定目標，再次朝著政府掛在自己面前的「繁榮經濟的目標」繼續努力。日本人的知性即使陷入戰爭的泥沼中，也不會用來修正既定的目標。

這齣重述四十七浪士行為的戲劇名曰「忠臣藏」。加藤周一所稱的「忠臣藏症候群」，就是源於鎖國性這種普遍的日本文化特徵。

\*加藤周一為日本的評論家、作家，也是醫學博士。

19.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說》（《加藤周一著作集》第五卷，平凡社，一九八〇年）。

透過忠臣藏電影的分析，只使用日常用語嘗試進行「日本人論」的先驅作品是佐藤忠男《裸の日本人》（文光社，カッパブックス，一九五八年）。其後，作者在《忠臣藏——意地の系譜》（朝日選書，一九七六年）中，做了更正確的考證。前者只以忠臣藏為資料，赤手空拳地寫出非專家立場的社會學，其氣魄令人折服。

鎖國性這種日本文化的特徵，也對轉向過程帶來影響，甚至可以說轉向過程本身大多是來自於鎖國性這種文化特徵。站在國家立場執行誘導轉向任務的名古屋地方法院檢察官長部謹吾，在一九三七年發表一篇長達四百五十頁的報告書。他在這部著作中總結地說，自己在執行「轉向」任務之前，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者，現在卻經由誘導獄中的左翼激進主義者轉向，使身為檢察官的他才得以確立真正日本人的立場。他又說，自己過去的思想尺度在此都必須更改。這個檢察官雖然強制使因批判國家被逮捕入獄的人「轉向」，但他自己也在這過程中完成「轉向」。這種現象部分原因出於，一九三〇年代前半期左翼運動的領導者多半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學生或畢業生，亦即與檢察官有相同的成長背景——起訴者和被起訴的人吃的是同一鍋飯！他們有學生時代的共同語言，可透過共同的語言交換思想<sup>31</sup>。

嚴刑拷問的行徑確實存在，也有人因此致死。然而，與同時代的鄰國中國相比，日本對於公開宣示轉向者所施以的刑罰並不算嚴厲。包括檢察官在內，所有官僚均在陸軍的壓力下，在憲法上已逐步地完成轉向。也就是由美濃部達吉依據自由主義倡議的「天皇機關說」\*，轉為美濃部以前的法學者所主張的「天皇主權說」。

或許，誘導「轉向」可以視為日本統治階層，運用狡滑智慧的例證之一。若只是這個現象，則可以視為統治階層溫情的表徵；同時，我們也可以站在明治時代前，日本傳統的延長線上來解釋。

守田志郎在《日本的村莊》一書中，分析日本中部的村落生活時，注意到一個現象：即每個村民為了擴張耕地，有時會欺騙附近的住民，但卻不會將對手逐出村莊<sup>21</sup>。在村落中，即使有人抱持怪異的思想，多數的村民也會遏制自己不傷害他的身體。村落生活的這種現象，不僅顯示出多數派的溫和，也顯示出少數派努力重修舊好的可能性。從

20. 長部謹吾（思想犯の保護に就て）（《司法研究》第二一輯一〇，司法省調查課，一九三七年三月）。

長部謹吾（1901-1991），一九二五年東大法學院畢業，任職日本興業銀行，二六年司法官考試候補，走上法官之路。戰後歷任最高檢察廳次長檢察官、最高法院法官。

\* 美濃部達吉主張國家主權不在天皇，而是在國家本身，天皇只不過是國家的最高機關。此一學說引起議會爭議，美濃部的著作被禁，還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的職務。

21. 守田志郎（1924-1977）的《日本の村》一書（朝日新聞社，一九七八年），起初以《小さい部落》為名，一九七三年由朝日新聞社發行。

這村落的傳統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戰爭期間仍有提出異議的方法。雖然在整個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出現叛亂或反抗的事例，但在生活的所有層面上卻可發現抗議的事例。

日本文化包含的鎖國性，是「東大新人會」試圖以海外引進的言論思想，來改造日本當時所面臨的強勁對手。

一九三五年中野重治發表小說《村中的家》<sup>22</sup>，對自身反省「轉向」具有什麼意義，有極為生動的描述。小說的主角在獄中簽署轉向聲明被釋放後，回到位於日本沿海農村的父親家中。父親是個農民，不像兒子是大學畢業生，他面帶苦澀地接納自己的兒子。父親說：「聽到你被捕的消息，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不過，你還是活著回來了。既然你無法為自己任性選擇的信念而死，就應該不要再寫了。」主角這樣回答父親：「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還是要繼續寫下去。」雖然遭到拷問和監禁，主角仍沒有因為屈服而出賣所屬的組織和同志友人。雖然他對檢察官發誓今後不再從事政治活動，但並沒有撤回自己的思想立場。他能做的僅止是這樣而已。

對主角的父親來說，這樣做還不夠。父親認為，自己的兒子身為一名領導者，卻讓



眾多追隨者遭到挫折，照理說應該繼續堅守原本的行動方針或者死去，才能報答那些曾響應兒子號召、不斷忍受苦惱的眾多年輕人。這與兒子政治上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完全無關，而是從一個身為農民的父親立場來看的，是一個正直人應有的態度。這種正直感是維繫鄉村生活的動力，可是只靠這種正直感有時還是不夠的。因為僅憑父親的正直感，終究是無法推敲思量出兒子慎重的政治計算，做兒子的試圖對日益高漲的軍國主義，退一步築起一道抵抗線。

中野重治持續寫作不輟，因為作品被視為是擾亂治安，而再度被捕。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他遭到報章雜誌的全面封殺，只能上班維生。但是他在戰爭時期僅能少數發表的作品，已經跟日本一般市民抗議極端軍國主義的掙扎苦悶結合起來。戰爭結束時，中野重治再次加入日本共產黨，這是以拒絕轉向而留在獄中的少數人為中心，重新建立的共

22. 中野重治（1902-1979），福井縣人。就讀四高，一九二七年東大文學院畢業。參加創立「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ナプ）」。一九三一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三四年，以退出共產主義運動為條件獲釋出獄。小說《村の家》（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再次加入日本共產黨。小說《むらぎも》（一九五〇年）。一九六四年，遭共產黨除名。

產黨。然而，面對繼承戰時政府的敗戰後政府，此時中野重治實質上並沒有拋棄戰爭時期，立足於保守本土傳統中不斷抗議的態度。敗戰後的一九四七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集《五勺酒》（《五勺の酒》），這篇小說給了擔任中學校長的鄉下老人，其舊式情感的宣洩口。這名老人把現在的天皇（昭和天皇）視為一個有血肉之軀的人，終其一生對他抱持好感。這名老人，從這天生的好感情中，希望天皇能從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以一個平凡的人生活下去。

其後，中野重治還寫了一部描述「東大新人會」的長篇小說，題為《五臟六腑》，是指日本和歌（古代詩歌）傳統中的「枕詞」\*，它可以引發內心的各種思緒。小說這樣寫道：主角跟作者一樣是「東大新人會」的成員，也同樣是去拜訪一名東大的新人會成員，這名東大學生是子爵的兒子。主角在這宅邸中，看見一名老女傭因為端出微溫的茶水而遭到朋友叱責的情景。主角看到友人冷漠的叱責方式，不但覺得格格不入，還產生一種不同於內心的感情和思想。這是支撐同一政治思想的另一情感伏流。於是主角又想起參加某著名青年教授演講會時的情形。這名青年教授與現實存在的福本和夫極為相

似。福本倡導的理論是，為了淨化左翼領導者的思想，激進派知識分子在人民與真理結合之前，應該從人民中分離出來。演講者的風采似乎很吸引主角。聽眾裡的大學生用德文向講台上發問時，青年教授也引用德文術語回答提問。回想當時的情景，雷和閃電的記憶突然浮現在主角的腦海中。孩提時期，主角和農村的其他小孩一樣，相信閃電會帶來稻穀的豐收。他真想對著自己的大學同志——新人會的成員，大聲喊道：「這就是我的哲學，我相信泛神論（用今日的講法，相當於萬物有靈論）！」

中野重治本身或許不好意思在新人會這樣叫喊，但是作者在回顧以「東大新人會」成員度過青春時光時，有意敞開當時所處的心境，藉此照亮同為新人會成員的思想——即他藏在心中的無意識的潛流。外國傳入的用語沒有撼動人心的力量，要取得撼動人心的力量，必須移至該社會古老的傳統中培育，使其脫胎重生。青年時代的中野重治似乎已經出現這種焦慮，儘管這種焦慮，要到三〇年代開始才能完全表現出來。可以說，中野重治藉由《五臟六腑》這部小說，才把他在一九三五年戰爭期間轉向和釋放後所發表的〈村中的家〉中找到的新方向更往前推進。

\*一種日語修辭法，多用於和歌等韻文。與主題無關，冠於某詞之前起導入作用的固定表達。

這裡又存在一個問題。鎖國性這種日本文化的特性，是在日本仍屬農業國，尚未像現在負擔這麼多人口的時代裡所培育而存續下來的。但是現在戰爭結束，尤其進入六〇年代的高度經濟成長後，二十多歲的青年從事農業的比例，在一九六五年降到百分之七，多數的勞動人口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的領域。不過，成為日本文化特性的鎖國性，絕不可能在短期間內消失。鎖國性時時刻刻都要面臨各種狀況所帶來的新難題。只要鎖國性代表日本文化的主要傾向，日本就無法有效地解決日本現今所存在的問題。「東大新人會」的成員已經自覺到這種新處境的艱困，但不能說他們已具有充分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洞察力。他們不僅對日本的未來欠缺洞察力，也欠缺對自身未來的洞察力！

## 關於國體

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

鎖國性這種文化特徵，比一九三一年至四五五年間，日本政治史上廣泛使用的「國體」概念更具根源性，所以我們可以把國體概念放在鎖國性這種文化特徵的延長線上來加以理解。國體的概念在這段漫長的戰爭時期被當成強而有力的語言工具，用來防禦或攻擊日本人的政治地位。

隨著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美國對日本進行軍事佔領，「國體」一詞，才被吞沒在新的政治論點中而消失無蹤。然而，無關乎語詞，其功能（亦即曾藉由這語詞所表現的概念）仍以隱蔽的形式寄存在目前的日本政治中發揮作用。

「國體」一詞的起源，可見於吉田寅次郎與山縣大華往來的書簡中<sup>23</sup>。吉田認為，此語指涉日本民族特有的推進力量。他的論敵山縣大華則不承認日本民族中有這種特有的

23. 引自橋川文三〈国体論の連想〉一文（《展望》一九七五年九月号）。吉田松陰（即吉田寅次郎）與山縣大華的論戰如下：

東西。山縣指出，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有同樣的推進力量，因此「國體」概念並非日本所特有。吉田的國體概念可以視為繼承日本民族的傳統；如果這樣解釋，我們也可以把這概念當成足以經歷各式檢驗的事物來加以接納。但是這概念其後的歷史，卻不採取此種方向發展。明治維新以後，「國體」已被用來指稱日本國現在的政體，以及現存政治秩序所特有的東西。所以，這種語辭已經完成如下任務：即照亮現今日本的政治秩序，把現存秩序視為自古不變的投影。《古事記》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文字記錄，這本書記載著天皇家族的祖先從天而降的過程。根據這個故事，「國體」可解釋成：以眾神之後綿延不絕、萬世一系的天皇家系為中心，並以天皇家系為信仰核心的概念。

現在，我就從橋川文三的記述來討論國體概念的歷史。橋川指出，明治憲法公布之前，憲法的主要設計師伊藤博文與其助手金子堅太郎間曾發生爭論，彷彿重演吉田寅次郎與山縣大華間對國體概念起源的對立。伊藤主張國體並非限於日本所特有，其他國家也有各自的國體；金子則認為不應該只把國體拉回到國家的基本結構，而主張那是日本特有的東西。在戰爭期間的日本，金子的主張是日本政府所認同的正統立場，其他的觀點均無存在餘地。

十五年戰爭開始之前，日本教育體系的設計分為兩種：在小學教育與士兵的教育裡，採以日本國家神話為主軸的世界觀；在作為最高學府的大學和高等教育中，則採取歐洲為範本的教育方針。這些被期待成為日本領導者的人，都必須被訓練成在國際汪洋中，具有充分知識為日本掌舵前進的專家。明治日本的建造者即有此一區別。

「……道為天下公共之道，同也；國體為一國之體，獨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同也；皇朝君臣之義，如卓越於萬國者，一國之獨也。」吉田松陰這樣闡述自己的國體論，當時代表長州藩的儒者山縣大華，則歸咎「國體」的用語只具水戶學的怪異性質，又說：「道為天地間之一理，其乃天理所生，我與人無差，我國與他國亦無別。」「天地以陰陽五行之氣生成人物，而後以陰陽五行之理蘊藏其中。此理即為人倫五常之道。此為天地之間，大凡人物者皆同之處，豈唯和漢有之？乃世界萬國皆同也。」他自始反對一國獨自之道（國體）的想法，並以「我國君臣之義卓越於萬國者，所在何處」加以反駁。

橋川指出，幕末時期吉田松陰與山縣大華的國體論戰，似乎也延續到明治十七年左右伊藤博文與金子堅太郎的論戰。這時候，代表普遍主義的伊藤博文類似山縣大華，而代表特殊主義的金子堅太郎則類似吉田松陰。

依明治時代建造者的觀點而言，日本人應該讓作為一個國家宗教的密教和顯教部分的信徒，分別接受不同的訓練。這是新國家的建造者對日本自鎖國狀態以來各種困難的解決方式。他們在國際政治權力的波濤中為國家掌舵的同時，便儘量在不損及明治之前家族制度與村落制度的強大結合力下，來完成這項工作。為了達此目的，他們試圖把自己新發明的「家族國家」，牢牢地置於天皇家族乃由天而降、萬世一系這個神話上。然而，他們認為僅此仍不充分，還必須訓練那些可能成為未來國家領導者的青年，習得足以和同一時代西歐各國領導者抗衡的教養和技術。

在日俄戰爭以後，依舊存活的新國家的建造者，被稱為「元老」。他們雖然垂垂老矣，但其中仍有人致力把幕末時代經歷的危機感傳承給年輕的繼承者，期望這些繼承者在充分理解國家宗教的密教部分後，能指揮顯教的部分。元老中最後一位公卿出身的是西園寺公望，去世於一九四〇年，可是他的繼承者近衛文麿公爵卻辜負了上述的期待<sup>34</sup>。

包括元老在內的重臣階層，雖然沒有對議會或官僚機構負責的公眾地位，卻能夠和天皇直接對話。因此在遇到重大議題必須做出決斷，導致引發意見對立時，他們就發揮了一種居中折衝的屏風功能。但隨著青年軍官的登場，這些元老的功能逐漸失去效用。



青年軍官利用統帥權的特權，再透過軍部機構向天皇施加壓力。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可說是重臣階層無法隱身於屏風後發揮作用的時代。不過，戰爭即將結束的一九四五年中期，那些比較年輕的所謂準重臣階層，雖然不像明治國家的建造者那般年老，卻繼承著明治維新時代的危機感。他們在明治初期被培育出來，形成與法律位置無關的不定型團體。他們透過秘密行動與交換機密來逼退軍事機構的領導者，成功地引出肯聽老人忠告的退伍老軍人。戰爭時期的最後首相——鈴木貫太郎（1867-1948），是日俄戰爭時水雷戰隊指揮官，其後擔任天皇的侍從長。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遭到反對軍事獨裁的青年軍官襲擊而負傷。一九四五年四月，鈴木被任命為首相，導引日本走向接受投降。剛

24.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原田文書）全八卷（岩波書店，一九五〇—五六年，一九八二年再版）。有關追蹤重臣們如何發動戰爭的記述，最近（在加拿大講學時，無法加以運用）有勝田龍夫的《重臣たちの昭和史》上・下（文藝春秋，一九八一年）。這本書不僅運用原田的文件，還引述《木戶幸一日記》（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六年）、《木戶幸一關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六年）以及木戶幸一所發表的談話。竹山道雄的《昭和の精神史》（新潮社，一九五六年）雖然是較早發表的作品，但我的思考方式深受其影響，這本書是從重臣階層自由主義的視角來掌握戰爭的時代。

開始，他聲明要致力於維護國體，藉此讓民眾期望這場戰爭會戰到最後，同時也讓與他共同行動的少數近臣，期望可用徹底抗戰以外的方法來護持日本。在做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決定之後，他對報紙聲明：國體已獲得維護。從鈴木對全體國民及其同夥的活動方式中，可以看出靈活運用國家宗教的密教部分與顯教部分的精采事例。

日本國家宗教的密教部分受到歐洲文明的強烈影響。明治維新後不久，一八七一年新政府將機構的領導階層一分為二，也就是把部分富有學習能力的年輕人送去歐洲與美國學習西方的制度。當時一舉派出一百零六名高級官員到海外，對貧窮的後進國而言，絕對是花費金錢的冒險，況且當時的日本正為嚴重的經濟問題所苦。遣歐使節團是由掌握新政府的最高權力、當時四十一歲的岩倉具視所率領，同行的包括時年三十八歲的木戶孝允和同齡的大久保利通。也就是說，其中包括了被稱為「維新三傑」的多數派，而維新三傑中留在日本國內的僅剩西鄉隆盛一人。歐美使節團歸國後，西鄉隆盛即領導反政府的內亂，表明反對現居新政府要職的歸國者所採行的歐化政策。派遣團中還包括當時年僅三十歲的伊藤博文，他在政府採行歐化內閣制度以後，出任日本首位內閣總理大臣，也成為日本君主立憲國的主要設計師。

這些高級官員派遣團對西方諸國科技的發達與效率印象深刻，也對推行有效率的統治組織所依據的宗教及倫理信條感到羨慕。因此他們試圖修改日本的神道傳統，採納作為支撐高效率技術文明的力量。於是，「天皇崇拜」被當成可讓日本更加繁榮的技術文明殿堂之思想基礎。

換句話說，有關皇室的傳說，即依此構想在政府製造的意識型態中被改造了。我們閱讀日本最古老的書《古事記》時可以發現，天皇及其祖神們曾犯下許多錯誤，因為他們世俗的動機而相互牽制、爭戰與失敗的記載，但這些愚行卻在書中不以為恥地傳頌下來！

我們從《古事記》的傳說中看不到眾神無謬的思想，其中顯然包含一種作為多神教的神道教。然而，現今在新生日本文明的設計圖，被改寫的國家宗教中，神道已扮演極似西方諸國的基督教角色，而帶有濃厚的一神教特性。於是，永不會犯錯的天皇形象出現了。此一形象在明治時代與大正時代具有比喻的性質——這是日本國家由熟悉國家宗教密教部分的元老、重臣階層與高級官員共同推動的時代。

明治政府採用的政治思想順利地根植在日本國民的心中，善惡價值判斷的基準全依據天皇發布的勅語。所謂「勅語」，就是繼承自傳說時代以來，歷代天皇公布旨意的形

式。明治維新之後，軍人勅諭和教育勅語是最重要的文獻。另外還有中日戰爭開始與結束時發布的勅語、日俄戰爭開始與結束時發布的勅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與結束時發布的勅語，以及太平洋戰爭開始與結束時發布的勅語。這一系列勅語由一九四六年元旦天皇發表的「人間宣言」<sup>\*</sup>宣告結束，而最後宣言是由佔領軍所起草的。

這些勅語中佔有重要位置的詞彙，被日本人用來保護自身道德和政治上的地位，而熟練地使用這些關鍵詞彙，成為忠誠臣民對天皇效命的最佳證明。在小學六年級的義務教育中，即灌輸這些詞彙的使用方法。另外，單就男子而言，也會在年滿二十歲，必須於軍中服二年義務兵役期間接受這種思想灌輸。教育勅語在全年重大節慶的日子由校長宣讀出來，其間學生們被要求至少在儀式進行中低頭站著聽完勅語。這對體弱的小孩子來說，簡直就是一種拷刑。在軍隊裡，新兵被要求完整背誦出冗長的軍人勅諭，這非常耗費腦力。許多孩童和新兵因為不能順暢地背誦出勅語，或因為無法流利寫出勅語中的漢字而遭到毆打。這種儀式把相同的條件——反射植入全體日本國民。除了勅語的朗讀和背誦之外，還有一種儀式，就是在小學校園的特殊儲藏室內懸掛天皇的照片表示敬意。教師和學生經過儲藏室時，被要求恭敬地行最敬禮。這是十五年戰爭結束前，天皇在宗

教、道德與政治上權威的根源。

這些勅語中的關鍵詞彙，無論背誦或正確寫出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練習。一旦掌握使用這些詞彙的訣竅，就能不假思索地隨口說出或隨筆寫下。如此一來，由於這些關鍵詞彙的使用方法具有一定的排列組合規則，依據此規則，無論組織什麼樣的文章，都會變成具有相同的內涵，不需結合實際經驗加以證實。當時的中央團體及其下面的各種分會，和許多擔任名譽職的人，就是依據這種排列組合的規則發表演說。此外，下級軍官對士兵的訓話也如出一轍。

我不認為這是近代日本才有的特殊現象，在實行神權政治的地方，絕對有其類似的政治慣例。明治以後的政府，除了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質之外，也包含這種神權政治的特質。至於兩者是如何組合交集的，我們必須審慎看待。從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以及日本藉此尋求出路，於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國所開啟的時代裡，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神權政治的特質。此時，日本國民經由政府的六年小學教育和只針對男性的徵兵制度，八十幾年來幾乎都習慣地處於相同的條件——反射下，所有的男性都能為同一目標行動。問題是，

\*在這個宣言中，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不是下凡的神，即否定天皇擁有的神權。

在日本投降後，日本人這種慣性難除的條件——反射都到哪裡去了？不過，這並不是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問題。

根據丸山真男的研究，日本人的政治活動乃以三種功能分類：第一是神轎，第二是官吏，第三則是無視法紀的人<sup>25</sup>。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官吏獲得了很大的權力。他們經過公平的考試制度，從全國人民中被挑選出來，政治上的重要決策就由各部門擔任重要職務的官吏決定。負責各個專門領域的官吏，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雖然不高，但也佔有很大的分量。現在日本中央政府的各省，實際上已經被細分為更小的迷你省，裡面的長官，就是各課的課長。一旦官吏所作的行政處分受到人民的批判，沒有地位的人民便會透過各種壓力團體表達他們的不滿，這些壓力團體的代表就是無視法紀的人。所謂神轎代表權威，官吏代表權力，無視法紀的人則代表暴力。

當明治國家建造者所設計的秩序無法運作時，國民就透過無視法紀的人表現他們積存的不滿，迫使當權的官吏們真正落實明治國家所採用的政治思想。一旦這政治思想如實地予以解釋，那麼所有宗教、道德與政治上的價值都將源於繼承諸神以來、萬世一系

地位的現任天皇。因此對西方傳入的民主思想和世界觀，以及同樣從西方引進以人本為主的解釋觀點，都必須加以完全否定。過去由政府高官當作譬喻使用的各種詞彙，現在都必須如實地加以接受，而且直接指向事實和行動。

倡導此一運動的論者蓑田胸喜曾在一九三三年寫道<sup>26</sup>，日本民族在對現今擁戴的天皇（意即「現人神」<sup>\*</sup>）的信仰中，因為具有建國神話和國家宗教，因此可用儒教、佛教、基督教以及社會主義至今都無法實現的方法，來實踐世界史託付給人類的使命。當我們奉天皇為「現人神」，忠誠守護我們的祖國時，我們才依此服務人類。

依蓑田的觀點，讓日本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乃日本人為人類貢獻的唯一的可能之路。當時，蓑田在日本少數私立大學的慶應義塾大學擔任邏輯學和心理學教授。隨著蓑

25.丸山真男《軍国支配者の精神形態》（《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來社，一九五七年）。

26.「試想，儒教、佛教、基督教乃至社會主義都不能實現之際，地球上唯有我大和民族、日本國民在現人神的信仰中具現建國神話傳說與國民宗教，日後勢能實現世界史所賦予的人道使命。是故，我們日本國民應該「忠誠地供奉現人神，吾皇大君」守護「祖國日本」，即守護「人道」。『日本的』即是「人道的」。」（蓑田胸喜《學術維新原理日本》原理日本社，一九三三年）。

\*借人的形象出現在現世的神，日本人對天皇的尊稱。

田論點的日漸得勢，使得京都大學法學院的自由主義教授們遭到去職。京都大學在日本各學校金字塔組織中佔有次高的地位。由此可見，蓑田胸喜的論點具有足以改變這所大學法學院性質的力量。接著，他的攻擊目標轉向金字塔頂端的東京大學，迅即又成功地打敗了先前的憲法正統解釋——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

美濃部達吉在一九三五年遭到檢察署傳喚，就日本現行法下是否可以批判「勅語」而不受法律制裁，接受調查。擔任調查的戶澤檢察官，就讀東京大學時，曾跟隨美濃部達吉學習法律。他是因為學習天皇機關說的憲法而通過司法官考試的人，因此非常瞭解其師的學說。調查結束後一天，美濃部達吉探討憲法的三本著作迅即遭到查禁，也就是依法不得公開販售。美濃部達吉並沒有撤回他的理論，但於同一年退出貴族院的席位。

被當作神轎抬著不放的天皇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當時，擔任天皇侍從武官長的本庄繁陸軍上將（1876-1945）在日記中，曾記下他與天皇的對話<sup>27</sup>。本庄試圖把當時陸軍的想法傳達給天皇，天皇對此說出這樣的感想：「如果我們用思想或信念壓抑科學，世界的進步就會停頓下來。如此一來，連進化論之類的思想也被推翻了——然而，這並不是說不需要思想和信念。總之，我認為思想與科學應該同時並進。」



這是天皇一九三五年時的想法。然而，「無視法紀的人」要求政府如實解釋建國神話而展開運動時，多數掌權的官吏都不敢本於職責而不惜地位予以否定。天皇雖然在本庄陸軍上將的日記裡留下他的私人對話，但他並沒有公開指陳政府新訂政策的不妥。相反的，天皇隨著對中國戰爭的展開而改變想法。這可以從他沒有支持撤出「大陸派遣軍」，以結束對中國戰爭動向的政治動作看出來。<sup>28</sup>

明治初期以來，日本的官僚機構極力把有能力的年輕人安排在重要的職位上，軍隊的組織也不例外。在一九三一年以後的年代裡，至少在形式上還保留這種架構。在陸軍和海軍雙方參謀本部的成員中都有能力卓越的青年士官，他們的任務是就日本與假想敵國雙方的資源提供最新情報。我曾得到當時最年輕的參謀軍官——陸軍的林三郎與海軍的高橋甫親口證實，當我問及日本對英、美開戰是否有勝算時，他們當時都提不出肯定

27. 依戰敗後自決的本庄繁（1876-1945）陸軍上將的遺囑表示，日記內容不得外流，但作家尾崎士郎用抄錄的方式，將其對話披露在記實小說《天皇機關說》（一九五一年）中。他與天皇的談話內容載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28. 井上清《天皇の戰爭責任》（現代評論社，一九七五年）。

的答案<sup>23</sup>。儘管從參謀部官員僅得到這種消極的預測，太平洋戰爭還是爆發了。其宣稱的理由是石油存量不久即將告罄，倘若再延緩開戰的時間，對日本將更形不利。而隱藏在這判斷背後的理由是，已經持續十年為總體戰所做的努力，不能因為政府機構受到打擊而停頓下來。

至少在一九三一年以來，領導者對日本與假想敵國在軍力和經濟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給國民相反的資訊，導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騙的境地。對國家的領導者而言，要從對國民的持續欺騙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難的。其困難就隱藏在，讓當時日本的領導者踏上太平洋戰爭之路的決策。回到前述的譬喻來說，由於日本國家宗教的顯教部分在漫長的歲月裡吞沒了密教部分，使得日本國家原始建造者們的構想因而瓦解了。

隨著事件的發展，國家主義運動者相繼暗殺掉自由主義政治家和財經界人士，也造成無視法紀的人與青年士官結合，試圖展開軍事政變失敗的結果。不久，派至中國大陸軍隊的參謀軍官發動「滿洲事變」，中央政府卻對派遣軍發動的意外行動表示支持。此行動也導致滿洲國的成立，遂發展成與中國長期交戰的局面。缺乏結束這場戰局的能，是日本後來陷入太平洋戰爭泥沼的原因。簡單地說，日本在中日戰爭中打敗了。不

過，至今仍有許多日本人在日本戰敗後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

在對抗英、美的壓力下，為了致力於不受矚目也沒有宣戰、卻持續與中國進行的困難戰鬥，政府發布非常時期宣言，藉由各種法律來統一國民的思想。政府決定在使用「國體」一詞上有更新的解釋和更明確的意義，以作為統一國民思想的工具，並二度進行「國體明徵」的宣示。由此看來，高級官僚已經敗給那些與青年軍官結合展開活動的無視法紀的右翼分子。「大政翼贊會」成立，目的在於尋求各種職業的日本人協助，藉此貫徹政府的既定政策；堅持打完這場未公開宣戰的戰爭。此方向意味著與美國、英國、荷蘭三國的衝突。不久，日本政府向美、英、荷宣戰。這段期間，議會制度仍被保留，但政黨皆自動解散，併入現政府支持的單一政黨。一九四二年舉行所謂「翼贊選舉」的大選，這不是自由選舉，警察和右翼暴力干涉了選舉。當時受大政翼贊會提名當選的眾議院議員有三百八十一人；非大政翼贊會提名當選的議員只有八十五人。此一選舉顯示：即使到這時期，仍存在著抗議政府指導戰爭與箝制言論的反对聲音。

29. 高橋甫、林三郎（旧軍人の場合）（《芽》一九五三年八月号）。

\* 明確以天皇為中心的國體概念，為戰前喧囂一時的右傾思想。

《漫畫》（《漫畫》）雜誌於一九四二年五月號刊出一則漫畫，作者是杉浦幸雄，題為〈徹底革除英美思想〉（〈米英頭方追放〉）。在這則漫畫發表當時，凡是頭髮變成蜷曲狀者都被視為「非國民」\*，違反國體。國家主義者甚至發起所謂的「反燙髮運動」。此一事件的背景是，漫畫裡一名年輕女性正用力搔著頭皮，西方傳來的思想使像頭皮屑般從她頭上掉了下來。一九三一年政府展開的轉向誘導至此已到達終點。所有外國傳來的思想像頭皮屑般從日本人的頭上掉下後，最後還會留下什麼呢？就這則漫畫發表的當時而言，留下來的只有日本政府所灌輸的思想吧？那就是以「現人神」——天皇的無謬性為中心所建構出的國體觀念。然而，隨著日本的戰敗，同一個天皇親自宣稱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之後，國體觀念也像一小片頭皮屑般從頭上掉下來，之後就只剩下肉體而已。這就是戰敗後流行至今，經過形態變化而留存下來的所謂「肉體主義」的思想由來。坂口安吾、田村泰次郎和田中英光等「無賴派」<sup>‡</sup>所代表的戰後文藝主張，忠於肉體的需索就是最崇高的價值！有關田中英光，容後再行討論。一九六〇年起所發生的「經濟動物」傾向，可說是從戰爭期間播下的種子中，萌芽、茁壯、成熟的思想。不過，長年根

植日本人肉體中的條件——反射依然存在。這是把過去的文化儲存在心底的潛在記憶。從這意義來說，國體概念的形態仍存在著。雖然言語已經消失，但言語所指涉的東西依舊存在。在此，我們再回到因為戰敗後的條件發生些許變化，卻依舊殘存的鎖國性形態。與大多數日本人是農民的德川時代相比，現在農民只佔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想必鎖國性會難以獲得日本人的支持。然而，日本四面環海，完全沒有陸上的國界，又使用相同的語言，只要狹窄的島嶼中繼續住著稠密的人口，鎖國性就沒那麼容易消除。因此，今後我們還必須不斷提問：國體觀念會以何種形式保留下來？

\*意指「賣國賊、叛徒」。

#「無賴派」為二戰後出現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石川淳、織田作之助、坂口安吾、太宰治等作家。作品採用反傳統的自嘲式的手法，對社會罪惡和人生予以揶揄、抨擊、渲染幻滅情緒，試圖在沉淪中發現美。

## 大亞細亞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

所謂「大亞細亞」，是日本人用來表達與亞洲大陸居民關係的語辭。更精確地說，是指與包含日本人在內的亞洲人，和平共存的理想大共同體<sup>30</sup>。

早在幕末維新之前——中國鴉片戰爭時期，日本的先驅者們抱持的危機感中，已經萌生這種觀念了。明治維新之後，儘管也關注朝鮮與中國，但仍有許多像福澤諭吉

30. 竹內好是《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九卷，筑摩書房，一九六三年）的編者，他探索日

本此一思想的系譜。在該卷序文〈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中，竹內好認為亞細亞主義的基礎含有大亞細亞的理念，基於此理念（包含日本的），亞細亞互動關係究竟（從日本的立場而言）其侵略性和壓抑性到何種程度？對此每個思想領域的情況各不相同。竹內好的亞細亞主義論述還包括內田良平和岩波茂雄的觀點。（補記：松本健一《竹內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精読》岩波現代文庫，二〇〇〇年。）

(1835-1901) 那樣不為亞洲問題所吸引的人，轉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學習歐洲的制度上。之後，當他們再度把目光轉向朝鮮和中國的時候，自認為已經有資格把速成學到的西方文明作法強塞給中國與朝鮮，扮演居高臨下的文明代表者的角色。

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國之舉由派遣軍開啟，並以中央政府頗覺意外的發展開始。之後，日本的中央政府雖然支持這項軍事行動，但無不為了使瞬息多變的發展正當化和巧妙而費盡苦思。起先只有中央政府以外的右翼評論家發表泛泛之論，試圖合理化這項軍事行動。這些右翼成員與負責作戰的陸軍青年軍官間互通有無地展開活動。在既成事實不斷累積之後，中央政府才於「滿洲事變」(一九三一年)爆發後九年，宣布其政治思想上的根據。這是由當時擔任近衛內閣外務大臣\*的松岡洋右(1880-1946)，於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所發表的聲明<sup>31</sup>，其內容如下：

我們現在的政策乃在於依據皇道的偉大精神，建立結合日本、滿洲國和中國的大東亞共榮圈。(中略)大東亞共榮圈之中，當然也包括法屬印度支那和荷屬印度尼西亞。

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是依據軍事需要而決定的。為了確保一九三一年以後在軍事發展上所獲得的利權，陸軍、海軍參謀官與學者合作完成多項草案。在這些草案提出之前，已經有石原莞爾（1889-1949）倡議東亞聯盟的構想。石原莞爾是對於「滿洲事變」及其後發生軍事行動應負起責任的關東軍參謀官之一。石原認為，日本必須覺悟，不久將會與包括蘇俄在內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發生衝突，所以（他本身對這開戰也有責任）和中國間的對戰狀態不能長期持續下去。他的解決方案是，日本、中國和滿洲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友好關係。石原是滿洲國的主要建造者之一。然而，滿洲國成立後，隨著東條英機的掌權，石原被逐出權力的核心。不久，所有的陸軍，甚至稍後的中央政府，都被納入東條的勢力掌控之下。石原在陸軍的所有重要職位全被解除，因為在東條看來，石原的構想力具有謀叛的因子。

\*相當於台灣的外交部長。

31. 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松岡洋右外相所發表的談話（《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四〇年八月二日號）。



一九三七年六月，近衛文麿出任日本的首相。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六年，近衛的老同學後藤隆之助（1898-1984）獲得近衛的援助，創立了「昭和研究會」<sup>32</sup>。提案設立昭和同學會の後藤隆之助意圖藉由這個組織，阻止當時逐漸傾向軍國主義的趨勢。為了此目的，後藤認為只要有助於解決當前的問題，他願意借重任何學派的人力。當時，除了身陷獄中的日本共產黨人以外，其餘成員幾乎已完全崩潰。因此，後藤隆之助認為，只要原馬克思主義學者及自由主義學者，對日本軍事獨裁政權採取靈活而堅決的反對立場，邀請他們共同協助就不會那麼困難。尾崎秀實（1901-1944）是在一九三七年加入這個團體的。

在昭和研究會中設有十二個獨立的研究會，尾崎秀實不僅擔任其中中國問題研究會的主席，還負責全部十二個研究會的協調工作。尾崎擔任中國研究會的主席三年半，直到「昭和研究會」被改組為半官方的「大政翼贊會」而解任為止。這三年半的期間，尾崎以作為近衛總理大臣的幕僚成員而活躍於政壇。近衛在一九三七年擔任總理大臣之後，即組織以總理大臣為核心的早餐會。總理大臣在參加政府會議前，擬定各項政策的幕僚們先聚於一室，把彙整的資訊提供給總理大臣。尾崎雖然不是每次都出

席早餐會，卻負有推派代表參加早餐會的任務。在同一時期，尾崎也與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保持密切的聯繫。佐爾格是德國的報社記者，因為得到當時德國大使的信賴，能獲取秘密的情報。後來，佐爾格以蘇俄間諜的罪名被日本警察逮捕，尾崎也以共犯的罪名遭到逮捕。尾崎在獄中時，寫下了「我顛倒了善惡」的字句<sup>33</sup>，或許從中可

32. 以「昭和研究会」舊成員的口述為主所編纂的紀錄，收錄在昭和同人會編著，後藤隆之助監修《昭和研究会》（經濟往来社，一九六八年）。

「昭和研究会」創立時擔任辦公室職員的酒井三郎所寫的紀錄，收錄在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T B Sブリタニカ，一九七九年）。

33. 尾崎秀實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廿三日寄出的信件，收錄在尾崎秀實《愛情はふる星のごとく》（世界評論社，一九四六年）。現在，尾崎的著作，包含書信和報告書，都收錄在《尾崎秀實著作集》全四卷（勁草書房，一九七七年）。

關於尾崎的傳記，風間道太郎的《尾崎秀実伝》（法政大学出版社，初版一九六八年，補訂版一九七六年）是比較可信的作品。另外，石垣綾子《回想のスメドレー》（みすず書房，一九六七年）對尾崎的性格有深刻的觀察。

以顯示出他的反省：與其作為佐爾格集團中的一員積極活動，倒不如藉由擔任中國問題的專業評論家兼首相智囊的角色，把全部精力投注在中止中日戰爭的努力上。

作為中國問題專家的尾崎秀實，曾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號的《中央公論》雜誌上，發表題為〈「東亞協同體」的理念及其形成的客觀基礎〉（〈「東亞協同體」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觀的基礎〉）的文章。他說：「實踐東亞協同體理論的過程中所伴隨發展的得失，雖然乃視中日抗爭的張力關係或國際關係而定，但在日本國內推動此事產生的勢力集結，才是最重要的問題。」他還預言，實際問題是發生在和日本國內資本家間的糾葛。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佐爾格與尾崎遭到絞刑處決。

從軍事觀點來看，蘇俄獲得佐爾格集團提供「日本不會進攻俄國」的情報，意味著史達林可以免除準備兩面作戰的重擔。然而，尾崎位於大亞細亞主義評論家的地位，不應該因為他與佐爾格集團有所牽扯而被貶損。最終判決的審判長高田正是宣判尾崎死刑的法官，他對前近衛內閣司法大臣、因結識尾崎而失去職位的風見章說：「尾崎是值得尊敬的人，他能將信念付諸行動，在這一點上，我非常尊敬他。」

雖然和佐爾格共同行動，但尾崎並沒有接受任何報酬，他是為了信念而賭上性命。尾崎與日本共產黨及蘇俄的國際共產黨並沒有關係，作為一名獨立的共產主義者，他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以及中國的共產主義深表同情，是近乎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尾崎認為，要保衛日本人，日本人就必須與試圖從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桎梏中解放自己的中國人通力合作。

尾崎的傳記顯示，這種大亞細亞的觀點是從他自己的構想發展出來的。尾崎是日本報社記者的兒子，在台灣長大。日本人對台灣住民的歧視待遇，在他的記憶深處留下痛苦的經驗，後來這卻成為他喪失生命的導因。他前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就讀，之後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當時尾崎並沒有醉心於大正時期民主主義的代表學者美濃部達吉，反而為美濃部的對手——當時是東大右翼運動評論家代表的憲法學者上杉慎吉所吸引。有趣的是，尾崎一生對上杉慎吉教授敬愛有加，即使在獄中所寫的書簡，也以自然流露的情感回憶舊師。

尾崎在第一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的學生時期，並未加入當時流行的新人會運動，對投入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朋友也沒有深入的交往，這是他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

影響，卻長期未受到警察注意的原因。尾崎在東京大學的研究所短暫就讀後，即進入朝日新聞社工作，並以特派員的身分被派駐到上海。他在上海時，結識了美籍報社記者——現在仍以左翼作家聞名的艾格尼思·史萊特萊（Agnes Smedley），並透過史萊特萊與德國記者佐爾格會晤。雖然他們三人有交換情報的共同行動，但日本的思想警察並未加以注意，因為當時日本警察的活動範圍只限於日本境內。然而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

一九三四年，在日本共產黨經過幾波的「集體轉向」而解體之際，尾崎調回日本《朝日新聞》總社工作。從那時起，他以中國問題評論家的身分四處活動，也因為對中國共產黨知之甚詳發揮出深入的觀察力，而開始受到矚目。與這些公開活動並行的是，他又以總理大臣的幕僚身分在政界幕後暗中活動。此時，他的老朋友佐爾格突然成為派駐東京的外國報社記者，出現在他的面前。這對尾崎來說，意謂著另一項秘密活動的開始。而這項活動，最後竟然會奪走他的生命。尾崎被捕並判處死刑之後，包括眾多右翼政治立場鮮明的人士及其朋友們都紛紛表示惋惜，由此可見他的人品。他的主要委任律師——竹內金太郎，是一位出了名有骨氣的國家主義者。他一直為尾崎辯護到被處決為

止，並稱尾崎為真正的愛國者。尾崎既不受蘇俄政府指揮，也沒有受到蘇聯國際共產黨對日本狀況判斷的影響。按照尾崎的分析，運動的主要打擊目標應該是財閥和軍閥的結合，至於天皇制，此時只是次要的目標。依照他對自己的評價，他是一個趨近於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有關尾崎的活動，即使在戰敗後，日本共產黨一直沒有給予公開的評價。

大亞細亞的觀念被政府納入施政綱領後，政府便籌劃出許多鼓吹大亞細亞理想的聲明、儀式與會議。向美、英、荷宣戰時，政府對如何稱呼這場戰爭，一時頗為躊躇。日本已經有十年期間持續在這種沒有宣戰的戰爭狀態中，既然決定宣戰，就不能不對此戰爭狀態予以命名。在政府的會議中，曾經提出過若干名稱，例如「太平洋戰爭」或「對美英戰爭」等。最後決定命名為「大東亞戰爭」，選擇這個名稱的理由是，其他候補的名稱並沒有把日本與中國之間持續進行的戰爭狀態包括在內，而此戰鬥狀態才是這次宣戰的真正原因。

在日本戰敗的歲月裡，日本人透過向美國政府借來的眼鏡回顧過去，認為這場戰爭主要是用來對付美國，於是從中日戰爭的脈絡中將這場戰爭割離出來。這樣做，日本

人就不必正視敗給中國——長期以來被視為軍事上的弱者——這個不光榮的事實。對於一九三一年到四五年間進行的戰爭，我提議取名為「十五年戰爭」，原因是要把這場戰爭置於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以來，看似不連續卻又連續不斷的戰鬥狀態脈絡中。另外一個與其說是心理的，毋寧說是反心理的理由，就是對我們這一代在戰爭時期度過小學生涯的人來說，由於政府一再提出聲明，才沒有察覺到戰爭其實已經持續很久，諸如「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或「日支事變」之類的個別名稱，反讓人們誤以為是個別的戰爭狀態。我認為，這是我們日本人抱持的主觀事實，若不破這個侷限，我們就無法瞭解這場戰爭的全貌。因此，這是一場可以視為持續了十五年的連續性戰爭。然而，雖然事實如此，這場漫長的戰爭背後並沒有一個指導戰爭的策劃者。石原莞爾陸軍中將曾經是挑起滿洲事變的始作俑者，也曾懷有防堵蘇俄及西方諸國的帝國主義的龐大構想，但他在這場戰爭初期已被逐出負責的職位，尤其對一九三七年以後進行的戰事來說，他本身也持反對的立場。這場漫長的戰爭之所以持續進行，是因為日本政府無力終止戰事，這才是真正的原由。換句話說，倘若沒有日本文化裡固有的鎖國性這個條件，這場戰爭肯定不會持續下去。

擔任總理大臣的東條英機上將，雖然沒有自己的創意構想，但他憑著調整及統率以軍人為中心的高級官僚的卓越能力，成功地掌握住政府的會議。他邀集菲律賓、印尼、泰國、印度、中國以及滿洲國的領導者到東京，舉行大東亞會議。參加會議的若干領導者，均能用清醒的目光來評估日本政府的戰爭目的，並有效地利用這次戰爭，加強他們自己在國內推動的獨立運動。

巴穆曾於一九三七年擔任緬甸第一任首相，一九三九年即組織自由同盟運動，意欲擺脫英國的支配，爭取緬甸的獨立；一九四三年以後出任緬甸獨立政府的元首，並與日本政府展開密切的活動往來。日本戰敗後，他隱居在日本的鄉下，不久即遭到佔領軍逮捕。一九六八年，他在《緬甸的活路——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 革命的回憶》（《ヒルマの活路——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 革命の回想》）一書中寫道<sup>34</sup>：

34. *Ba Maw, Breakthrough in Burma, Memoirs [巴穆的「回憶」] of a Revolution, 1939-194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我曾在新潟縣六日町拜訪戰敗後藏匿巴穆的今成拓三，基於這段機緣，我才得以聽到他的回憶。「大東亞共榮之夢」座談會（《日本の百年》筑摩書房，一九七八年，第一〇卷月報）。從這場座談會可以窺知，巴穆已然知道有別於他在回憶錄中的日本人。



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來說，他們被人種所束縛，而且這種觀念也最為偏頗。因此，以結果而言，他們完全缺乏理解外國人，或讓外國人理解自己想法的能力。正因為如此，在東南亞戰爭期間，無論事情好壞，在當地人看來，他們做的全是壞事。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只從日本人的角度看待一切，更糟糕的是，其他國家的國民與他們共事時還必須用相同的方式思考。對他們來說，要做事只有一條路而已，那就是用日本人的方式；他們只關心一個目的，就是日本國民的利益；對東亞各國而言只有一項使命，那就是與日本永遠結為一體，成為另外的滿洲國與朝鮮。以日本人種的立場強壓在他人身上，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因此，就結果而言，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我們當地居民間不可能產生真正的理解。

這就是身為亞洲領導者，同時也是東條英機首相最親密的朋友巴穆，代表出席一九四三年大東亞會議所作的感想。對日本國民深表同感的他也補充說道：

日本的所作所為只能說是悲劇。回顧歷史，我從未看過有哪個民族為了把亞洲從白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竟付出這麼多努力。不僅如此，我也很少看到一個為了助人解放，並在諸多事情作為模範的國家，居然受到當地人民的誤解。

菲律賓官僚機構的幹部曾明確答應美國政府，受到日本侵略時將會盡力抵抗，但屬於統治階層的大多數人，卻跟日軍的佔領政府合作。當時他們提出的藉口是，他們是為菲律賓人服務，是為了保護菲律賓人免受日軍的不當要求而工作。然而，仍有如湯馬士·康費沙那樣的人，不改其信念認為：即使美國陷入苦戰，也不應該破壞對美國人民的承諾<sup>35</sup>。根據康費沙的理論，軍人可以向強敵投降，但文官在道德上則沒有這種自由。因此，文官不應該和乘勝追擊的日軍合作。像康費沙這樣的人，都傾向使用游擊戰跟日軍作戰。麥克阿瑟將軍回到菲律賓開始反攻之後，主要的作戰方式集中在於獲取對日軍的勝利，毫不關注如何保護菲律賓人。在這個階段，日軍已無向美軍反擊的戰力，縱使置之不

35. David Joel Steinberg, *Philippine Collaboration in World War II*,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7.

山羊	綿羊	雞	鴨	鵝	火雞
10,186	1,384	1,300,754	2,754	259	173
5,130	870	528,470	2,040	130	70

理，也會自行瓦解。然而，軍隊的領導者並不會等待敵人自行瓦解。在這場戰爭最後的日子裡，由於美軍的持續轟炸，破壞了菲律賓人的生存空間。從這時候起，許多對日軍持續抵抗的菲律賓人才認為，美國終究不是菲律賓窮人的朋友。

對互相戰鬥的軍隊而言，不管在任何地方，要看清楚包圍自己的戰鬥對象，是非常困難的。根據記載，日本人戰敗之後，被送到菲律賓戰場的六十三萬日軍中，總計有四十八萬人死亡。日本人這樣回想的時候，卻忽略了在這場戰爭中，有將近一百萬的菲律賓人喪命。日本不但讓約莫五十萬的日本人白白送死，又跟美國人聯手殺了一百多萬的菲律賓人。不過，這個事實還未納入日本人的記憶中。

大岡昇平是在這場戰爭的最後階段，被送往菲律賓的士兵之一<sup>35</sup>。他被美軍俘虜，並在戰敗後寫下《俘虜記》與《野火》兩部小說。在日本文學的傳統中，小說家習慣透過美的形式來表現自身的經驗，實現此一形式也成為他努力的目標。之後，大岡昇平開始擺脫這種傳統，重新鬆綁這種美學形式的束縛，並試圖追尋自己戰爭經驗的細節。於是，在《萊特戰記》\*的紀錄

	水牛	肉牛	馬	豬
1931年1月	163,398	14,694	11,699	342,251
1945年1月	72,200	5,070	6,660	134,220

中，他找回許多在戰爭當時，士兵們肉眼所無法看見的事物。例如，他寫下日軍在佔領菲律賓的二年中，為萊特島上的居民所帶來的損害。這可從他書中引用的統計得知真相：

大岡昇平在書中描述由於日軍殺死水牛，而破壞菲律賓人生產手段的境況。他還不忘補充說，被殺死的水牛是地主所有，往往因每個地主的地位而具有不同的意義。地主將土地租給佃農時，佃農必須付給地主百分之六十的收成。所以在失去水牛後，佃農就沒辦法生存下去。如此一來，就不得不加入山裡的游擊隊了。

大岡昇平在這本書中，附了很多與菲律賓戰爭相關的書籍和小冊子的龐大文獻表，還強調這個文獻目錄是這本書最重要的部分。一位小說家話

36. 正如大岡昇平在《わが文学生活》（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五年）中所述，自從他在菲律賓作戰時面對自己之死，獲得把自己視為一個普通人的看法以來，縱使在《幼年》或《少年》這類自述傳中，也都採取將自己當作一個現象置於地理和社會史中探究的方法。用這方法寫出《野火》之後，便傾其全力在《イテ戦記》、《ミンドロ島ふたび》等作品中掌握構成作品根源的事實。

\* 書名的萊特島 (Leyte)，是麥克阿瑟反攻時在菲律賓登陸的島嶼。

出此言實在極為少見。在此，我們可以感受到，日本文學史與精神史已展現出全新的特質。從其字源來看，所謂的「大東亞」，是伴隨一九四〇年代日本政府的軍事需要而產生的字眼。戰爭即將結束前，由於勝利已經無望，日本政府決定讓亞洲各民族獨立。這個決定意味著日本政府不想再白費力氣，因為他們已經無法採取任何措施來改變當前的局勢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日本同意緬甸獨立。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菲律賓發表自由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在新加坡成立。日軍決定停戰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海軍默許印尼的領導者發表獨立宣言，以圖謀抵抗荷蘭的再次佔領。

這一切舉措，都不是日本政府在這些地區還維持軍事統治的時代所決定的。因此，並不能單純地從日本讓這些地方獨立的事實，就歸結說，日本政府曾為了讓亞洲各民族從西方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而作出努力。依結果判斷的話，日本政府的行動畢竟還是為亞洲各民族帶來解放與自由。然而，這並不是由於日本政府的企圖，而是透過亞洲各民族自身的努力所獲得的。

有關日本政府的活動，在此暫告一段落。從精神史來看，日本人的著作中有沿襲「大亞細亞」觀念的系統，這個系統與日本國家意圖藉由軍事武力稱霸亞洲的關注並不相同。

岡倉天心可說是發表這類作品的早期人物，此外還有宮崎滔天、北一輝和大川周明等。由於北一輝和大川周明與其後的軍事叛變有所牽扯，他們的大亞細亞思想性質因而受到質疑。竹內好可說是屬於這一系列作家中的最後一位。一九三〇年代，竹內好與幾位朋友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會」。在日本尚未向中國宣戰的對戰狀態期間，日本人長期用帶有輕蔑之意的「支那」來稱呼中國。不過，他們並不說「支那」，而直稱「中國」。竹內好在其同人刊物中，發表支持美英戰爭的宣言<sup>37</sup>。他表示，日本人必須有所覺悟，我們的民族將在這場戰爭中改變性格，我們的國家在解放亞洲各民族的努力中也不得不變形。他的構想是基於一個預感：不打破日本政府當前的結構，就無法抑制政府領導者支配亞洲各國的野心。

37. 〈大東亞戰爭と吾等の決意〉（《中国文学》第八〇号卷頭言，一九四二年一月），該文沒有署名，是由竹內好執筆。

戰後的年輕評論家菅孝行，站在竹內好思索的方向上，從在戰後的日本政府中，看到了比戰敗前日本政府的戰爭目的，更有效持續的機構<sup>38</sup>。另一位戰後的評論家松本健一屬於比菅孝行更年輕的世代，他在日本與東南亞現在的經濟關係中，看見比日本政府鼓吹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爭目的，更為有效穩定的實現形態<sup>39</sup>。正如他們所指稱的，東南亞與日本的經濟關係中，以日本為中心的偏頗性質，仍保有戰爭時期日本所顯示的型態。

38.「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戰後，難道天皇制沒有被維護或被發展得更加完備嗎？這是我一貫的問題意識。」

「作為機構的天皇制，天皇的位置從掌權者移向象徵的地位，確實會相對化到嚴重的後果。然而，我們不得不這樣思考：戰爭時期天皇制的存在結構不僅獲得延命的機會，它恢復了比新的支配形態更堅固的結合關係，進而形成更堅固的天皇制基礎。」（菅孝行〈天皇制の最高形態とは何か〉《天皇論ノト》田畑書店，一九七五年）。

39.「毋庸置疑，到了戰後，亞洲人來到日本，既不需做個逢迎者，也不必害怕被強行擄走，因為強權的帝

國主義已經瓦解。只不過，日本近代化的路線在戰前或戰後絲毫沒有改變。也就是說，日本依然抱持著以亞洲作為跳板、躋身歐美帝國主義列強行列的基本構圖。」（略）

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戰時體制的大東亞共榮圈已經崩潰，但以日本為「盟主」的經濟體制的大東亞共榮圈，毋寧說是戰後才確立下來的。此一確立期，亦即日本近代化過程結束後，擺脫長達百年間「近代日本」的框架與歐美列強並肩的時期。具體地說，以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結束那年為分歧點。松本健一「アジア」から「西欧」へ」（《思想の科学》一九七九年九月号。收錄於《戰後世代の風景》第三文明社・一九八〇年）。



## 非轉向的形式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八日

在日本，宗教的形式和西歐或美國稍有不同。當日本人被問到「你信什麼教」，尤其是被外國人詢問時，都會簡扼地回答：「我信佛教。」然而，正確地說，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仰不能這樣歸類。現在的日本人，除了近親的喪禮或自己死亡的後事以外，幾乎很少去佛教的寺院。對大多數日本人來說，墓地是由佛寺管理的。除了這種關係之外，就算當事人以家族為單位，參與佛教特別教派的教義，這些教義都不見得會浮現在他個人的心靈中。

日本人很少認真思考佛教與神道教的差異，雖然這兩種宗教在西方比較宗教的書籍中被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宗教，但其實在日本人的感覺中幾乎是相連的。在此種宗教意識中，也納進了佛教及神道教以外的各種宗教，而這些宗教最後都消融在日本式的宗教信仰中了。

對居住在都市裡的日本人而言——現在大多數的日本人都過著都市生活——聖誕節是眾所周知的慶典活動，這項慶典透過商業活動普及到日本全國。因此，對百貨公司而言，十二月底的聖誕節期間是增加業績的最好機會。在現今日本人所能享受的藝術形式中，最強而有力的就是廣告；它把聖誕節變成日本人居住環境的一部分，納入日本的歲時記，成為每年季節嬗遞中諸多的節目之一。基於期待和迎接聖誕節的到來，日本人每年只有一天是基督徒，不僅互贈聖誕禮物，也把這天當作喝酒的藉口。透過每年只做一天的基督徒，日本人認識了基督教的傳說和儀式，進而開始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產生共鳴。

若按照西歐式的分類法，這些互不相同的宗教，其實早已消融在這狹小群島上的日本人的共同信仰中了。這種宗教心支撐著彼此共居一地的事實，再由明治以後的政府暗中操作，把它鑄入國家宗教的模型中，使其塑造出對當權政府的服從。不過，這不能說是操縱日本人共同信仰的唯一方式。

在此，我們試著從另一途徑來探索日本人的宗教信仰。為了釐清日本人共同信仰的性質，有必要透過日本民間傳統，來瞭解在日本與西方各國斷絕往來的鎖國時代中，是

如何改變耶穌基督的福音書，並藉此探究日本人的宗教心性質。

自從日本向西方各國關上國門後，日本的基督教徒大多屈服於德川幕府政權的壓迫而下「轉向」了。有些人成為殉教者，為堅守信仰而死；也有人逃到遠離中央政府的日本離島角落，躲避中央政府的嚴密監視，才得以披著中央政府強加的佛教袈裟，繼續維持他們原本的基督教信仰。

一八五四年日本開放門戶之後，歐洲的天主教會懷著一種期望——希望已經脫離歐洲基督教中心兩百年的日本人，其心中仍保有些許基督教信仰，因而派遣傳教士來到日本。這類隱藏的信徒在一八六五年出現了。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七日，法籍神父比提金（Bernard T. Petitjean）在九州長崎新建的天主教堂——「大浦天主堂」門前，看到十多名日本人聚集在一起。這時候，有三名女性走向法籍神父，用跟神父相同的姿勢祈禱。接著，她們小聲地對神父說：「我們和你有相同的信仰。」這三名女性是來自當時被併入長崎市的浦上村的農婦。

光是在浦上村就出現了一千三百名基督教信徒。後來，在九州各地又出現了數千名基督教徒。但是，他們因為信仰的關係而遭到明治新政府的迫害。儘管在這二百年間

堅持信仰，但進入明治時期後，大多數信徒仍遭受拷問與流放，並被迫「轉向」。直到一八七三年，明治新政府才解除對基督教的禁令。在此之前因堅守基督教信仰而被囚的信徒，才終於獲得釋放。在明治初年大舉迫害信徒期間，許多有智慧的人藉由裝傻作笨繼續維持他們的信仰。他們不接近外國人新建的天主教堂，而默守自己的信仰。這些隱藏的信徒到底有多少，確實的數字目前仍無法得知。

田北耕也在《昭和時代的隱藏天主教徒》一書中提及：在九州長崎地區，光是五島列島其中之一的奈留島，就有四千五百名隱藏的天主教徒<sup>40</sup>。

至於在這些隱藏的天主教徒之間，是如何傳遞福音書的，實在引人興趣。在黑崎地區和五島流傳著一本《天地始之事》的抄本，用這個方式來傳述耶穌基督的傳說：

希律王為審判耶穌，上天下地遍尋不著，連當地居民之子亦混雜其間，遂下令誅殺全國所有剛出生至七歲的嬰孩（為數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人），既不惋惜，亦不哀傷，其數達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人。耶穌得知消息，自認數萬孩子失去生命，全是因己而起，遂發宏願自承一切苦業，來救這些小孩之後世。此時，父神認為數萬幼子失

去生命全是因耶穌之故，為此失去天國的喜樂，放心不下，予以告示：為了死去孩子的後世，你自當受譴責罰，捨身而盡。耶穌頓時伏倒在地，汨出鮮血，此乃羅札利歐艱深教義之所在。其後，耶穌回到羅馬國聖·艾克雷西亞，自當承受惡人折磨，捨棄生命。

以上需稍加以解釋。所謂「連當地居民之子亦混雜其間」，是傳述福音者自身的生  
活感受。這些人原本是農民，即使不是農民，而是武士身分或町人\*，也已經逃到遠方成  
為窮地的農民。這樣看來，傳述福音書的人似乎頗有潛入土地中，艱辛求存的感受。並  
經由這種實在的感受，重新改述了耶穌的一生。接著說，希律王下令誅殺的孩童達四萬  
四千四百四十四人，這數目似乎是來自京都三十三間堂<sup>‡</sup>的佛像總數，再將數字加進去

40. 田北耕也《昭和時代の潜伏キリシタン》（日本學術振興會，一九五四年。國書刊行會於一九七八年再版）。

\* 在日本江戸時代，對從事工商業者者的稱呼。

‡ 位於京都的天台宗寺廟，「間」乃一種建築用語，代表柱間的距離，內有一千零一座木造千手觀音像，  
乃「蓮花王院本堂」的通稱。

的。同時，也加入具有與歐洲不同起源的元素。在福音書的口頭傳承中，有時也會摻進事實以外的各種傳說，如同五島的福音書傳述的那樣。其實，姑且不論耶穌是否存在，就算真有其人，他身上發生的事情能否如實傳述，恐怕終究還是難脫傳述者實際的生活感受。在這種情形下，傳述的故事就會變成活在自己心中的耶穌，和自己所相信的耶穌。在日本傳述耶穌傳的人，也有一種深沉的不安，因為他們在島原之亂<sup>\*</sup>結束後，仍被江戶德川幕府的官吏追趕，隨時都可能被磔刑致死。因此，比起進入明治時代，解除基督教令之後，透過歐洲傳來的新學問將歐洲福音書翻譯成日語的人，那些隱藏信徒的耶穌傳可說包含更深切的焦慮。

一九四五年戰敗以後，日本的聖經研究又往前推進，出版了合乎現代日語的口語體福音書。比起明治時代的譯本，此日譯本在質、量上都要高出許多；比起住在五島列島的隱藏基督徒，新譯本也更正確地把歐洲的聖經譯成日文。在戰後的解放感中譯成的聖經文體，顯得溫和自然。姑且不提文體的形態，就思想來說，父神現身叱責耶穌的理由是：因為祂，數萬幼童失去性命，所以，祂必須為這些孩子的來世承受苦難，拋棄生命。耶穌本人也這麼想。而這種受苦的方式，正是日本人的方式，即世代住在這島國的

群體，所培育出來的同胞情懷。這種情懷成了傳述耶穌傳的動機，也跟一九三一年開始的十五年戰爭期間，推動日本人和滲透日本人的那股情感非常相似。在我看來，日本基督教徒在十五年戰爭期間，遭受苦難卻不放棄自己信仰的那股情感，頗近似於德川時代二百年的鎖國期間，天主教徒堅守信仰的情懷。從意義上來說，五島列島的福音書與現在所要談的戰爭時期精神史，頗有相通之處。

中村元是佛教學者，他在十五年戰爭期間，曾比較研究中國、印度、西藏和日本接受佛教的形態。雖在戰爭期間，中村元仍持續這項研究工作，終於完成鉅著。這本題為《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的專著，戰後在日本出版，也譯成英文版。根據本書研究指出，與其他東方民族如西藏人、印度人、中國人等相比較，日本人接受佛教的特色在於簡化其教義，並強調同信仰者的人際關係<sup>41</sup>。這些特色並不是透過德川中央政府鎮壓基督教，迫使其轉向所採用官方准許的佛教教派而興盛起來的；毋寧說，在更

\* 一六三七年，反抗江戶幕府殘暴鎮壓的天主教信徒們，在天草四郎的帶領下攻佔島原半島南部的原城，史稱島原之亂。

41. 中村元《東洋人の思惟方法》上・下（みすず書房，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

早之前，盛行的民間佛教運動中即已顯現出來。因此，在這種簡化的佛教中，也顯現出教徒拒絕政府不當要求的態度。

佛教有許多教派，其中也有隱秘的教派，跟基督教中有隱秘的基督徒一樣。以我所知的例子而言，阿伊染德美曾寫過一本《我躲著念佛》的書，這本書寫出他在成長過程中與同伴躲著念佛的故事和儀式<sup>42</sup>。那是流傳於岩手縣山中和賀村的黑佛流派。在這山村的隱藏念佛信徒間，形成了友愛共同體的意識。例如，美國佛蒙特州的奧內達<sup>\*</sup>就有這種共同體，他們在百年前就具有友愛互助的習慣，哈夫洛克·靄理士〔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中很早就加以介紹過；據說和賀村也有類似相同的習慣。這種黑佛信仰是由約二百年前，遭到政府認許的佛教教派迫害，而進入潛伏狀態的流派所形成的。村民為幫助逃進山中的僧侶，而在當地形成信仰的共同體，並透過信仰讓原本就存在的互助習慣，更加緊密地結合。正是基於這種強韌的共同信仰，和賀村的信徒們才得以度過數次飢荒和戰爭的威脅。在這期間，他們始終不肯向官吏坦承自己的信仰，不論在德川時代或對明治以後的新政府，始終如此。阿伊染德美指出，進入明治時代以後，曾發生數次內亂，後來又與外國發生兩次大型戰



爭，許多村民被迫當兵或因而戰死，造成許多寡婦和孤兒。村民們不但公開迎納寡婦為妻，落實互助合作的精神，還照顧無依的孤兒們。這種形式，也隨著政府強迫村民參加戰爭而產生的不信任感傳承下去。這種信仰並不美化戰爭，反而認為戰爭比飢饉還要殘酷，這種口頭傳承也隨著佛教信仰流傳下來。姑且不提這種隱秘佛教的共同體，大都市中合法的佛教教派時常透過宗教讚美戰爭，又只會傳達支持政府的言論。因此，遺留在和賀山村共同體信仰可說是毫無前例。在山村裡，不管是戰時或戰後，村民們始終背對著外界的人——與中央有所關聯的學校制度與軍隊制度、官方許可的寺廟和佛教制度等，悄悄地舉行隱秘的宗教儀式。這信仰的底層，含有對現存政治秩序與政治權威的不信任感。

德川時代和明治初期，正統官方許可的佛教教派，都被用來打壓基督教的信仰；國家神道則在明治時代和十五年戰爭期間，被用來箝制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基督

12. 阿伊染德美《わがかくし念仏》（思想の科学社，一九七七年）。

\* Oneida · 北美印地安人伊洛魁族 (Iroquois) 的一支。

教信徒中，成立官方認可大型團體的人士，在一開始便主動支持中日戰爭，其中絕大多數都參加過「大政翼贊會」的運動。在較小的基督教教派中，像是「聖教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教會」以及「燈台社」等，至少在某一時期曾對十五年戰爭採取批判的態度。不過，燈台社因與日本傳統有關係，尤其值得注意。燈台社此一無教會派基督教團體的總部設在美國，由羅素（Charles Taze Russell, 1852-1916）創立，之後由拉瑟福（Joseph Franklin Rutherford, 1869-1942）繼承，其後再由諾爾會長（Nathan Homer Knorr）主持。這項運動以基督臨在思想為教理，要求信徒對世俗權力提出不妥協的批判。同時，拒絕向國家敬禮也被當作信徒的義務。基於這種信念，不管在德國或日本，信徒們都不斷地抵抗國家至上的政治思想。許多信徒也因此被捕入獄，甚至死亡。

明石順三（1889-1965）為了成立日本分部，一九二六年從美國的燈台社總部被派到日本。明石順三並非像現在在美國發行的燈台社歷史——《耶和華見證神的目的》（一九五九年）中所寫的那樣，是日裔美國人<sup>15</sup>。他出生於日本滋賀縣息長村的岩脇——靠近琵琶湖的山村；父親是個中醫師，十四歲時從中學退學，計劃前往美國。一九〇八年他十八歲時前往美國，一面工作，一面自修讀書，主要利用公立圖書館自修。一九一四年起，他

43. 燈台社總部的歷史，出自此書：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Jehovah's Witnesses in the Divine Purpose*,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 Inc., 1959.

關於明石真人・笠原芳光的〈兵役を拒否したキリスト者〉（首次發表於《思想の科学》一九七〇年一月号・之後，收錄在「思想之科學研究會」編《埋もれた精神》）均有記載。

有關明石順三與內村鑑三的關係，高阪薫在〈明石順三と須磨浦聖書講堂〉（《思想の科学》一九七三年二月号）裡，有詳細的描寫。

太田雄三在《內村鑑三》（研究社，一九七七年）談到內村鑑三的偉大之處，仍不忘描述他對其他基督教徒屢屢顯示的狹隘心理。

關於與燈台社同時遭到打壓的基督教教派——聖教會，可參閱米田豐與高山慶喜合著的《昭和の宗教弾圧》（いのちのことば社，一九六四年）。本書並未指出當事人的姓名，只說聖教會遭到打壓的原因是：「北海道的一名青年牧師，在神社問題上因為言行偏激，遂遭人檢舉，拘留期間自殺身亡。」有關這名青年的事歷，可參閱阪本幸四郎的〈小山宗祐牧師補の自殺〉（《思想の科学》一九六九年一月号，一九七〇年一月号）。

在同志社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戰時下抵抗の研究》全二卷（みすず書房，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中，對宗教人士於戰爭時期如何抵抗當局的打壓有翔實的記載。

先在聖地牙哥，接著在舊金山，最後到洛杉磯擔任日文報紙的記者。在這期間，他娶了日籍妻子。由於妻子是燈台社的信徒，因此他也就順理成章地加入這項運動。明石順三和妻子生有三個兒子。當他被派往日本負責成立日本分部時，他的妻子拒絕一同前往，而留在美國。夫妻兩人就在這時辦理離婚。而一開始和母親留在美國的三個兒子，不久也被送回日本，與父親同住。這三個兒子認同父親的生活方式，始終不肯接受小學以上的教育，並協助父親籌組日本燈台社的工作。

在日本軍國主義（始於九一八事變）興盛的前五年，燈台社的組織非常符合日本社會的氣氛。這種基督教運動沒有教會組織作為基礎，只闡釋耶穌基督臨在的教義，並教人民反對戰爭。不過，明石順三等人的傳教作為，卻受到抱持相同理念進行活動、同時代的偉大基督徒內村鑑三（1861-1930）的嫉妒。太田雄三所著的《內村鑑三》（研究社，一九七七年）一書，便指出這個偉人的善嫉；高阪薰還引用內村鑑三及其弟子討論明石順三的信件，藉此呈現這偉人的狹隘面向。

一九三二年日本進入軍國主義時代，全國氣氛不變，燈台社的活動因而受到警察的強力干涉。明石順三的長子明石真人被徵召當兵時，旋即表明自己反對殺人，將授

與的槍支交還給長官。這則新聞迅速傳遍日本各地。在別的地方，也發生和明石真人相同的行動，這個問題讓日軍頭痛不已。因為在此之前，日本鮮少發生這種「良心式規避兵役」，也就是基於信念而規避兵役的事例<sup>44</sup>。最後他們的問題被送到軍事法庭接受審判。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明石真人遭判監禁三年。在軍法會議判決之後約一星期，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凌晨五時，五十名警官突襲位於東京的燈台社總部，逮捕了共二十六名男女，其中包括明石順三和他剛再婚的妻子，以及他與前妻所生的另外兩個兒子。也就是說，明石一家全部遭到逮捕。在被捕入獄期間，明石順三只能閱讀經過許可的書籍，其中包含佛教與神道的經典。經由在獄中的思索，他發覺自己所探求的宗教真理，並非只存在於聖經之中。戰爭結束後，他所寫的長篇小說《淨土真宗門》中，主角老人得出一個結論：宗教的真髓，在於歡喜歸空。他說，這種想法乃出自於佛教的法華經。因為信仰佛教而開悟的人，就是能夠在寂滅為樂之

44. 阿部知二《良心的兵役拒否の思想》（岩波新書，一九六九年），舉出日本近代史上為數不少拒服兵役的事例，例如日俄戰爭時的矢部喜好、太平洋戰爭時的村本一生、淺見仙作、政池仁等。其他，還有戰爭時期翻譯拉格洛芙（Selma Lagerlöf）的小說《エルサレム》的石寶功。

相中觀看世界的人。換句話說，這種想法就像舊約聖經那樣把世界當成空之又空的事物。他認為《古事記》中也有這種思想。

日本當局禁止明石順三跟他被關在陸軍監獄的兒子會面，然而，他從閱讀佛教經典和神道文獻所獲得的感想，還是經由別人口中傳到了明石真人的耳中。明石真人長期以來都在父親所說的「絕對的真理只存在於聖經中」的教誨下長大，當他聽到現在父親認為真理並不只存在於聖經中時，受到極大的打擊。不久，真人撤回拒絕肩槍的誓言，並在一九一四年，寫下「轉向自白」。根據自白，他在獄中自行閱讀日本最古老的史書《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擁戴萬世一系的天皇和世界之冠的「國體」；萬世一系的天皇為了日本民族，以及所有日本國民不斷地獻身努力。因此，他誓言今後要以身為帝國軍隊的一員，盡最大的努力，將他充滿罪惡的身體奉獻給天皇，為保衛國家欣然赴死。於是，他加入戰車部隊，戰敗後才回復正常的市民生活。後來，真人也說服他的弟弟們抱持這種「轉向邏輯」加入軍隊。明石順三的次子就是擔任陸軍的文職人員在南方戰死的。順三的第三個兒子，儘管在兄長的說服下，仍然堅守父親傳下來的信仰，在當局的監視下度過戰

爭，迎接戰敗的到來。

同樣是閱讀神道和佛教的經典，父子兩人卻得出不同的結論。父親明石順三聽到其子「轉向」之後，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在法庭上現身時，在法庭紀錄中留下這樣的證詞：

現在，跟隨我的只剩下四個人，加上我一共五人。這是一場一億人對五人的戰爭。到底是一億人獲勝，還是五人所說的神諭贏得勝利？不久就能獲得證明。我確信這一點。而且我們處之泰然，毫無所懼，何必多言。

沒有人在旁聽席上聽到這項證詞，因為當時那些未被捕入獄的燈台社信徒，擔心遭到警察迫害而留在自己家裡。不過，儘管戰爭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日本的法庭仍舊把明石順三這段沒有人在場旁聽的最後證詞紀錄下來。

在最後的證詞中，明石順三並沒有提到自己在獄中從閱讀神道和佛教經典中學到什麼，這大概是他得知自己的兒子「轉向」之後，導引出他對這個問題保持沉默的智慧。明石順三完全可以想像到，如果他說出自己對神道或佛教的感想，肯定會被當時的政府加以利用。因此，他成功地阻止了自己在獄中領悟的宗教觀，遭到當局扭曲甚而誤導社會的可能性。這顯示出深諳實際政治表裡的練達政治家的判斷。明石順三在戰後去世，他較為年輕的弟子——村本一生，是一個貫徹信念的硬骨頭，始終留在獄中直到戰爭結束。他用「一言以蔽之，他是個完美的常識人」來形容明石順三的人格。

戰敗後，明石順三獲得釋放，與其一同被關在獄中的四個人當中，他的妻子和一名朝鮮籍信徒，在戰敗前就已經去世。殘存的三人之中，一名朝鮮人返回祖國，明石順三和一名年輕的女信徒倖存下來。明石第三次結婚時，把在獄中貫徹信仰的年輕女性收為養女。這名女子罹患重病，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康復。明石一家和從陸軍監獄釋放的村本一生共同退居在樺木縣的鹿沼，在經歷漫長的戰爭歲月，仍堅守信仰的團體中繼續過著儉樸的生活。據說，他們彼此間幾乎不談論戰爭期間的事。在戰後，他們完全脫離燈台社的活動，也不推動與燈台社不同的新興宗教運動。



日本戰敗二個月後，當明石順三被釋放的消息傳到了燈台社美國總部時，總部打了一封祝賀電報給他，並說要送一整船的糧食和其他物資援助他們。不過，讀完美國總部在戰時活動的報告後，明石順三在村本一生的協助下，對總部在宗教集會時豎立國旗的國家崇拜行為進行批判。此時的明石順三肯定想起許多日本的燈台社信徒，因為拒絕在皇居前行最敬禮而遭到拷問，甚至死在獄中的情事。此時，擔任燈台社第三任會長的諾爾得知這批判後，撤銷了明石順三在燈台社日本及朝鮮分會長的職位。然後又在回覆明石順三的信中說：「我確信，以耶和華的靈讀過你的公開信的人，都能輕易看穿，從羅素牧師時代至今的這些年中，你一直是個偽善者。」於是，明石順三就從燈台社的歷史中被抹殺掉，甚至現今在日本透過個別家庭拜訪增加信徒的燈台社人員之間，也不知明石順三是何許人也，更不曾出現在他們所持有的燈台社歷史書籍中。

燈台社、聖教會和基督復臨安息日教會等小型基督教教派，從中日戰爭初期的階段就採取批判的態度，因為這些教派大多在下層社會活動，而下層社會的民眾不僅沒有因戰爭獲得利益，反而深受打擊。在這場戰爭的初期，進入大學的青年都享有延緩入伍當

\*指擁有健全的判斷力的人。

兵的恩典。不過，無法接受高等教育、年滿二十歲的青年，就必須接受徵兵檢查，體檢合格者即編入軍隊。因此，其死亡率要比同年齡的大學生明顯高出許多。另外，在燈台社裡面，有許多朝鮮籍的信徒，這可以從戰時在獄中堅守信仰的五人中就有兩名是朝鮮人推斷出來。

較大的宗教團體，就基督教而言，除了聖公會之外，無不與政府的戰爭政策積極合作，但內村鑑三影響所及的知識分子小團體，對戰爭仍維持批判的態度。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政治學者南原繁等，都屬於內村鑑三門下的「無教會教派」，這兩人在日本投降後先後擔任東京大學的校長。

佛教團體除了極少數例外，都視侵略中國為聖戰運動的前鋒；例外的只有妹尾義郎所領導的新興佛教青年同盟。妹尾義郎抱持一切事物皆為相互依存而生生不息，亦即「緣起之法」的觀點，認為洞徹此法為生之後，其解放人類的基本態度，應該以建構否定個我與私有的共同生活為目標；抱持這種立場當然會產生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思想。此團體在農村的下層人民中推展宗教活動，必要時還義務替人籌辦葬事。然而，妹尾被捕後，於戰爭的最後階段卻聲明「轉向」<sup>45</sup>。

由柳宗悅所領導推動的民藝<sup>\*</sup>運動，乃依據佛教美學對工人尊重的觀念，讓他在戰爭的集體狂熱中守住自己的立場<sup>k</sup>。

戰爭初期，存在於都市下層階級的反戰情緒，是以「日蓮宗」為佛教運動的形式之一，透過牧口常三郎及戶田城聖所領導的「創價學會」表現出來的<sup>47</sup>。不僅在都市，

45. 島根清的〈新興仏教青年同盟——妹尾義郎〉（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共同研究・転向〉上卷，平凡社，一九五九年），是最早論及妹尾義郎轉向的文章。當時，妹尾義郎尚在，對該文章頗為不滿。其後，有稻垣真美根據更廣泛的調查所著的〈仏陀を背負いて街頭へ——妹尾義郎と新興仏教青年同盟〉（岩波新書，一九七四年）和林靈法〈戦える新興仏教青年同盟〉（〈現代思想と仏教の立場〉百華苑，一九六二年）。妹尾義郎死後，中濃教篤與稻垣真美合編的〈妹尾義郎日記〉全七卷（国書刊行會，一九七四—七五年）出版。

\*並非民俗藝術之意，而指民眾性的工藝，普通民眾日常使用的器具即「民藝品」。

46. 柳宗悅於一九三一年至五一年所發行的雜誌〈工藝〉，充分展現出民藝運動對戰爭的態度。柳宗悅從十五年戰爭開始的一九三一年到三三年，與壽岳文章共同編輯發行的雜誌〈ブレイクとホヰトマン〉。雖然為期短暫，但從編集後記中可以看出柳宗悅對滿洲事變直言不諱的批判。

收錄在《柳宗悅全集》（筑摩書房，一九八〇—八二年）的文章中，有關朝鮮與沖繩的部分，反映出柳宗悅對十五年戰爭時期的基本思想。

47. 牧口常三郎（1871-1944）構思以康德哲學為思想體系，和以日蓮正宗為宗教觀的教育思想來推展運動，

農村下層階級的反戰情緒，也從出口王仁三郎所領導的「大本教」神道宗教運動、御木德近所領導的「人之道」神道系宗教運動、大西愛治郎所領導的「天理本道」神道教系運動等出口宣洩出來。<sup>48</sup>在這些運動中，有人遭到逮捕，也有人死於獄中。存活到戰敗後的人，也跟拒絕「轉向」而不改變政治信念的日本共產黨殘餘分子，於日本投降後一同獲得釋放。

那些在戰爭期間拒絕轉向、貫徹信念的共產主義者，於日本投降後不久，都成為共產黨支持者所創造出來的傳說對象。這十多名「非轉向」的共產黨員，被視為體現共產黨無謬性的代表。然而，最先對這些人提出批判的是吉本隆明（1924），他屬於在戰爭期間成長的年輕世代。<sup>49</sup>他在一九五九年發表的〈轉向論〉，對拒絕轉向的共產黨領導者加以批判。吉本隆明論述說，就喪失與同時代狀況接觸的機會而言，其實這些獄中共產黨員的非轉向，和接受轉向者的思想，以及接受轉向的原共產主義者的思想一樣，都是荒蕪空蕩的。他又認為，那只是以原理為原理機械般的確認工作，在如何面對時代處境的方向性，沒有任何效用。但我認為，他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所謂非轉向的狀態並不是靜止不動的狀態。由於人乃血肉之軀，行動總處於不停擺動的狀

態，這也包含不做某種行動的抑制狀態。人類無論處於何種狀態，都無法脫出這種擺動的狀態。進一步說，在擺動的狀態中，人必須依靠某種基本價值來支撐自己。這種基本價值基準，在語言的原義中，可稱為宗教。這十多名共產黨的領導者，出獄時採取一九二〇年代在獄外活動時，用與左翼知識分子間使用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來發表他們的政治見解。那是一九二〇年代「東大新人會」成員的文體，經由歐洲傳入的翻譯語辭所形成的。不過，那種語辭已經遠離戰敗後日本人民的生活情感。

但在戰爭期間遭到打壓，死於獄中。其弟子戶田聖繼承牧口常三郎的思想，使這思想運動在戰後大為發展。《牧口常三郎全集》全八卷（第三文明社，一九八一—八二年）。

48. 大本七十年史編纂會編《大本七十年史》全二卷（宗教法人大本，一九六四年）。

關於「人之道」，可參閱池田昭編《ひとのみち教団不敬事件關係資料集成》（三一書房，一九七七年）。

大西愛治郎（1881-1958）率領的「本道」（原天理本道）於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八年二度遭到打壓，儘管許多人被捕或長年身陷獄中，仍貫徹其信仰。村上重良《ほんみち不敬事件——天皇制と対決した民衆宗教》（講談社，一九七四年）。

49. 吉本隆明《転向論》（《芸術の抵抗と挫折》，一九五九年）。

堅持非轉向而留在獄中的共產黨員沼山寬，在日本投降及獲釋後，活了三十年。

他在臨死前，這樣說道：「戰爭結束的時候，我們已經疲累至極，幾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當時，有位佔領軍的軍官前來通知要釋放我們。在我們之中精神最佳的要數德田球一，他問我是否應該接受佔領軍的提議。那時，我已經沒有力氣思考，只回答說，按他認為正確的去。提這件事，並不是要誇示我當時的先見之明，但現在，我覺得當時應該這樣回答：『在日本人讓我們獲得自由之前，我們應該留在獄中。』」<sup>70</sup>

與此稍有不同的，作為燈台社信徒而留在陸軍監獄，直到戰敗才出來的村本一生，於戰敗後三十年，這樣說：現在走到皇居的話，我覺得會被迫高呼天皇陛下萬歲<sup>71</sup>。在戰爭時期，只要對中戰爭一日未歇，他就沒有現在這種感受。即使是相同的行動，在不同的境況中其所代表的意義是不同的。由此看來，他與其師明石順三都是具備充分常識的人。這種確實掌握時代脈動，加以判斷後付諸行動的方式，不同於以引進海外思想作為大前提，並單憑此邏輯從中得出對同時代狀況所做的判斷方式。

50. ぬやま・ひろし是西澤隆二（1903-1976）的筆名。在獄中遇到日本戰敗投降，為共產黨中央委員。一九六六年被開除黨籍，以ぬやま・ひろし之名發表詩集《編笠》而廣為人知。與他有深交的司馬遼太郎曾在小說《ひとびとの登音》上・下（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一年）中，對他多所著墨。
51. 這句話顯示出村本一生與教條主義毫無關係和自在生活的處境。

## 日本之中的朝鮮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透過日本人對待朝鮮人的態度，我們可以將日本人的思想放在一種「分光儀」中加以分析。這跟區分或右或左的政治思想不同，它可以呈現出各種想法。前文曾稍提及，日本政府試圖把文明強加諸於朝鮮，這裡所謂的文明是指「西化」。早在一八七五年，明治維新政府成立八年後，當時日本的右翼和左翼兩派就有把文明強加於朝鮮的想法。

一八八四年，自由民權運動的兩位偉大領導者——後藤象二郎和板垣退助，計劃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朝鮮傳統主義者的統治。後藤夢想成為朝鮮的總理大臣。這項計劃最後被日本政府得知，日本政府自行採取自由民權運動者的構想，著手進行類似的計劃，卻因中國派遣軍的干涉而瓦解。一八八五年，自由民權運動左派領導者大井憲太郎，計劃以暴力推翻墨守傳統立場的朝鮮政府，這項行動被稱為「大阪事件」，在付諸行動前即被日本警方鎮壓下來。之所以稱作大阪事件，是因為當時執行總部設在大阪。



在這個時代，所謂文明階梯的思想，在日本國內對政治有興趣的人的想像中，時常作為一種實體的觀念發揮著作用。參加政治活動的人——不管是右翼或左翼都相信，要強制朝鮮進一步登上文明的階梯，就算使用暴力亦未嘗不可。這是基於他們政治上篤定的信念。

儘管「大阪事件」失敗，但強迫朝鮮接受文明的思想並未因此挫折。其他類似的計劃仍持續進行著。樽井藤吉擬出一個構想——把日本和朝鮮合併為一，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具有新名稱的新國家<sup>22</sup>。這個想法在一九一〇年由日本政府付諸實行，卻不是建立在樽井所夢想的平等基礎上：最後，日本併吞了朝鮮國。

日本政府採取「日韓合併」的行動，對日本人和朝鮮人帶來如何嚴峻的結果，當時對此作出深思的日本人為數不多，詩人石川啄木是少數其中之一。他在朝鮮國滅亡那天寫了一首哀悼的短詩（短歌）<sup>23</sup>，同時，他也寫評論，批判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只著重刻繪日本人私生活的細節；他又說，如果自然主義文學家有勇氣描寫日本人的生活，就應該描寫國家使日本人的自由窒息的事實。明治時代即將結束的一九一一年，發生所謂的「大逆事件」，被視為涉案的諸多嫌疑者還包括當時具有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其中有

人被冠上意圖暗殺天皇的罪名，而被處以死刑。石川啄木受到這次事件的衝擊，在日記中留下對此事的批判文字。

對於當時歐洲最新的文藝思潮輸入日本，所形成日本式的自然主義，石川啄木所提出的批評，在當時《中央公論》的編輯木佐木勝的日記中，可得到精采的例證。

關於以小說《棉被》（《蒲団》）在日本掀起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田山花袋（1871-1930），木佐木勝在日記中留下這段插曲<sup>54</sup>：當時田山花袋已經是一位年屆中年的著名小說家，但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時，他聽信朝鮮人在附近的井裡下毒的謠言，便

52.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一八九三年）。樽井藤吉（1850-1922）。

53. 地圖上、朝鮮國一片漆黑

塗著墨、聽著秋風

日韓合併後，石川啄木寫了很多短歌，其中這首短歌最為傑出。日本文學有必要正視這作品的重要性。

石川啄木（1886-1912）在同時期撰寫評論〈時代閉塞の現状〉（一九一〇年），主張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應該正視勒住自我咽喉的國家實態。

54. 木佐木勝《木佐木日記》（圖書新聞社，一九六五年）。

去追打朝鮮人，並誇示自己的體魄。這種不負責任的流言，卻獲得軍隊及官員的推波助瀾，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之後廣為流傳，遍及東京和橫濱。當時有六千名朝鮮人未經審判，即被自願擔任民警隊的民眾組織、警察和軍隊當街殺死。做出犯行的群眾，雖然有少數在事後遭到警方逮捕，但大都只經過形式上的調查，即以證據不足的理由予以釋放。

然而，當時發出抗議之聲的日本人少之又少。例如，千田是也（1904-1994），後來當了演員及表演者。他曾當街被民警隊誤認為是朝鮮人，在險遭殺害之際，剛好有鄰居經過，證明他是日本人，才得以保住性命。從那之後，除了千田是也的本名，他又給自己取名為千駄谷\*的朝鮮人，沿用至今。千駄谷就是他被誤認為朝鮮人，而險遭殺害的地方。儘管如此，他接受了自己被誤認為朝鮮人的角色，並成為他日後長期推動政治與藝術活動的力量。

若稍微追溯日本與朝鮮的關係可以發現，日本在德川時代曾有禮尊敬地迎接朝鮮派往日本的使節團。朝鮮和日本雙方對於所謂的「教養」，是以使用中國漢字，寫出中國式散文和詩詞的能力做為衡量。由於朝鮮使節在這方面的能力遠勝日本的知識分子，因而獲得很高的評價。不過，到德川時代接近尾聲時，日本與朝鮮的正式交流中斷了。

明治新政府成立之際，日本人對待朝鮮人的態度可以說尚屬中立。後來，嚮往文明的熱情攫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時代來臨，日本人從此看不起朝鮮人。

作為帝國主義國家興起的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取得台灣；日俄戰爭後，取得庫頁島，又獲得滿洲和中國東北部的鐵路使用權，接著併吞了朝鮮。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人輕蔑朝鮮人的傾向愈加強烈。日韓合併後，日本的商人大舉前往朝鮮，從脅迫、放高利貸到詐欺的手段，用盡各種方法，將土地據為己有。許多朝鮮人失去土地之後，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工業急速發展增加許多工作機會，他們便前往日本謀取工作。一九二一年到三十年的十年間，大約有四十萬朝鮮人移居日本。即便在一九二三年發生關東大地震之後，日本人大量殘殺朝鮮人，仍沒有阻止這股移工潮<sup>55</sup>，因為這種大

\*地名，位於東京都內

55.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關東大地震之後，在東京與神奈川被日本人殺死的朝鮮人，共有六千四百二十五人。這項調查是由當時上海的朝鮮獨立運動機關刊物《獨立新聞》社長全承學潛入東京，與李鉄、朴思稷、閔錫鉉、李昌根、崔承芳、李茂根等留學生十餘人共同調查到十一月底得出的數據。

吉野作造獲得赤松克鷹的協助，調查到十月底，得知有二千七百一十一名朝鮮人遇害。（姜德相《關東大震災》中公新書，一九七五年）。

舉移居正是朝鮮人所深切需要的。他們用外國腔調講簡單的日語，只為賺取低廉的工資；換句話說，當這類朝鮮勞工出現在日本時，更加深了日本人原本就輕蔑朝鮮人的態度。

無論是十五年戰爭之前或之後，在日本人所做的調查中顯示出，日本人始終把朝鮮人置於全世界民族中的最低位置。在日本文學中，明治時代以後的小說中紛紛出現非日本人的物。在這些小說中，朝鮮人極少扮演重要的角色。所謂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近代文學，還包括大正民主思潮時代，至昭和時期十五年戰爭結束為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在戰後文學中，出現了許多以朝鮮人為出場人物的重要小說。撰寫這類作品的不乏日本著名的小說家，比如松本清張、司馬遼太郎、開高健、井上靖、大江健三郎、小田實、小松左京和井上光晴等都是。從明治以後到戰爭結束，日本文學家對世界各民族抱持的價值意識，經過戰爭時期後可說是分崩離析。

在日本的小說史中最能表現這種價值意識轉變的作品，為田中英光在一九四八年發表的《醉鬼船》（《酔いどれ船》），這部作品是根據作者在戰爭時期的親身體驗所寫成。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這部小說的歷史背景時，正如前述，日本人無法停止始於

一九三一年沒有宣戰的戰爭。於是，投入戰爭所需的勞工愈感匱乏。此時，政府即考慮以朝鮮人來彌補勞力的不足。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內務次官與厚生次官<sup>\*</sup>聯名發表將朝鮮勞工移居日本的計劃。根據這項計劃，預計把八萬五千名勞工移到日本。這項計劃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擬定的，同年九月起，即開始強制朝鮮勞工集體遷移到日本。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公開宣戰的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便擬定比一九三九年構想更大的強制移居朝鮮人的計劃，這是因為日本戰敗需要引進更多的朝鮮勞工。朴慶植的《被強迫移居的朝鮮人》（未來社，一九六五年），是一本在戰後調查並紀錄如何召集朝鮮勞工，及其往後境遇最可信靠的書。之後，朴慶植又完成《在日朝鮮人運動史》（二書房，一九七九年）一書。這本書指出，戰爭期間，被日本強行帶走的朝鮮勞工多達一百五十萬人。日本政府把其中六十萬人派至礦坑，四十萬人分至軍需工廠，三十萬人派至土木建築業，十五萬人分到礦山，五萬人派往碼頭當搬運工。除了這些從朝鮮被強制遷往日本

\*內務次官相當於台灣的內政部長，厚生次官則相當於衛生署副署長。

本土的朝鮮人之外，又有三十七萬朝鮮人被日軍用做軍中職工和士兵。另外，還有數萬名朝鮮女性被迫擔任軍隊的「慰安婦」<sup>71</sup>。

朝鮮勞工總是被迫從事最艱難的工作，他們的工作時間長達十二至十四小時，工資卻只有從事同種工作的日本勞工的一半。他們當然會計劃逃亡。為了把他們留在分配的工作場所，警方會協助企業進行監督。根據朴慶植的推斷，一九四〇年至四五年期間，在日朝鮮勞工遭遇的事故就有三十萬件，其中死亡者高達六萬人。

在言論界方面，也如同產業領域般並行推展著，政府從一九四二年起召開三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sup>72</sup>。第一次會議中，正式使用的語言是日語，而且僅限於使用日語，亦不翻譯成日語以外的語言。對朝鮮人來說，這並不意外，因為日韓合併以來，朝鮮人已經被剝奪使用朝鮮母語。在朝鮮的學校裡，日語成為正式的教材。一九三九年，也就是「滿洲事變」八年後，對美、英宣戰的前二年，日本政府下令規定，要所有的朝鮮人改用日本姓名，這項法律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實施。著名的朝鮮作家們都用他們新的日本姓名發表作品，這些著作都是依據被日本強迫「轉向」的思想，用日語寫成的。

田中英光（1913-1990）是以日本划船選手的身分，參加一九三二年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才廣為人知的。當時，他是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院的學生。他在學生時代與其兄長同為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者而從事活動，但隨著十五年戰爭的進行逐漸退出共產黨的活動。《奧林匹斯山上的果實》（《オリンポスの果実》）是描寫一九三二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紀實小說，田中英光就是以新進作家成名的。由於他是「橫濱橡膠」公司的員工且住在朝鮮，因此日本政府起用他擔任「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組織朝鮮作家的的工作。小說《醉鬼船》是他描寫「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的第一部文學作品<sup>56</sup>。小說這樣描寫：主角的口袋塞滿厚厚的鈔票，和他的老同學在朝鮮的首都四處閒逛。他曾經跟這個老朋友一起

56. 朴慶植《朝鮮人強制連行の記録》（未來社，一九六五年）

57. 尾崎秀樹（尾崎秀實之弟）〈大東亞文学者大会〉（《旧植民地文学の研究》勁草書房，一九七一年）

58. 要廣泛掌握日本近代文學中出現的朝鮮人形象的作品，可參見朴春日《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朝鮮像》（未來社，一九六九年）。

其後，有高崎隆治《文学にみる朝鮮人像》（《三千里》二五号，一九八一年二月發行，春季号）。這篇文章顯示出戰爭期間日本人撰寫關於朝鮮人的文章還有選擇的空間。



從事左翼的地下運動。後來，他們雖然一同「轉向」，但為了證明自己還有反抗權力的勇氣，居然藉醉打賭，走進派出所，在基層員警的坐墊上小便。想起這件陳年往事時，主角挑釁朋友說：「像你這麼沒種的人，一定不敢在這廣場的正中央大便吧！」這時，老友竟藉著醉意，爬上京城裡行人最多的廣場正中央的噴水台，蹲在台邊，脫下褲子拉出大便後，還半舉屁股一邊用力拍打，一邊大聲喊著：「喂，日本人就在這裡！日本國王，你來吃我的屁股啊！」可是，那些仗勢酒醉獲得的勇氣乍然消失了。現在，他只是一個屈從權力而「轉向」的可憐的懦夫。主角年輕時擁有熾烈的理想主義已然消失，眼下只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僱傭的中年男子，閒暇之餘到朝鮮的娼館消磨時間，現在卻因為遵從日本政府的囑託組織朝鮮作家，才得到這筆鉅款。

在他們少年時讀過的教科書，有則故事說，從前有個勇敢的日本士兵和朝鮮人交戰被俘，但他始終不肯向朝鮮人洩露日本軍事行動的秘密，反而大聲喊道：「朝鮮王，（其實是新羅王）\*，來咬我的屁股吧！」因而被處死。現在，這部小說不但用全新的邏輯，還充分運用了日本文學關心糞尿的傳統。換句話說，日本知識分子坦露的屁股和拉

下的糞便，正是這位作家有意藉此表現日本人與朝鮮人關係的重要象徵。在此之前，日本人不管是左翼或右翼都相信文明階梯的想法，但在觸及朝鮮和日本的關係時已經完全被拋置一旁，過去看待朝鮮與日本的架構在此已經瓦解。而所謂日本人的新架構，是透過看待朝鮮人，以及與朝鮮人的關係中來建立的：意即他們如何為各自背負的重擔而苦惱，並藉由這個重擔來審視彼此。日本人就是透過這個全新的架構，才習得對背負遠比日本人沉重的朝鮮人表示敬意的。過去那種劃分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差別在此被棄之不用了。這正是十五年戰爭帶給某些日本作家的影響。

就田中英光來說，由於自己從未迴避曾經「轉向」的羞恥經歷，才得以理解同為被迫「轉向」的朝鮮作家的苦悶。此時，「轉向」成為結合這兩個民族作家的契機之一。

正如前述，日韓合併時，在日本只有少數人對此提出批判，詩人石川啄木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激進的社會思想家。而在保守的文學家之中，柳宗悅（1889-1961）是少數明

\*新羅，中世紀時位於朝鮮半島上的一個國家，後為高麗所滅。

顯關心韓國問題的人<sup>39</sup>。柳宗悅起先受到來自英國的年輕陶藝家——伯納·里奇的影響，開始迷上朝鮮李朝時代（1392-1910）的陶瓷器。朝鮮的陶瓷是三百年前左右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時，由他的部將帶回日本的，後來在茶道上獲得很高的評價。柳宗悅注意到，其實日本茶道中著名的器皿，在朝鮮原本是日常雜器，都是由無名的陶工製作的。於是，他再回過頭來看日本，對自己提出一個疑問：日本傳統中是否也有同樣優秀的工藝？這股探究的風潮，旋即被稱為「民藝運動」，後來更促成日本工藝復興的動力。

在前述的脈絡中，重點是柳宗悅因為熱愛朝鮮的工藝，於是對日本政府採取破壞朝鮮民族文化的政策，明顯表示抗議。對於日本政府在一九一九年毫不留情地鎮壓朝鮮獨立運動的示威遊行，柳宗悅也寫過幾篇隨筆加以抗議。同時為了表示某些日本人對日本政策的愧憾之情，他甚至對外募款，呼籲將散落日本各地的朝鮮藝術作品帶回朝鮮，試圖在一九二四年以「朝鮮民族美術館」的名義公開展覽。

他謹慎地把自己的批評限於工藝和美術的領域，沒有直接對政治本身提出批判。然而，日本合併吞朝鮮後，儘管已經過一、二十年，他並沒有屈服於這個既成事實，仍不改把日本與朝鮮寫成「兩個國家」的作風。在他所身處的集體轉向時代裡，這種一貫的

態度是極為罕見的。根據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看法，正當政府代表與國家主義者高唱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的許多文物，代表日本文化的優越性時，柳宗悅卻勇敢地拂逆這股風潮；內藤湖南還指出，若虛心觀察可以發現，其實，日本指定的那些國寶文物，都是移居日本的朝鮮手藝人留下的作品。

興起於一九三〇年代的極端國家主義風潮倡言：純粹無瑕的日本民族自古就存在，其祖先乃是從天上降下的，此種種民族創造出的優異藝術作品，已代代留傳至今。綜觀柳宗悅的批評活動，他總是對日本文化這種極端的國家主義風潮，表現出鮮明的抗議。

59. 柳宗悅認為，朝鮮人喜好白色與朝鮮藝術的線條之美，正是朝鮮人悲哀的表現。朝鮮人本身對柳宗悅論點的批評，見崔夏林〈柳宗悅の韓国美術觀〉（柳宗悅著，李大源譯〈韓國とその芸術〉（一九七四年，知識産業社，ソウル）的解說）、金達壽〈朝鮮文化について〉（〈岩波講座 哲学〉第一三卷《文化》岩波書店，一九六八年八月），還有金潤珠、文明大、金勇、金兩基發表的談話。

高崎宗司〈柳宗悅と朝鮮〉（《朝鮮史叢》第一号，一九七九年六月）廣泛綜覽過去韓國人批判柳宗悅的朝鮮論後，為柳宗悅的著作重新定位。

李進熙〈李朝の美と柳宗悅〉（《三千里》第一三号，一九七五年二月号），除了批判柳宗悅的疏漏之處，還指出柳宗悅試圖修正初期著作中的見解所做的努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時候，日本本土有二百萬朝鮮人。跟隨佔領軍來到日本的艾德華·華格納，後來寫了一本書，題為《日本的朝鮮少數民族 一九〇四—一九五〇》。他在書中指出，當時的佔領軍並沒有收到對於居住在日本的朝鮮人的詳細指令<sup>69</sup>。因為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只專注在如何處置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對居住在日本的朝鮮人反而疏於研究。由於沒有詳細的指示，佔領軍便協助居住在日本的朝鮮人返回朝鮮。進行這項工作時，佔領軍雖然要求日本官員注意民主主義與反對歧視的原則，但這只是就整體原則而言，所有的細節全交由日本官員處理。因此，反而造成日本官員用投降前的同樣方式來對待朝鮮人。

當時，朝鮮人大都希望回到他們出生的國家。然而，在這時候，他們的祖國卻分成南北兩邊，並被不同政治思想的外國勢力所支配。祖國分裂的情勢成了許多在日朝鮮人不積極返國的理由之一。另一種理由是，他們若要重返祖國，就必須幾乎空手而回。更詳細地說，他們獲准帶回去的金額，只限一千日圓。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把這些年在日本艱困環境下工作賺取的所有財產留在日本，才能返回故鄉。

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之前，日本政府遣送朝鮮人回國的計劃已經結束。經過

若干年後，雖然又遣返一批朝鮮人回去，但當時大致已經停止。現今，大約還有六十萬朝鮮人留在日本。其中大多數屬於在日朝鮮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們在日本出生、長大，在日語的環境中接受教育。根據各種調查顯示，日本人現在仍對在日朝鮮人抱持偏見，日本企業雇用他們的機會也受到這種歧視待遇的制約，與日本人通婚的機會也受到同樣偏見的阻礙。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在日朝鮮人，一方面理解具日本人身分所過的生活，同時也基於這個理解，培養出批判日本的觀點。在日朝鮮人的人數比起在日本人口要少得多，但正因為這種觀點，他們對日本文學的貢獻很大。更嚴謹地說，這貢獻對於日語書寫的文學而言，不但提高日本文學品質，還展示議題的深度。

金時鐘出版過二本長篇敘事詩<sup>61</sup>，其中一本以《新潟》為題，這是取自在日朝鮮人告別留在日本的親友們，返回祖國時的港口名稱。另一本以《豬飼野詩集》為題，描寫在

<sup>60</sup> Wagner, Edward Willet, *The Korean Minority in Japan, 1904-195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1.

愛德華·W·華格納著《日本における朝鮮少数民族 一九〇四—一九五〇年》（湖北社，一九七五年）。

<sup>61</sup> 金時鐘《新潟》（構造社，一九七〇年），同《豬飼野詩集》（東京新聞出版局，一九七八年）。

日朝鮮人群居在大阪市裡，雖然住在日本，但仍堅守自己的民族習慣生活著。若說明治維新以來至今一百一十年中用日語書寫的詩歌，只有這兩本長詩，並非言過其實。例如，在更早以前有白樺派詩人千家元麿所寫的長詩《從前的家》（昔の家），雖然是優秀的作品，但尚未完成。至於日語長詩的寫作為何是由在日朝鮮詩人完成的，在我看來，這是因為住在日本的日本人，往往把興趣投注到當地社會生活的細微部分，而在日朝鮮人卻在日本社會中備受排擠和壓迫，反而能培養出審視日本整體社會的觀點。換句話說，他們若不去思考被帶到日本以後的歷史，就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待在這裡；他們若不追溯往前的歷史，也就無法瞭解為什麼受到日本人的歧視。由此看來，他們已經學到透過歷史的視野觀察現在的日常生活。另一個理由，也可能是因為在日朝鮮人所寫的日語詩作中，早已受到朝鮮故事詩的影響。日本人原本就沒有這種故事詩的傳統。明治時代的優秀文學家中，勘助（1885-1965）曾經努力想創作長詩，最後卻得出日語不可能寫出長詩的結論，後來轉而朝向寫作童話式的故事。正如前述，比他年輕一代的千家元麿的長詩《從前的家》，就是受到俄國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影響寫成的。《從前的家》這首詩把他明治初年的故鄉風景點描如畫，而且趣意盎然，可惜並未能完成。

金達壽在一九五八年完成中篇小說《審判朴達》<sup>62</sup>，小說的主角是南朝鮮的勞工，戰敗後不久，他到處張貼批評當時專制政府的海報因而被捕，但每次被捕，便當場後悔哭喊，保證以後不會再犯，而獲得釋放。後來，又做相同的行徑，被逮捕，又同樣哭著懺悔，而獲得釋放。於是接連上演同樣的舉措，警察每次逮捕他時，都投以輕蔑的眼光。之所以持續重犯故錯，是為了招惹警察輕蔑他的生活態度。在日朝鮮人金達壽寫這部小說的用意，在於批判日本知識分子在轉向看法上的硬直姿態和僵化形式。在金達壽看來，日本知識分子僵化的轉向觀，是明治以前武士階級文化的「不幸遺產」。明治以後的文化，由於以前武士階級的德目擴展到整個日本國民，才奪走了日本人民原有的彈性活力。金達壽八歲時移居日本，從小學時開始，就以撿破爛等工作養活家人，由他作出批判應有其說服力。

高史明是另一位朝鮮小說家，他出生於日本，父母親是來自朝鮮的移居者。他所寫的自傳式長篇隨筆《生存的意義》<sup>63</sup>在一九七五年出版。在這本書裡提到，要上日本的小

62. 金達壽《朴達の裁判》（筑摩書房，一九五九年）。

63. 高史明《生存することの意味》（筑摩書房，一九七四年（實際出版日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無誤））。



學時，高史明用已是小學生的哥哥幫他所取的日本名字開始上學，他經由讀寫的教化而變成日本人，漸漸地將日本政府的立場與自己合為一體來思考事情。因此，日本政府在 一九四五年投降時，他也茫然若失了。從這時候起，父親究竟如何生存下來的意象，才逐漸在他心中以新的意義浮現出來。高史明的父親是碼頭工人，和同樣來自朝鮮的碼頭工人一起工作。所以對他說來，學會日語在工作上是沒有必要的。而在家裡，他也只說朝鮮話，吃自己烹煮的朝鮮菜度三餐。因為妻子早逝，為了養育年幼的兒子，他必須負擔所有的家務。兒子們上小學時，因為口中常有大蒜的臭味而覺得難為情，所以向父親訴苦，要求不要用大蒜做菜，父親因而生氣地說：「朝鮮人吃朝鮮食物有什麼不對？」不過，父親並沒有發覺兒子們自行決定採用日本名字。他對於日本政府制定的法律——朝鮮人必須放棄朝鮮人的姓名而改成日本姓名——幾乎一無所知。他只懂得在職場跟在日朝鮮人的勞工同伴一起生活，在家裡與年幼的兒子一起生活，一成不變地守著朝鮮人的生活。他總是叫自己的次子，也就是這本書的作者「裘睦尚、裘睦尚」。這是兒子出生時，他為兒子取的名字，他一輩子都叫兒子這個名字。而在戰爭結束後的混亂中，高史明才逐漸明白這其中的意義——父親是在何等艱困中生存下來的？在不停叫自

己的兒子「裘睦尚」之中到底包含什麼意義？「裘睦尚」只是一句簡單的詞彙，但這個詞彙中，卻有日本政府透過軍國主義的十五年戰爭，也無法打破的某種態度和觀念。高史明的《生存的意義》是「非轉向」的一個實例，這種「非轉向」根植於在日朝鮮勞工在日本社會中的生活處境，以及他們所屬的階級和民族意識。

以「非史達林化」為目標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

對向來把文明階梯視為一個實體的日本人而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為他們的想像力帶來很大的刺激。這個刺激，透過「東大新人會」的組織，擴及到日本全國的知識分子，和以準知識分子自居的年輕族群。創立於一九一九年的國際共產黨，在一九二〇年之後，開始與日本的左翼運動進行接觸。日本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二年，在創黨黨員當中，包括了前一時代各種傾向的社會主義者，比如在日俄戰爭中高唱反戰、或僥倖逃過「大逆事件」牽連的倖存者。然而，他們力主折衷式的社會主義，以及源自個人體驗的思考方式，遭到了年輕大學生們的輕視。因為這些大學生直接承襲自西方文明中最進步國家的思想，而這些國家正邁向社會主義。許多日本新世代的社會主義理論家，都跟隨蘇聯的作法，從一般理論出發對現狀做出結論。他們向當時

的日本提出一種見解：蘇俄是個必然依據理論邏輯發展的國家，且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唯一祖國和代表完美社會的國家。即使在其後發生審判革命運動的事件中，初期的幾名領導者，如托洛斯基、布哈林、卡米涅夫、拉狄克和季諾維也夫等，這些社會主義理論家不僅輕率地做出蘇聯政府的處置是正確的結論，而且對這審判沒有任何質疑，更沒有在日本形成討論。

日本共產黨創立之初，其領導者山川均（1880-1958），是經歷過「大逆事件」，並戮力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倖存者之一。他提出忠告：日本的左翼知識分子必須對勞工階級每天為掙取生存糧食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更大的同情，而且必須和他們結合起來。不過這個觀點，卻遭到剛返抵國門不久的福本和夫（1894-1983）反駁，他是代表新時代留學德國，並用原文學習共產主義理論的年輕教授。福本和夫在解釋列寧主義中指出，菁英知識階層首先要從群眾抽離出來，再以激進知識分子的身分徹底武裝理論，才是左翼群眾運動與知識分子進行大團結之前的必要條件。福本提出「先離後合」的組織論，在當時信奉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之間獲得勝利，而成為日本共產黨創立初期深具指導性的理論家。但是後來，共產國際常駐莫斯科的領導者們將包括福本在內當時的一些領導者召到

莫斯科，除了否定福本的理论，並送交一九二七年綱領，指示日本共產黨以此作為行動方針。二七年綱領指出，當前的日本仍處於絕對主義的半封建天皇制之下，農村地區還殘存著半封建的地主與佃農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直接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曾尚未成熟。而首先必須推動的是，以工人和農民為主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革命，藉由這個革命，來實現廢除天皇制和封建地主制的解體。這個觀點，在一九三二年的綱領中更加明確。這些在莫斯科起草的方針，因而成為日本共產黨行動戰略的基礎。但依循這種不妥協的主張，以徹底廢除天皇制為目的而展開的忠實鬥爭，卻招致日本共產黨至一九三五年為止，短促而幾近毀滅的結果。當時，革命日本的方針吸引許多熱情的日本青年，儘管面對警察的脅迫，他們仍舊毫無私心地全力以赴，其中更不乏為堅持理想不惜犧牲性命的年輕世代。

一九三一年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兩年後，發生了日本共產黨贊同者集體轉向的事件。有黨員要求，要守護日本共產黨這面旗幟，需要無比的勇氣和長期的堅持抗爭。因此有十幾人寧願忍受漫長的牢獄生涯，有幾個人死在獄中，也有殘存到戰爭結束的。這些黨員，無視於日本政府十五年來所做的軍國主義的宣傳，仍舊忠誠地信奉著

蘇俄共產國際起草的「綱領是科學」的真理，更遑論對共產國際總部指示的方針作出質疑或批判了。當時，脫離日本共產黨的成員在「轉向」的時候，至少已經認識到，共產國際所做的方針，對在日活動的瞭解不夠充分。而這種「認識」，在他們轉向時起了很大的作用。

擔任過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的佐野學（1892-1953）在轉向聲明中批判日本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盲從，並呼籲日本應該在天皇之下，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一國新政黨。當時，他對日本共產黨應從共產國際的指令中解放所做的批判，極具說服力。在義大利和法國，脫離蘇俄的指示，基於獨立判斷的社會主義理論非常盛行，其對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所做的批判，正是依據這個理論展開的。相反的，僅從理論架構來看，佐野學在日本提倡的一國社會主義，有點類似史達林所提倡的。但現今回顧起來，他顯然是在呼籲日共，在擺脫共產國際的同時，要停止對天皇政府的批判。相對於克服擺脫蘇俄政府的判斷，持續進行獨立批判的課題而言，佐野學及其後的黨派，在一九三三年的轉向聲明之後，已經無力回應日本當時逐漸抬頭的軍國主義了。

以下試舉埴谷雄高（1910-1997）為例。他在佐野學等人入獄之後，由於黨內沒有年長的黨員，因此年僅二十歲便被送上日本共產黨領導者的寶座。然而，他的轉向又與佐野等展現出不同的軌跡。埴谷是一九三三年繼佐野學之後，在獄中轉向的共產黨員。雖然檢察官在他面前撰寫審訊的筆錄，但他卻看見自己的所思所言與眼前的原資料截然不同。同時，他發現自己正掉進檢察官製作的代表日本政府的正式紀錄，和由獄外的領導者們製作的日共正式紀錄的裂縫中。他自覺到自己已被逐出正式的歷史記述，也驚訝到除了他之外，肯定有更多不幸的人，同樣在不為人知的狀況下死去。他自問：難道我不能用這份自覺來寫作嗎？對他而言，這種自覺成了一種希望，他就是倚靠這絲希望在漫長的戰爭歲月中存活下來的。在這段期間，他當過財經相關的小型雜誌的編輯，有時候也靠翻譯各種書籍和報導來維持生計。

儘管埴谷雄高作為一個受到戰爭影響、沒沒無聞的日本人過著世俗生活，但他把自己分成兩種角色，過著雙重的生活：也就是他讓一個自己停留在轉向的時間點上，努力盯住他所看到的事物；另外一個自己則是作為一名平凡的勞動者。日本投降之後，埴

谷和戰爭時他頗為信任的六個朋友，於一九四五年底創辦了一份同人雜誌——《近代文學》。這本雜誌，對戰後日本人思惟方式的形成，影響甚鉅<sup>64</sup>。

戰爭期間，埴谷除了翻譯之外，僅發表過兩篇短品。一篇是發表於一九三九年的幻想小說〈洞窟〉，另一篇則是以〈Credo Quia Absurdum——因為不合理，所以我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不合理ゆえに吾信ず〉）為題的格言集<sup>65</sup>。這些費解的作品，早就隱含在牠定為畢生之作的長篇小說——《死靈》的主題中。一九四六年起，《死靈》以連載的形式發表，尚未完成時，作者自己卻說：「我想大概不會完成吧。」這部小說，既不是描寫歷史上的特定人物，也不是刻繪地球上的特定場所。小說是埴谷在獄中構想的創意，但這純粹是幻想之作，而不是一種合理的社會哲學與社會思想體系，或者對現代史中某一事實的記述，努力地提出作者的看法。儘管這部小說表面上是採取空想之作的形式，但同時也是從一個獄中之人的立場，對日本共產黨及史達林統治下的俄羅斯國家，採取毫不妥協的批判！

從表現的形式來看，《死靈》是否可稱為小說仍有爭議，就算把它視為小說，也無關乎歷史上的任何事實或人物。然而這部小說，卻有一九三四年日本共產黨凌虐事件的



烙印<sup>(64)</sup>。這起凌虐事件起因於：現任的日共委員長，懷疑當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兩名成員涉嫌充當間諜，埴谷也從黨的立場，以同為中央委員會成員的身分出席，對兩人進

64. 《近代文学》雜誌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舉行創刊說明會，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創刊號（一九四六年一月號），直到一九六四年八月號宣布停刊。在這期間，加入許多同仁。原本的創刊同仁為：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埴谷雄高、平野謙、本多秋吾和川室靜等七人，除了因與共產黨對立退出同仁行列的小田切秀雄之外，其餘六人，從創刊至停刊，十九年間共事編務。

有關這段歷史，後來以同仁擴增時期的參加者，以及創刊後攜手共進的社外執筆者回憶的形式彙編成《「近代文学」創刊のころ》一書（深夜叢書社，一九七七年）。

65. 埴谷雄高〈洞窟〉（《構想》創刊号及第二号，一九三九年）。

同〈Credo Quia Absurdum〉（《構想》一一七号，一九三九—四〇年）。

小說《死靈》開始在二戰結束後出版《近代文学》創刊號（一九四六年一月号）上發表，迄今未完。

《死靈・六章》（講談社，一九八一年）已出版，後來寫至第八章。

66. 有關讓埴谷雄高構想寫出哲理小說《死靈》的「共產黨私刑事件」，同為《近代文学》創刊同仁的平野謙曾寫《「リンチ共産党事件」の思い出》一書（三一書房，一九七六年）。該書附有當事者之一的榎田里見的審訊筆錄、相關文件和埴谷雄高的後記。

行盤問。其中一名間諜涉嫌者，因為神經性休克在審問中猝死。另外一名間諜在戰後作證指出，當時他是被日本的特務送進日本共產黨臥底；而趁另一同伴之死引起混亂，逃離禁閉場所。當時的報紙和警方通力合作，藉由這次事件，大肆渲染共產主義的殘虐。約莫兩年前，一九七七年，民主社會黨議員在日本國會提案說，日本共產黨委員長曾參與一九三四年的私刑事件，應追究其責任，解除其國會議員的資格。有關當時的私刑事件，現今的日本仍極為關注，但埴谷的見解與此不同。他是從罹難者的立場來看這事件。在他看來，罹難者是在密室中受到同伴的訊問，因而猝死的。此外，埴谷也從被黨分配作為黨中央委員會成員情婦的立場，來看待這個事件，因為這個黨中央委員竟然是警方的密探！這名女性在遺書中說，她以身為密探的情婦深感羞恥，隨後就自殺了。埴谷把小說的重心放在可以聽見罹難者聲音的暗盒中。這樣一來，當時在私刑現場，現在已成死者的主角，即可透過虛擬的電話裝置，和當時被逼上死路的叛徒之魂進行對話，並順便（用順便一詞有點唐突）與站在宇宙過程的終極物質交談。從這極點來看，黨的政治鬥爭可視為唯一過渡時期的總和。在這個極點上，一切都已死亡，共產黨死了，往昔標榜行事正確的共產黨領導者也死了。若從這個觀點來看，政治活動的真諦，包括共

產黨的政治活動在內，可以化約為如下簡單的呼聲：

他是敵人！

打倒敵人！

倘若有人抱持這種想法致力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話，他一定會為共產黨挺身而出，對共產黨行將到來的滅亡謹記在心。如果他是共產黨的領導者，大概會為行將到來、勢必來臨的領導終結和作為領導者之死而努力吧。也只有抱持這種展望，他才能在共產黨的活動中充分應用阿克頓 (John Acton, 1834-1902) 的名言：「一切的權力都會腐化，絕對的權力

當時，平野謙重病在床，他之所以在這時候發表對「私刑事件」的看法，主要是斷定一九七六年一月末民社黨的春日一幸把這「共產黨私刑事件」帶入國會，並要求開除當時的共產黨負責人宮本顯治（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的做法，頗有讓戰時日本政府復辟之嫌。

有關這個事件，已有多篇文章討論，日後還會有更多披露。其中重要著作如：立花隆的《日本共產黨の研究》（講談社，一九七八年）、宮内勇（一九三〇年代日本共產黨私記）（三一書房，一九七六年）、菅原克己《遠い城——ある時代と人の思い出のために》（創樹社，一九七七年）。

造成絕對的腐化！」可惜在戰爭期間，只有少數人有此清醒的見解。在左翼運動的領導者中，有許多仿效佐野學轉向的知識分子，在脫離往昔信奉的史達林主義之後，轉為推崇對中國、美國和英國推動聖戰的當今天皇<sup>\*</sup>。反觀直到日本戰敗後仍堅守非轉向立場的共產黨員們，旋即受到日本整個社會的矚目，極大程度地影響著學生和積極投入左翼運動的年輕人。這個影響力不但深化到他們領導下的年輕族群，使其繼承十五年戰爭前，非轉向共產黨員即堅守不渝的想法，更把當時史達林指導下共產國際的正確性信念，深植在年輕跟隨者的腦海中。直到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接班人赫魯雪夫在公開演說中透露，史達林生前曾誅殺過政治上的異己，埴谷雄高未被重視的觀點，這才開始得到理解。換句話說，許多對戰後舊左翼幹部的領導感到幻滅的年輕世代，以及眾多即使深感幻滅仍不願離開左翼陣營的日本青年們，開始感同身受地接受埴谷的見解了。

一九六〇年，岸信介出任日本的內閣總理。岸信介是戰爭期間東條英機內閣的閣員之一，同時也是擬訂先前提及的強迫朝鮮勞工移住日本，和強制勞動計劃的高官之一。這一年不是對美宣戰，而是日本與美國重新簽署具決定性軍事協定的年代。當時，大批脫離日本共產黨非共黨系的左翼學生們，對這項軍事協定進行了大規模的抗爭。這個時

候，埴谷雄高的著作不僅比戰爭期間更受到青睞，甚至比批判史達林時期吸引更多讀者。埴谷雄高和吉本隆明因而同被評為六十年代以後，在日本極具影響力的新左翼先驅者。他們的見解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也深受佛教和耆那教<sup>註</sup>的影響，因此可以將它視為一種虛無主義的思想。

眾所周知，「無的哲學」是由西田幾多郎（1870-1945）在日本所建構的。根據三木清（1897-1945）說，西田幾多郎是日本最早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並躋身近代哲學史上的哲學家。但是在政治思想中，他代表「無的立場」美化天皇，進入戰爭時期之後，自己更投身至崇拜天皇的洪流中。後來，甚至草擬日本充滿大東亞共榮圈思想而發動戰爭的相關文件。與此鮮明對照的是，即使在戰爭時期，埴谷雄高的虛無主義思想既未被崇拜天皇的潮流淹沒，也沒有在極端崇拜史達林的思想中滅頂，可說是達到了徹底的虛無吧。這樣一來，埴谷雄高對戰後的日本左翼，其盲目崇拜、貫徹非轉向的少數日共領導者的作為，自然無法予以苟同。在戰後的日本，埴谷雄高將自己安置在共產黨的周邊，並採

\*即昭和天皇。

#印度的一種古老宗教，約起源於公元前五世紀，反殺生，尚禁欲。

取與舊左翼共同奮戰的立場，但是他絕沒忘記自己擔任黨的領導者時，因判斷錯誤造成許多犧牲者的往事。他不斷地與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保持距離，繼續站在被區分為一般黨員的、並為此付出勞動的群眾的立場。他堅信領導者不久終將消亡，更堅信因為這個因素，黨的領導者必須經常輪替。因此在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他的見解旋風般吸引著激進派的年輕學子們。

二次大戰以前，在左翼的團體中，即存在著對共產國際正確性的質疑。這種人在勞農黨<sup>\*</sup>系統的學者和運動組織者中不在少數。山川均就曾對當時日漸高漲的軍國主義，提出一貫的批判態度。他與主張透過新世代領導者的分合，藉此淨化和純化激進派運動的理論相悖，而很早就脫離了共產黨。但是他仍堅守批判權力的立場，儘管在許多共產黨系統的領導者被關進牢獄，或轉向成為極端的軍國主義者之後，他仍主張不分黨派或學派，試圖組織反軍國主義的人民戰線。因此到了一九三七年，他和許多勞農派系及運動組織者，在中日戰爭方興未艾之際，統統被送進了監獄。

山川均在其生涯中，曾數度進出監獄。獲釋期間，他做生意維持生計，開過藥局、照相館、計劃開設印刷廠（但並未實現）。此外，他還做過酪農、做代書幫老顧客寫

信、廣告代理商、園藝，也開設養雞場出售雞蛋。他的生活方式和做法不同於，比他稍晚出身自「東大新人會」系統的大部分左翼領導者。民俗學者柳田國男（1875-1962）提議，在明治維新以後，所有的日本國民都能過著，在過去只佔日本極少部分的武士階級的生活方式。左翼運動的領導者受到這種主張的影響，但山川均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他終其一生都以經商為生。正如他在自傳《山川均自傳——一個平凡人的紀錄》（《山川均自傳——ある凡人の記録》，朝日新聞社，一九五二年）所取的標題一樣，他把自己視為一個平凡人，並以此自覺建立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山川均的兒子，後來當上東京大學的教授，為了幫助他的父親，賣過山川家養雞場的雞蛋，父親卻時常責罵他還未掌握商人之道<sup>17</sup>！

\*日本昭和初期在資本主義論爭中與講座派相對立的馬克思理論集團。因一九二九年創刊的《勞農》為中心，故名。代表人物有山川均、大內兵衛和向坂逸郎等人。

67. 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全二十卷（勁草書房，一九六六年）。

高島通敏編《山川均集》（《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筑摩書房，一九七六年）。

山川均曾發表〈転向常習者の手記——うづら飼ひになるまで〉（《経済往来》一九三五年八月号）一文，談到自己如何在軍國主義的時代應付營生。

大河內一男（1905-1984）的情況與山川均有點類似，但又有顯著的差異。他承認戰爭時期的軍國主義有助於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也從效率不彰的觀點加以批判。大河內這種批判的角色，對日本政府相當有用，因此直到戰後他並未喪失在東京大學的地位。日本戰敗後，在高度經濟成長的一九六〇年代，他當上了東大的校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兩人雖然同為經濟學者，他的經歷卻與山川均不同。

在戰爭時期，大河內是「生產力理論學派」最著名的理論家，其理論對日本政府深具影響力。有幾個在「九一八事變」之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加入了這個學派，他們從共產主義轉向之後，在「生產力理論」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這個學派主張在已知的條件下，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重整合理的社會結構，並希望藉此社會結構促進日本生產力的發展。此外，他們也在國家的各種活動領域中，嘗試提出最具體的政策性建議<sup>18</sup>。大河內說，這個概念是他在一九三一年撰寫〈從概念構成看社會政策的變遷〉（〈概念構成より見たる社会政策の変遷〉）一文時所得到的靈感。當時，他年僅二十六歲，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助教。約莫兩年後，他發表論文〈有關勞動保護立法的理論〉（〈労働保護立法の理論に就いて〉，一九三三年），進一步發展了這個概念。在這兩篇早期的論文中，大河內指出，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政策通常是依資本家的利益形成的。在資本主義最早的階段，資本家為了壓榨更多的勞力，卻招致勞動力降低的結果。資本家自覺到這個弊端之後，轉而支持以保障勞動力為目的的法案。其後，資本家甚至開始部分地接受勞工為其權益發動的勞工運動。在這階段，社會政策主要是以促進社會保障和產業穩定的政策為主。然而，這些社會政策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自覺性所做的展現，因此必須透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排除個別企業的反對才能付諸實行。正是這種見解，大河內及其生產力理論學派的學者們，才得以在戰爭時期批判日本政府。大河內被戰爭時期的政府延攬到委員會工作，他和同屬於生產力理論學派的學者們看到戰爭如何破壞社會的習慣，並使之合理化的情形。他們的分析和建言，雖然代表「大政翼贊會」工作片面的合理性，但整體而言，這既是個推動侵略中國的組織，同時又是把日本推向與擁有龐大優越軍事力量的英、美國家爆發宿命般衝突的主因。

68. 高島通敏〈生產力理論——大河內一男・風早八十二〉（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共同研究・轉向》中卷，平凡社，一九六〇年）。

其後，這個主題延續成戰後的學術型態，中島誠《轉向論序說——戰中と戦後をつなぐもの》（ミネルヴ書房，一九八〇年）一書中有所探討。

在這不久前，大河內一男擔任助教時的主任教授——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河合榮治郎，因為不肯放棄自由主義的立場，受到政府的壓迫不得不離開教職之際，擔任助教的大河內偕同幾名同事提出辭呈，抗議政府對這次事件的處置，但後來幾經慎重的考慮，又撤回辭呈。大河內這種前後不一的態度，被河合的弟子們斥為叛徒。儘管河合榮治郎的言論在戰爭時期遭到打壓，但他始終勇敢地奮戰到底，後來因為營養不良和甲狀腺亢進症去世。大河內離開他的主任教授與恩師，守住東京帝國大學內的地位，可說是貫徹著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因為他以此反抗整個日本國民的武士化，而這正是綁住明治時代以後，所有日本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從這點來說，不能不說他與山川均頗為類似。他始終不超出理性主義，並且從中找到可以繼續批判戰時政策的小徑。就這個意義而言，他的學風不同於與戰時政府的軍國主義正面衝突的恩師河合榮治郎。對大河內而言，這條小徑就是偽裝轉向之路，它具有對抗戰時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又與之合作的雙重功能。有時在這種偽裝轉向中，起初只是虛以委蛇，後來卻不知不覺地成為真實的轉向。話說回來，有的雖說是要偽裝，但偽裝卻變成目的，最後陷入除了偽裝一無所有的狀態<sup>51</sup>。

二次大戰結束時，有六百六十萬日本人滯留在海外各地。從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台灣和非殖民地的南洋群島與英、美、荷蘭佔領下的地區，以及中國等地回歸祖國的日本人直到一九四七年才結束。然而，留在蘇俄領地內的六十萬日本人卻長期不得回來。這六十萬滯外未歸的日本人，在戰後日本人的精神上蒙上一層不安與焦慮。這種不安與焦慮，與戰前日本政府長期深植的，以及戰後美國佔領軍政府未予消除的恐共心理結合在一起，在戰後形成一種潮流。在這時期，也導致一名對蘇俄抱持苦悶情緒的哲學研究者

69. 有關花田清輝對「轉向論」和「追究戰爭責任」的看法——〈罪と罰〉，可參閱《錯亂の論理》（真善

美社，一九四七年）。

花田清輝與吉本隆明的論戰，始於〈ヤンガー・ジエネレーションへ〉（《文学》一九五七年七月号）這篇文章，於〈ノーチラス号反応あり〉（《季刊現代芸術》第三号，一九五九年）一文結束論爭。吉本隆明則以〈不許芸人入山門——花田清輝老への買いコトバ〉和〈乞食論語〉執筆をお奨めする——バカの一つおぼえ、前衛党なくして〉（兩篇皆收入《日本讀書新聞》一九五九年一月），以及〈転向ファシストの詭弁〉（《近代文学》一九五九年五月）加以反擊。有關一九六〇年六月的政治活動，花田清輝寫了一首新詩〈風の方向〉（《現代芸術》，一九六〇年一〇月号），吉本隆明則寫〈6・15事件と私——花田清輝氏に一言〉（《週刊読書人》一九六〇年一月）。

的死亡。現今回顧起來，我們很難理解這個事件，不過，它忠實地反映出一九四七年至五十年代間日本的社會心理<sup>71</sup>。

當時有流言說，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要求蘇俄政府，若被留置在西伯利亞當俘虜的日本士兵不改信共產主義，就不要把他們遣送回國云云。一九五〇年三月，大英帝國代表霍吉森（Hodgson）在遠東委員會上提及此事說，如果這則流言屬實的話，德田球一的行為無異於在背叛他的祖國，而且罪行重大。因此，英國代表要求佔領軍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對德田球一做出強硬處置。這些聲浪促使日本的國會議員在議會裡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德田球一是否涉及此案。

據稱，一名口譯員曾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對日本俘虜傳達德田球一的聲明。後來，他從回歸者中被找出來，被帶到國會的公聽會上作證。這名口譯員叫做菅季治，當時三十三歲，曾在東京教育大學和京都大學念過哲學。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菅季治在面對參議院特別委員會的質詢時，這樣回答：

有關德田（球一）的要求是否存在，我不能做任何評論。在這裡，我只能表述當時

我做為一名口譯員，我只敘述當時的事實而已。

時間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地點在卡拉干達〔Karaganda〕第九分所。（中略）有倖虜提問：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去？蘇聯政府宣稱十一月之前要釋放日本人的聲明，對我們是否適用？在此之前，代理所長謝菲雪夫中尉對這些提問都會據實回答，但這回他卻沒有答覆，只是對著坐在一旁的政治部軍官，揚了揚下巴，示意他做出回答。這時候，政治部軍官艾爾瑪拉耶夫高級中尉站了起來，予以回答。（俄語省略）根據我平常的口譯經驗，我相信直譯比較不會出錯，所以我記得是這樣翻譯的：「各位什麼時候可以回去，全憑你們自己。當各位在這裡真誠地勞動，成為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的時候，你們就可以回去。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期望你們不是以反動分子的身分，而是以做過充分準備的民主主義者回國。」

以上是我根據當天的事實所做的陳述。

70. 菅季治的遺稿是在其死後出版的。《語られざる真実——菅季治遺稿》（筑摩書房，一九五〇年）、《人生的論理——文芸の心理学への試み》（草美社，一九五〇年）。

菅季治在眾議院聽證時，做了同樣的陳述。但是他的回答，未被隸屬於參、眾兩院特別委員會的多數議員們接受。因為若根據菅季治的回答，並不能構成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的犯罪事實，證據也不夠充分。他們逼問證人菅季治，問他是不是用「期望」一詞，來淡化德田球一所寫的「要求」字眼？並進而逼向他，他是不是同情德田球一的共產黨員？有關那場公聽會，當時的報紙都做誇大的報導。這導致菅季治不時接到來自各地陌生的右翼積極分子的恐嚇信函。四月六日，菅季治投身電車自殺身亡。當時，他的口袋裡還裝著柏拉圖《申辯篇》（ソクラテスの弁明）這本小書。在他死後，從其眾多的遺稿中，整理出版了《未被說出的真實》、《生命的邏輯》和《哲學的邏輯》（《哲學の論理》）。

現在回顧起來，為什麼僅憑一個從遠離日俄雙方中央政府的俘虜營選出的日籍口譯員，就可以對日本共產黨書記長是否曾向蘇俄總理史達林提出「要求」，做為決定性的證據呢？現今看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菅季治只不過是居中通譯一名蘇俄軍官的話而已。而這個陸軍士官在蘇俄政府的體系中也微乎其微。至於菅季治在第一次口譯時，是否使用「期望」或「要求」的措辭，並非重要得足以做為揭開事實真相的證據。當時，

菅季治並沒有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立場來保護自己，卻堅守與政治思想無關的陳述事實細節的立場。然而，他的證詞沒有得到國會特別委員會議員們的接納。或許他太相信「真理可以超脫意識型態對立，真理終將被接受」這樣的信念吧。

菅季治被逼上死路的事實，充分反映出一九五〇年蘇俄政府留置六十萬日俘的作法，讓日本全國面臨的緊張狀態。在遭到蘇聯留置的六十萬人之中，有幾名作家對馬克思主義產生共鳴。其中，高杉一郎（1908）所寫的《在極光下》，以及長谷川四郎（1909-1987）的《西伯利亞故事》和《鶴》，這些書在戰後的日本被廣為閱讀，書中忠實地傳達出戰前日本左翼作家不能描寫的蘇俄生活實態<sup>71</sup>。

71. 高杉一郎《極光のかけに》（日本書房，一九五〇年。其後重印收入富山房百科文庫，一九七七年。岩波文庫，一九九一年）。

內村剛介《生き急ぐ》（三省堂新書，一九六七年）。

長谷川四郎《シベリヤ物語》（筑摩書房，一九五二年，後收入《長谷川四郎全集》晶文社，一九七七年）。

石原吉郎《日常への強制》（構造社，一九七〇年）。同《望郷と海》（筑摩書房，一九七二年）。

在任何一個社會，「監獄」都是瞭解當時社會狀況不可或缺的重要線索。政府所公布的數據往往誇大其詞，但那些不為人知的社會實態，卻是由描寫監獄的生活顯現出來的。高杉一郎既寫出負責看管俘虜勞役的官員們的狡猾，也刻繪出與上述截然不同的、俄國人善待日本俘虜的親切之情。讓讀者從中得知，其實在嚴酷的官僚制度之外，還存在著超越蘇俄體制的、超越時代藩籬的俄國人民。久待重返祖國的夢想實現時，據說，高杉一郎對他的同伴們說，我們回到日本之後，一定會懷念起在這裡等著大排長龍打飯的日子吧。因為他相信，這種不需任何命令依然守秩序排隊的習慣，反映出平等精神在日本的乏善可陳。而在高杉一郎看來，這種平等精神已成為俄國社會生活的牢固基礎，同時他也堅信，這是革命帶給俄國的禮物。

在長谷川四郎的《西伯利亞故事》一書中，也出現過極為蠻橫的蘇俄政府官員。此外，長谷川還保留了一幅舊陸軍少校的精美肖像。他說，這個與蘇俄政府合作推動俘虜營民主化的日本軍官，當著自己的部下以及眾多日本俘虜面前，掏出天皇頒贈的勳章，扔在地上頻頻踐踏，極力斥罵這是反動時代的遺物云云。不過，根據他的發現，後來，這名軍官始終保有這枚勳章，並妥善地把它藏在行李箱的底層。在俘虜營製造出來的馬



列主義，畢竟是速成製品，因此在他們踏上日本後的短期內便消失無蹤了。總之，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所說的是「期望」或「要求」，最後都沒有明確的結論。

石原吉郎（1915-1977）是戰後日本最值得注目的詩人之一。他因為懂俄語而遭到逮捕，也是因為懂俄語的關係，被懷疑是間諜，進而被當成戰犯留在西伯利亞。他被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當時，那個官拜陸軍上校的老審判長匆匆唸完判決書之後，迅即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拿起身邊的紙袋走出法庭。石原猜想，這個老人的太太大概吩咐他回家時在市場買點晚餐用的食材吧，以致他在宣讀判決書時也心不在焉，思緒早就飛散了。

石原被判無期徒刑以及後來被放出俘虜營都是在毫無根據下進行的。這是一九五〇年代史達林死後發生的事。即便在當時，石原仍不清楚自己遭到判刑和獲釋的真正原因。他回到日本的時候，日本已從戰敗的打擊中恢復，正處於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日本人已經忘記戰爭的存在。石原的父母在他滯留西伯利亞時已經去世。石原心想，他的兄弟和親戚們應該會理解：他和六十萬同胞在這場魯莽的戰爭中，都是無辜遭到株連的犧牲者，理應得到同胞的慰藉才對。可是情況剛好相反，一個親戚長者卻對他說：「你若共產主義者，就不要進這個家門！」

在西伯利亞度過無依的嚴酷歲月，以及看見日本人置身在極度繁榮中自我陶醉的情景，使石原突然成了一名詩人。當他聽到久未聞見的日本人的對話，他也用日語和他們交談。詩歌就是在這種經驗中，從他的心中迸湧而出的。他除了寫詩，還著有《來自日常的強制》一書，書中對俘虜間彼此漠不關心、但為求生存團結一致的共生經驗，有鮮明的描寫，此外，還對淪為俘虜的狀態、對看守員的憤怒，對俘虜同伴的寬容、以及擔憂夥伴和因為營養失調在嚴酷的勞動條件下死去的朋友，都有入木三分的刻劃。根據日、俄雙方政府的正確統計，被拘留在西伯利亞的五十七萬五千名日籍俘虜中，有五萬五千人是在拘留中死去的。這是蘇俄對日宣戰到日本投降僅僅八天之間，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高杉一郎、長谷川四郎、石原吉郎等所寫的都屬於紀錄性的散文，但和埴谷雄高的哲學式小說有相通之處。他們都是用透視的角度，亦即透過死者之靈的身邊事物，來描寫社會主義國家和官僚主義。

除了這些作家留下的作品之外，其他被拘留者也留下許多紀錄。幾天前，我收到一本由青森縣出身的公司職員伊藤登志夫出版的《白色安卡拉河——伊爾庫茲克第一俘虜

營紀實》<sup>72</sup>。他跟待過伊爾庫茲克第一俘虜營的同伴說，回到日本後，希望籌組「安卡拉會」，每年聚會一次。上述的「安卡拉」，指的是流經伊爾庫茲克第一俘虜營的河流。伊藤藉由每年與來自全國各地同伴見面的機會，喚醒彼此的記憶，他的書就是對這些集體記憶的彙編。在此，伊藤和他的同伴——前日本俘虜們——做出結論：共產國家雖然沒有如戰前日本政府教育下那麼惡劣，但的確不是舒適的居住之地。這個說法已約略道出與左翼運動無關的日本人居住在蘇俄的實況。他們甚至親眼看到俄國女性啃咬高麗菜心的情景，高麗菜心既硬、不易下嚥又難吃。這個景象讓他們認識到，在當時，不只是日本俘虜受到飢餓之苦，所有的俄國人也陷入營養失調和食物不足的困境。從這種狀況來看，他們承認，俄國政府直到戰爭結束後，仍強制拘留六十萬外國士兵在自己的領地內壓榨努力的作法，儘管有失妥當，但卻是聰明之舉。根據伊藤推估，之所以造成五萬五千名俘虜的死亡，主要是因為日本人無法適應西伯利亞的酷寒所致。對此，他們既不恨蘇俄的人民，也不恨蘇俄的政治體制，說來有點令人匪夷所思，但這似乎道出日本人

72. 伊藤登志夫《白きアンガラ河——イルクーツク第一捕虜收容所の記録》（思想の科学社，一九七九年）。

向來就沒有特定的意識型態，所以淡然以對。正因為日本人抱持這種情感，日本才沒有強烈要求歸還直到今天仍由蘇俄保管的千島群島的其中二島——擇捉島和國後島，雖然俄國人也承認這些島嶼自沙皇時代起即屬於日本的領土<sup>73</sup>。

或許下述這種看法，反映出現代日本民眾在政治上的智慧：日本既已被安置在美國的核傘保護下，就不要因為這個經濟上意義不大的問題<sup>\*</sup>，刺激或激怒這個除了美國之外的另一個軍力強大的鄰國！

73. 儘管如此，根據現在（一九八一年）日本的輿論調查指出，蘇俄仍是日本人心中最不受歡迎的國家之一；這個數據已表現在新聞的輿論調查中。

\* 應指擇捉和國後二島的經濟效益。

## 玉碎的思想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八日

最近，台灣小說家黃春明的作品集出版了日譯本——《莎啞娜拉·再見》<sup>74</sup>。書中的同名的短篇小說〈莎啞娜拉·再見〉非常有趣。故事中描寫一名台灣的年輕公司職員，由於有七個重要的日本顧客來訪，公司的老闆指派這名職員帶他們去泡溫泉，景點就在台灣首府的鄰近縣市。七名日本人想在溫泉勝地找台灣女性狂歡一夜，而他所肩負

74. 黃春明的原作〈さよなら・再見〉發表於一九七三年八月《文季》第一期。福田桂二的日譯，一九七九年被編入黃春明《さよなら・再見 アジアの現代文学——台灣》（田中宏、福田桂二合譯，株式會社めこん〈文遊社〉，一九七九年）一書出版。

黃春明一九三九年出生於宜蘭，經台北師專，後畢業於屏東師專，曾任職於廣告公司，據此經歷寫成〈さよなら・再見〉。

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日籍的中年男子帶去溫泉勝地住上一晚，隔天再把他們帶回台北。無獨有偶，那溫泉鄉竟是主角的故鄉！從孩提時代開始，他就與鎮民們非常熟稔，而這些日本人偏偏要從他青梅竹馬的女伴中選出陪宿的對象，讓他頗為難堪。總之，他痛苦地度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充當口譯員的主角，又帶著七名日本人前往台灣首府。這趟火車的旅程需要幾個小時。在半路上，一個台灣的大學生坐上火車。上車之後，這名大學生迅即發現，車廂內有日本乘客，而且看似來歷不凡，便走了過來。他想跟那幾個日本人交談，請主角居中通譯。這學生表明，自己即將畢業，畢業後打算去日本學習中國文學，希望主角把這席話通譯給那些日本人知道。他大概認為，他即將赴日留學，這番表白應該會得到這幾個日本人的好印象吧。然而，負責口譯的主角卻跟日本企業家說，這名台灣的大學生想問他們是否上過戰場，故意來個移花接木的謔問。幾個中年的企業家聞言後，回答說上過戰場；這時候那大學生又提問些什麼，主角把它譯成：「你們上過哪裡的戰場？」他們回答說是中國；接著，主角又假借大學生之口問道：「你們當兵去中國幹了什麼？」只見這幾個企業家變得面有難色，最後只好稱讚台灣的大學生看起來都很用功，這麼勤奮的學生在日本一定會受到歡迎的云云。但主角假傳其意，反問大學生為什麼要去日本研究中

國文學？這麼一問，卻讓大學生表情為難。一答一問間，火車終於駛至大學生下車的車站。告別的時候，那幾個日本企業家向大學生說了聲「再見」，這是用中國話說「莎喲娜拉」，因為他們去過中國，只學會「再見」這個詞，所以用中國話道別。這篇小說原題為〈再見〉，譯成日語則成了〈莎喲娜拉·再見〉。

正如這篇小說所揭示，儘管並非所有日本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戰爭期間記憶，但至少對現在四十歲以上的日本人們而言，它的確是段苦澀的回憶。這些「人們」，其實也包括我。我們始終有一個強烈的渴望，亦即希望把這段記憶埋在心靈深處，因為我們不想直接與它面對面。關於這個現象，日本的不同世代之間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說，有些成長於戰後的年輕日本人，就會清楚地詰問他們的父執輩，他們在戰爭中到底做了什麼？做父母的面對這種質問，都不願意回答這問題，至少有很多為人父的是如此。但讀者若能瞭解他們是如何記憶戰爭期間的偶發事件，如何將記憶藏在心中、置換成他物，如何解釋，又如何表述此記憶，便能掌握理解日本文化的一條線索。我們就從這個著眼點，來追溯十五年戰爭期間，以重大事件為主的各種軍事行動。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幾名被派至中國東北滿洲的日本參謀軍官，擬定了一個計劃：要在距奉天北方三英里處\*的柳條湖，炸燬當時隸屬日本管理、南滿鐵路的某一段路軌。他們並沒有事先向派遣軍司令官和參謀長報告這個計劃。事實上，炸燬鐵路的是河本末守中尉及其部下的幾名士兵。不過，這個事件卻被日軍報導成中國人所為，把事件的責任扔給了中國人，日本國內的報紙也不斷借用軍方的報導。日本旋即對這次炸燬事件展開復仇作戰。戰爭開始之後，日軍未經宣戰就把這次事件命名為「滿洲事變」。

這個秘密計劃的背後，是當時日本的派遣軍，也就是關東軍的參謀軍官石原莞爾中校曾參與其中。他提出一個戰略理論：日本必須在滿洲建立軍事要塞，並藉此作為之後日本與西歐各國間，可能爆發世界最終戰端預作準備。後來，同樣在關東軍參謀軍官們的策畫下，將廢黜中國宣統皇帝一事也加入計劃中，並於一九三二年，扶植其為「滿洲國」這個新國家的皇帝。雖然「滿洲國」的建立，在國際上招來惡劣的批評，但日本為了守護它，退出了聯合國。這種先發動軍事行動再合併某一領土，使其成為既定事實以強迫承認的作法，還包括了扶植傀儡政權，和退出對此行為大加撻伐的聯合國在內。弔詭的是，此種作法後來卻為義大利和德國的國策提供啟發作用。若從同時代的世界史中加以考察，



「滿州事變」即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曲，也是開啟日本十五年戰爭的肇端<sup>75</sup>。

使用「十五年戰爭」這個稱呼，主要有兩個用意，亦即把日本經歷漫長的戰爭時代劃分為二：日本與中國的對戰，和日本與英、美、荷等國的戰爭。由於戰爭期間我還是個少年，因此，只知道這次戰爭被稱為「滿洲事變」。過了幾年，又爆發了戰爭，大家稱之為「上海事變」。又經過數年，這回別人告訴我發生了另一名為「支那事變」<sup>\*</sup>的戰爭。這些所謂片斷的「事變」，就這樣毫無關聯地灌入我們年少的腦海中。這正是當時日本政府的意圖！如今，我從大人的角度思考，卻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些「事變」都是與歷史的事體有其聯繫的戰爭狀態。接下來在一九四一年，我又得知日本和

\* 瀋陽東北約七·五公里的地方。

# 指溥儀。

75. 西格蒙德·努曼著，曾村保信譯《現代史——未來への道標》上·下冊（岩波書店，一九五六年）。

原文為：Sigmund Neumann,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 The Second Thirty Years' War*, Putnam & Sons, New York, 1946.

※即「中日戰爭」。

英、美開戰的「大東亞戰爭」開始了。對日本人來說，我們在主觀上被教導成知悉歷史上有過幾次零星的爭戰事件，但卻把它們當成不同的戰爭，而非視為是歷史事件。正如我在家永三郎於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太平洋戰爭》（岩波書店）一書序言指出，我們應該把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的戰爭看成是一場連續性的戰爭，並且把這次戰爭視為日本敗於中國的戰爭<sup>76</sup>！

森島守人曾在奉天<sup>\*</sup>總領事館擔任外交官，有關戰爭是如何開始和進展的，他在回憶錄中均有詳述<sup>77</sup>。據說，森島曾就當時日本中央政府外務大臣決定的方針，向關東軍參謀軍官板垣征四郎上校提議，必須和平地解決當前發生的戰鬥狀態。不過，板垣上校予以反駁說，統帥權已對此問題做出決定，難道總領事館有意無視於統帥權嗎？同席中較為年輕的參謀軍官花谷正少校甚至拔出鞘威嚇說，誰要是敢干涉統帥權，他絕不輕饒！板垣上校、花谷少校，以及上述提及的石原中校，都是密謀炸燬南滿鐵路路軌，然後嫁禍給中國人的秘謀計畫成員，他們事前不但沒有向日本的陸軍參謀總長報告，甚至背著當地的派遣軍司令官和參謀長。

這項作戰行動是由遠離東京的陸軍參謀總部，也就是由關東軍內部少數幾名參謀

軍官暗中擬定的。他們在計劃實現之後，以此做為既定事實，強迫東京的陸軍參總謀長予以承認，進而強迫當時的日軍大元帥——天皇，接受這個已然展開的戰局。他們將此次沒有事前知會天皇和東京參謀總部的行動稱為「統帥權」，而統帥權決定的行動，包括日本首相及文官在內的內閣閣員都必須接受，這是當時軍人的思考邏輯。在一九三一年的日本政治中，這種觀念獲得勝利，也終於把日本趕進世界的舞台上，步入與軍力遠勝於日本的各國展開對決的境地，而其背後的原動力，正來自於殖民地派遣軍內部的一群年輕參謀軍官。在最初階段中，這群集團還包括石原莞爾；他雖然行事專斷，但頗有先見之明。一九三六年，石原加入遭到壓制的年輕軍官陣營，接著，又在一九三七年之

76. 家永三郎《太平洋戰爭》（岩波書店，一九六八年）。

鶴見俊輔的〈知識人の戦争責任〉（《中央公論》一九五六年一月号），論及「十五年戰爭」一詞的提議；〈日本知識人のアメリカ像〉（《中央公論》一九五六年七月号）一文中，談及為何要使用這個詞彙。

\* 即瀋陽。

77. 森島守人《陰謀・暗殺・軍刀——外交官の回想》（岩波新書，一九五〇年）。

後，明顯轉向有意停止攻打中國的陣營，因而被逐出陸軍權力核心。日本與英、美打得方興未艾之際，石原被編入預備部隊。戰爭就在摒除這位最初全盤策劃者的情況下，由一群精於操控陸軍職業軍人集體慾望的成員，在東拼西湊的計劃下持續進行。雖然明治憲法上保障的統帥權給予這些軍人此種自由，但統帥權必須通過天皇和陸軍參謀總長的指令才能實行，而他們的秘密計劃在初期階段便沒有受到統帥權應有的控制。由於這種企劃在初期階段可以使工作進展快速，因此看似非常具有效率。然而，一到戰爭的後續階段，整體計劃必然會出現政治和軍事缺乏統合的弊端，尤其當日軍轉攻為守時，這種破綻更是顯而易見。日俄戰爭以前，日本的陸軍就以普魯士陸軍為楷模，之後更是崇拜德國陸軍的作為。納粹德意志在歐洲興起之後，日本陸軍的領導者們便強烈希望日本能與德國結合。從軍事上來看，可以說是某種根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史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 1895-1970)曾指出，日本只有和德國結成軍事同盟才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七〇年)一書中提到，波蘭和法國敗給德國之後，唯有英國的軍力足以對抗德國，因為這時候美國和蘇俄尚未加入戰圈。希特勒倘若在這時候對英國展開決定性登陸作

戰的話，或者即使不採取登陸作戰，決心另尋其他決定性攻擊策略的話，照樣可以征服英國。

如果希特勒傾其全力擊垮英國，英國的沒落幾乎是可以確定了。換句話說，就算希特勒失去攻打英國的最好時機，他照樣可以擬定確實有效的方法，藉由空軍和潛水艇的強大威勢，穩住自己的腳步，逼使英國力感不支及其最終的瓦解。

然而，希特勒認為，俄軍始終守在德國東方的邊境上虎視眈眈，極可能有從陸路攻打德國的危險。他深刻覺得，為了顧及海陸雙方出擊的策略，不能冒險集中所有的軍力。因此，他得出一種戰略：為維護德國後方的安全，擊潰俄國是唯一的生路。他之所以對俄國的意圖如此疑懼萬分，乃是因為長期對俄式共產主義的厭惡，已成為他內心的痼疾。

李德·哈特也指出，潛藏在希特勒深層心理的不安情感促使他轉而對付俄國，但此舉對德國而言卻是致命傷。李德·哈特在此所述的希特勒心理因素仍有待商榷，但從軍

事史的事實來看，希特勒把軍力投入俄國邊境的作戰之後，才深刻瞭解到此舉導致了補給線過長的戰略弊端。所以，日本是否能取得勝利，端看希特勒在法國投降之後，全力攻擊英國這件事上了。

李德·哈特提到，日本參與這次戰爭，對希特勒並沒有幫助，因為日本加入戰圈，反而把美國的力量拉入這場戰爭中。日本海軍剛好與陸軍形成鮮明對比，是以英國為楷模而建立的。關於與德國和義大利結成軍事同盟一事，日本海軍始終與陸軍針鋒相對。一九三八年，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在主要閣員的會議中清楚指出，即便集結日本、德國和義大利三國的海軍軍力，也敵不過英、美、法以及蘇俄海軍戰備的總和；他又說，日本海軍原本就不是為與英美兩國作戰而建立的，而德國海軍和義大利海軍不足為懼。這種毫不客氣的見解，乃基於他對現況世界局勢的具體掌握。

確切地說，日本海軍在一九四一年向英美兩國宣戰時，也未喪失這種務實的態度。因為當時聯合艦隊的總司令山本五十六也已看出勢態，亦即日本雖然在戰爭初期可以取得耀眼的成果，但此優勢恐難持續。

然而，日本陸軍依仗日本精神和國體絕對優秀的自我暗示，打敗了日本海軍基於務實態度的自我認識。最後，日本和德國、義大利締結了軍事同盟。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召開指導戰爭的「御前會議」\*決定對英、美宣戰。在會議中，天皇問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元上將：「一旦與美國開戰，陸軍要耗費多少時間才能結束戰局？」杉山回答說，南太平洋的戰事大概三個月內即可結束。但天皇反駁說，日支事變<sup>7</sup>爆發之際，時任陸軍大臣的你表示，戰爭大概在一個月內即可結束，但迄今已過四年，為什麼戰事尚未結束？杉山則回答：「因為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天皇又問：「倘若中國是個大國，太平洋豈不是更大？你是基於什麼理由判斷戰爭可以在三個月內結束？」接著，天皇再問：「領導高層是否把重點擺在外交？」這時候，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上將幫杉山回答：「正是如此。」然而，儘管外交自始就受到重視，但有關開戰或和平的決定，這時候已定下日程，而且也決定積極準備軍力，以供開戰時刻

\*意指在天皇前召開的最高會議。

# 一般指一九三七年的蘆溝橋事變。

之需。這些事實已大大傾向天皇擔憂的方向，也就是開戰。有關上述經緯，可參閱池重高編《日本對戰爭的決斷》<sup>36</sup>（《日本の爭決斷》），書中有詳細記載。

假定這時候和美國的談判沒有成功，宣戰的日期就定於十月初旬。到底是基於什麼理由把日期定於十月初旬呢？因為日軍每天都在進行激烈的軍事訓練，而且石油的存量消耗快速，光是一個小時，海軍的耗油量就達四百噸。因此，結論就是：若要發動戰爭，現在正是最好時機。

另一個重大的理由是來自於美國方面的立場。美國政府明白表示，日本從中國撤退和與德國、義大利斷絕結盟，是恢復美日關係的前提條件。石油存量和美國的要求，才是把日本趕向不可能戰勝的賭注的兩項因素。在天然資源和工業基礎上，日本遠遜於中國、美國和英國。日本可以憑恃的只有日本精神和對國體的信念，這是明治維新以來，歷時七十年，由日本政府在國民中培育起來的。從軍事的觀點來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德國已經跟俄國開戰，日本開戰伊始就勝利無望的評斷自是恰當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日本海軍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島海戰中，儘管數量上優於美國海軍，但仍吃下第一場敗仗。山本五十六上將麾下兩百艘軍艦，尼米茲上將（Chester



(William Nimitz) 則以七十六艘艦船迎戰。戰鬥結束時，日本損失航空母艦四艘、巡洋艦一艘和飛機三百三十架；美國則折損航空母艦一艘和飛機一百五十架。山本五十六上將開戰時承諾的驚人戰果，在這階段便告幻滅；接著，要守住開戰初期佔得的若干前進基地，更是愈加困難。瓜達爾卡納爾島的防衛注定要失敗的。日軍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撤出瓜達爾卡納爾島，卻使用「轉進」這個字眼，模糊國民對日軍撤守的窘境。從那之後，作為前進基地的島嶼逐一淪陷，只有阿留申群島中的紀斯卡島例外。日軍在此的撤守作戰成功地瞞過美軍的攻擊部隊，美軍經過三天的猛烈轟炸和登陸作戰後，才發現日軍已經完全撤走。日軍方面並沒有全力支援孤立的部隊，也沒有把被美軍奪走的眾多島嶼重

78. 根據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召開的御前會議發言指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為止，陸軍、海軍與民間的石油總存量為一百一十一萬公秉。按第一案，戰爭的第一年尚可剩餘十八萬公秉，第二年很快就會缺油四十四萬公秉，第三年（假定已奪得蘭印石油產地）將不足兩萬八千公秉。若按第二案，戰爭第一年尚能剩餘二十八萬公秉，第二年將不足二十四萬公秉，第三年不足兩萬八千公秉。總之，最後做出坐守不如出擊的結論。五味川純平《御前會議》（文藝春秋，一九七八年，頁一二三六—一二三七）。參謀總部編《杉山メモ》（原書房，一九六九年）。英文著作有：Nobutaka Ike, *Japan's*

*Decision for War, Records of the 1941 Policy Confer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新搶回來。因此，在這些島嶼上的日本士兵，分別陷入封閉的狀態中；而正如陸軍的戰場訓示，他們堅守「生不受虜囚之辱」的信念，因而走向玉碎\*之路。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美軍的登陸部隊攻陷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島內的阿茲島時，二千五百名的守備隊士兵中，只有二十九人被俘。在阿茲島之後，南太平洋的馬金島、達拉瓦島和吉爾巴特群島，加上中太平洋馬利亞那群島中的塞班島，以及非常接近日本的硫磺島等，紛紛展現出「玉碎」的風範。最後，距離日本本土最近的沖繩，也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淪陷了。

這些激昂的模範警示了住在日本本島的日本人，美軍登陸時自己應該做什麼。因為當時的政府強調，凡是天皇陛下的忠良臣民應有為維護國體，不惜玉碎的決心。如此一來，即使所有日本人，包括天皇在內皆全數滅亡，形式仍會留存下來。維護國體此思想本身，即有這層哲學含義。根據支配日本長達十五年的陸軍解釋，敕語的哲學必然帶來這種邏輯歸結，但在當時的日本，只有極少數人敢質疑這種推理邏輯。至少在現實上，包括社會科學家和各宗派的宗教家都不敢出聲批判這觀念。一九四一年決定走這條路線時，難道當時的領導者不應負起事先提醒日本國民，將被政府帶向玉碎之路的政治責任嗎？

海軍軍官由於操作機械的需要，無形中在職業上形成技術者的思維方式，也由於他們平時航海繞行世界的時候，有機會與世界各國的海軍軍官交流，因而保有一種從國際視野看待事件的習慣。因此，海軍在擬定作戰計劃上較具合理性，絕不擬定「參與者不得生還的作戰計劃」這種不成文的規定，至少理論上如此。太平洋戰爭初期，即使是在珍珠港攻擊美國船艦的雙人座特別潛艇，也允許他們在魚雷攻擊結束後，返回出發的航空母艦。儘管海軍並不熱衷近乎自殺式的戰爭，但最終也被捲入崇拜「玉碎思想」的集體狂潮中。擔任第一航空艦隊司令長官的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下令組織「神風特攻隊」。事實上，這項自殺攻擊的訓練，在一九四四年初即已開始進行，使用的都是為此目的而設計建造的飛機。最後，構想終於實現。大西瀧治郎中將對當初下達這項命令自覺責任重大，便於日本投降之後，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盡。

參加神風特攻隊的成員，都是從有意投入這項為特別目的而戰的志願者中選出來的。不過，戰爭發展到這個階段，不管是加入海軍或陸軍的青年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受到這股風潮的感染，紛紛志願參與這項任務。日本的報紙在報導神風特攻隊時，還刊登

\*指自殺。

他們出發前的英姿照片；並藉由重印他們所寫的信件、遺書和辭世詩句，讚揚他們是多麼勇敢的青年等等；新聞影片中，也拍出這些青年出發時英氣煥發的立姿。戰爭結束之後，比特攻成員更年輕的日本人，已經用新穎的角度描寫神風特攻隊。小田實（1932-2007）是屬於較年輕一代的小說家，戰爭當時，大阪遭到空襲，他正置身在不知逃往何方的幾萬名災民之中。少年時代的逃難經驗告訴他，亦即要從被趕出家門、前途茫然的群眾立場看待這場戰爭。神風特攻隊的隊員大概也有與他少年時代經歷過的類似經驗吧。也只有以此方式思考，小田實才得以在自己的心中捕捉作為英雄的特攻隊員，駕駛離離機場後的形象。對習慣以戰爭時期培養的傳統觀念看待戰爭的年長世代而言，想像特攻隊員架機起飛後的殉死心情，也未免太過殘酷，所以後來就不予揣度了。一九六五年，小田實寫了一篇題為〈思考死難的意義〉\*的隨筆，便透過各種角度揣想特攻隊員的心境，表現出戰後世代的觀點：試圖把被塞進英雄傳說中的神風特攻隊員，再次從傳說中拯救出來。這種思想給予當時推動社會運動的新世代極大幫助。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透過嚴密的組織，而是採取較鬆散的連結方式，亦即透過在都市遭到空襲時被迫逃出家門的群眾們，來抗議日本政府當時與正在進行越戰的美國政府合作。

渡邊清（1925-1981）十七歲時，志願加入海軍當水兵，他服役的船艦「武藏號」在當時是最大的軍艦，但卻被擊沉。受創之際，他的一個同伴水兵抱住船桅，哭喊著母親的名字。不過，這名同伴的死，與日本士兵臨死前高喊「天皇陛下萬歲」的傳說相去甚遠。

他在戰後出版的紀實小說《戰艦武藏的末日》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描寫。雖然他長期擔任「海神會」事務局長，全力支持此會，但他與任何政黨都沒有關係，也不受黨派左右，專心投入保存戰爭記憶的工作，從蒐集戰歿學生留下的書簡，使其結集問世的活動開始。這些書簡最後集結成書，題為《聽吧，海神的聲音！》<sup>79</sup>。

\*原文題為《難死の思想》。日語的「難死」，意謂罹難致死，因此譯成《思考死難的意義》，比較貼近原意。

79. 日本戰歿學生紀念會編《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初版由東大協同組合出版部出版，一九四九年發行。光文社於一九五九年出版新版。其後，岩波文庫，一九八二年，新版一九九五年）。

渡邊清（1925-1981）是農家出身的少年兵，並非學生兵，但他卻擔任以舊學生兵為主的「海神會」的事務局長，長期支持這個團體。他的作品有兩部紀實小說：《海の城——海軍少年兵の手記》（朝日新聞社，一九六九年）和《戰艦武藏の最期》（朝日新聞社，一九七一年），以及紀實報導《砕かれた神——ある復員兵の手記》（評論社，一九七七年）、評論《私の天皇観》（辺境社，一九八一年）。

林尹夫（1925-1945）是神風特攻隊隊員之一。據說，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天，仍偷偷地閱讀託哥哥取得的列寧《國家與革命》一書。他在軍隊的廁所閱讀該書，每讀完一頁，便把它撕碎吞下。他從中得到一個結論：自己將為毫無意義的目的而死；他體悟到，日本進行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日本終將被美英蘇中四國聯合的強大軍力打敗。他把這個想法寫在自己的筆記上，又悄悄地寄給哥哥。他雖然能夠構想自己死後的社會形態，但卻找不到自己如何在未來社會效力的出路。戰爭結束之後，他的哥哥把他遺留下的書簡和筆記，編輯成冊出版，題為《命捨月明時》<sup>80</sup>。

海軍少尉吉田滿（1923-1979）所乘的「大和」艦，是當時與「武藏」艦並列世界最大的戰艦。不久，「大和」被編入攻擊美國海軍的特攻任務，不攜帶回程的燃料，直接從日本本土出航進擊。戰艦在離開日本港岸，航向最後之航時，軍官房間裡隨即展開熱烈的討論。往昔箝制軍官們言論自由的肅殺氣氛，終於解除。他們都在思考，自己到底是為何而死？一名職業軍人——砲兵軍官白淵上尉在激烈的辯論中說道，從戰略上來說，我們這次出擊毫無意義可言，也不能給敵人任何打擊；我們的目的就是證實此一行動的徒勞，我們將為此而死。這些話都被吉田滿紀錄下來。吉田滿是少數落海後被救起的生還者，他在

《大和戰艦的末日》這部史詩般的紀實文學中，寫下白淵上尉的看法。這本紀實性的長篇著作，是在日本投降之後，由參戰的海軍軍人之筆寫成，絲毫沒有對美軍佔領日本時期，箝制言論思想的作法有任何妥協。因此，佔領軍的檢閱單位禁止這部著作據實出版。直到佔領時代結束的一九五二年，這部作品才以完整紀錄當時史實的形式，出現在眾多日本人的眼前<sup>81</sup>，作品的率直文體洋溢著年輕士兵的勇敢，日後便成為日本文學中留存的名著之一。這部作品的卓絕之處在於，沒有蒙上戰後性格的痕跡。由戰爭時期軍人文體所寫成的作品，反而可以超越戰爭時代的精神，給予不同世代的讀者們強烈的震撼。而這正證明，無論在任何時代或任何社會，文學作品都是最普遍的試金石。

吉田滿後來高升至銀行的監事，於一九七九年九月病逝。他在去世的前兩年，曾在某次公開場合說：所有為戰爭展開某種行動的人，都應該忠實記錄自己扮演的角色，把

80. 林尹夫《わがいのち月明に燃ゆ》（筑摩書房，一九六七年）。

81. 吉田滿（1923-1979）就讀東大法學部時，以學生兵的身分加入海軍。他擔任海軍少尉坐上大和艦，出任一九四五年四月的沖繩戰役，大和艦遭到擊沉。後來，在其擔任日本銀行監事任內病逝。他的著作包括戰後所寫的，有《戰艦大和ノ最期》、《鎮魂戰艦大和》（講談社，一九七四年）、《提督伊藤整一の生涯》（文藝春秋，一九七七年）、《戰中派の死生觀》（文藝春秋，一九八〇年）等。

它當成遺產留給後代子孫！這席話是他在一九七〇年代日本經濟高度發展時期，擔任日本的銀行監事之職時所言。

許多參與特攻行動的青年，都認同自己的行為價值。在這些人之中，我引述的林尹夫和吉田滿，在戰爭末期封閉窒悶的氛圍中，早已展開獨立的思考。他們無力從封閉的狀態中掙脫出來，自然更沒有氣力擊垮封閉的國家。可是，他們孤獨的聲音傳至今天，他們就像落地而死的麥子般，雖然一粒麥子死了，還會長出更多的麥子。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沖繩淪陷了。有十萬名的沖繩平民罹難，九萬名日本軍人戰死。其後，日軍相繼在緬印邊界和菲律賓竄吃下敗仗。八月六日，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八月九日，蘇俄向日本宣戰，攻擊位於中國東北方的日軍。同一天，美軍又在長崎投下一顆不同性能的原子弹。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



## 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諾曼·隆梅特在他的著作：《當時我們是如何生活的？——二次大戰中的日常生活史》（一九七一年），曾詳細紀錄二次大戰期間英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實態。如李德·哈特指出，英國當時已被迫至幾近潰敗的局面。日本和英國都屬於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而且又沒有支撐龐大人口所需的豐富糧食生產力，因此也跟英國一樣，深為日常生活的糧食短缺所苦。但是英國和日本，在戰爭時期呈現的日常生活樣貌卻有些不同。

其中，最明顯的不同在於配給制度合理性的差異。隆梅特雖然對英國黑市充斥的情形大加指責，不過，他也同意某個農夫所說的，傳言的確比事實誇大得多。英國的糧食部在抑制糧食價格方面的成效非常顯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糧食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但二次世界大戰在時間跨度上幾乎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長兩倍，糧食價格卻只上漲百分之二十，即使沒有得到政府的補助，增加率也不過百分之五十而已。

在與糧食相關的所有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六年的戰爭結束時，英國人——至少倖存的英國人——都比開戰之初要健康得多。據說，一九三九年英國的一般婦女，還弄不懂蛋白質和卡路里有何不同。可是當戰爭結束時，糧食部長卻收到來自家庭主婦的抗議信函，內容堅實，令他既感為難又覺心喜；她們抗議住家附近的食品店沒有備齊家人所需食品，來補充體力免於生病。

日本配給主食白米的制度始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後來還擴及調味品在內的其他輔佐食品。根據一九四一年的厚生省\*公告，倘若一名參與一般工作的年輕男子，一天需要兩千四百卡路里的話，政府已確保供應相應分量的食物。一九四二年以後，這個基準降到每天兩千卡路里，到了一九四五年，更降至一千七百九十三卡路里。這種情形自然導致一種結果：國民的健康已遭到破壞。一九三〇年以前，因結核病死亡的人數，每年有十四萬人，這個數字可說相當高。但到了一九四二年，已攀升至十六萬人，一九四三年更超過十七萬人。一九四四年以後，政府不再對外發表統計數字。

表面上，配給制度的實施看似沒有破綻。不過，配給制度自始就有黑市組織在背後補助。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始終是個農業國家；因此，即使在明治時代以後，都市

的住民與鄉間的親朋好友仍有往來。於是，都市的住民便透過親朋好友或者鄰近的居民，以物易物的方式（這是比貨幣至上的市場更早的經濟形式），來換取他們所需的白米和蔬菜，為每個家庭打開秘密的生活通道。如此一來，在這種時代的都市住民們，便幾乎得時常下鄉去，循著複雜的人際關係，拜訪他們新認識的「朋友」，用自己的舊衣及貴重物品，換取生活所需的食物。換句話說，都市的住民若沒辦法找到這種黑市交易的管道，可能因為斷糧而危及生存。

除了建立於私誼以及互助習慣的黑市交易之外，另外還存在一種黑市交易。這種黑市交易，是由熟悉經濟脈動的投機者，藉由囤積生活必需品，抬高價格以牟利而衍生出來的。這種貨幣至上的黑市交易使得東京的米價節節上漲，根據在戰爭時期每天寫日記的小說家永井荷風指出，一九四三年間，白米的黑市價格一升是四日圓，到第二年，由原來的十日圓漲到十五日圓。短暫的一年間，白米的價格就從百分之兩百五漲到百分之四百。<sup>82</sup>

\*類似台灣的內政部。

<sup>82</sup>Norman Longmate, *How We Lived Then: A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Arrow Books, 1971.

永井荷風（1879-1959）的日記《斷腸亭日乘》全七卷（岩波書店，一九八〇—八一年）。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主婦必須掌握各種資訊，根據這些資訊作出正確的判斷，同時還得經常觀察社會情勢的變化。

為了維繫家族成員的命脈，主婦們不得不掏出自己僅有的一點東西，同時下鄉去建立新的人際關係。而為了往訪這些新的人脈，又必須想辦法搭乘當時極其難尋的交通工具，而且為了獲得政府配給的衣服和食物<sup>\*</sup>，必須長時間站立；為了日後能獲得鄰居的幫忙，必須出席鄰組<sup>3</sup>的常會；或是在自家庭院挖掘防空洞躲避空襲；或者參加嚴防敵機空中來襲的防空演習。不過，最後這項防空演習，只是練習徒手接傳裝水的水桶，或用掃帚滅火而已。但到戰爭末期，敵機正式轟炸時，這些練習絲毫派不上用場。

家庭主婦為什麼必須如此十項全能，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大部分的男人和年輕人，甚至包括中年人在內，只要肢體能動者，不是被徵召入伍，便是被徵調到軍需工廠工作。一九四四年二月，被徵召入伍的人數已達四百萬人，佔當時男性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投入軍務的人數高達七百一十九萬人，已佔包括兒童、老人、病患和殘障者在內男性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戰爭時期的都市主婦們，在缺乏男丁的狀況下，不得不張羅一切的家務，但這也使

得明治時代以前，農民、漁民和商人之妻的傳統得到復活。明治時代之前，武士等只佔全人口的極少部分。因此，非武士階層的妻子與武士階層的妻子形成鮮明的對比，在行動上有較大的自由。而戰時的都市主婦們不但要肩負起生活的重擔，而且還要具有看顧所有家事的自信，並迎接戰爭的結束。反觀從男性至上立場發號施令的日本帝國政府卻舉旗投降，使得男人們失去了自信，而女人們卻仍舊繼續日常的工作，以維繫自己、小孩和其他家人（包括丈夫在內）的性命。這件事，給予這些女性在近代日本從未有過的權威。茨木典子（1926-2006）寫過一首題為〈我最美麗的時候〉（わたしが一番きれいだったとき）的新詩——日本戰敗的時候，她才十九歲——表現出戰後不久許多女性共有的高昂且充滿自信的氣息<sup>83</sup>。

\*當時黑市價格高漲，民眾實在買不起。

#日本於一九四〇年規定的。二戰時因所謂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體制而設立的基礎組織。約十戶為一單位，受地方政府、町內會等控制。政府通知、物資配給、義務勞動及防空演習等都透過該組織實施。

83.《茨木のり子詩集》（思潮社，一九六九年）。

女性絲毫不必負起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她們既不是陸軍或海軍的領導者，也不熟悉把戰爭合理化的政治語言，而且在戰爭期間也不享有投票權。不僅如此，為了能夠確保生存所需糧食，她們不得不犯法。倘若她們如實地遵守法律條文，恐怕所有的家人都不得餓死，至少在都市裡的情況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是女性而已，大多數的日本人在戰爭期間都以某種方式觸犯過法律。女性從黑市市場得到某些訊息，透過共同的私下交易相互幫助，避免與現存的國家秩序正面衝突，但仍遵從超越公認秩序的道德與習慣；她們不講誇大的政治口號，卻充分運用戰時不為國家機器納入，或可說是因此湧出的實際思想。這種思想不僅與日本政府的投降無關，甚至正因為如此，而成為她們繼續活下去的助力。

多虧佔領軍的幫助，女性在日本歷史上首次獲得了選舉權。不過，女性把自己的代表送進議會，相對此狀況來說是較少有的事件。戰後首次大選的結果，選出的四百六十六名議員之中，女性議員只佔三十九名。由於戰爭期間女性廣泛享有的生活思想並未與任何政黨派的思想合流，因此，在日本戰敗後不久，儘管女性的政治活動看似非常活躍，但隨著生活的日漸安定，而逐漸平緩下來了。等到戰後的混亂漸趨平靜，

她們對推選女性代表進入議會的關心便大大降低了。

除了糧食配給計劃之外，戰時日本和英國的日常生活中卻有另一個差異，那就是「鄰組」組織。這種組織與其說是出於政府建言，倒不如說受到政府的命令成立的。在日本與中國開戰的最初階段，中央政府的官員即已看出，不久後資源將更加匱乏，配給制度的實施勢所難免。但問題是，日本從未實施過類似的配給制度，絕不能貿然推行，所以必須先設立教育機構，藉此向市民宣導配給制度的內涵。例如領取日常生活用品時必須排隊，或盡量訂定實際的計劃，用所得有限的糧食和衣物維持生計等等。為此，東京市政府的區政課長谷川昇提出恢復德川時代鄰居交誼的組織，取其新名為「鄰組」的方案。東京市長接受這個提案，刊載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的東京市政府公告上。

從日本的精神史來說，那時候的谷川課長，不僅從德川時代的「五人組」制度<sup>\*</sup>，也從幕末的二宮尊德（1787-1856）所構思的鄰居互助的組織得到啟發。儘管這個自發性的互助層面，有來自谷川課長的構想，但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的鄰組制度史中，並未

\*以五人為一小組，江戶時代的一種連帶組織。

獲得體現。之所以只說到一九四七年，是因為這個制度直到此時才由佔領時期的政府下令廢除。「鄰組」向來都是作為傳達政府既定政策至民眾生活的工具，它扮演的不是像毛細管般，把民眾意見和生活情感傳至中央政府高官的角色。倘若它能扮演這種任務，鄰組勢必成為一種文化革命。「大政翼贊會」成立之初，由包括激進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在內的近衛文麿智囊團構想出這個組織時，其實就含有這種目的。進言之，當時的民眾也看出這種目的。因此，大政翼贊運動在一九四〇年展開的初期階段，才受到廣大群眾自發性的支持。但是這個組織迅即被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和陸軍軍人奪取，淪為他們監督和干涉細至市民生活的機構。加上結合此傾向，當初東京市政府一個課長的一時之見，才會如此迅速變成由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指揮的眾多擾民法令之一。

正如守田志郎在《日本的村落》（《日本の村》）中所述，日本的村落有一種傳統：它不會因為思想或宗教的理由，對同聚落的村民進行肉體的抹殺。不過，這個習俗並不適用於村外者。這個事例可從尾崎秀實一案得知。尾崎秀實被公開指稱與蘇聯間諜佐爾格的關係之後，他的家族親戚在戰爭時期便受到同為日本人的鄙視。當流言指稱他是叛國之徒時，對此人連精神和肉體都要加以消滅的動作，旋即在一「鄰組」一帶集結起來。這種



情形有點像出現在歐洲史和美國史中的「獵捕女巫」，就最近的事例而言，又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麥卡錫掃除共黨分子的旋風。而這個「麥卡錫旋風」，也逼使準備赴埃及履新的加拿大大使，同時也使近代最優秀的歷史學家——E·H·諾曼走上自殺之路。有關這件事，容後再敘。

類似這種不屈服於戰時「獵女巫」旋風，仍堅持自己信念的女性，首推九津見房子（1890-1980）<sup>84</sup>。在日本人的轉向史中，久津見房子稱得上是個奇葩，她在轉向之後，仍繼續參與批判政府的反戰活動，而接連受到嚴懲。這既不是由衷不想抵抗軍國主義，也不是故作姿態的偽裝轉向。

九津見房子出生於日本中國地方\*的岡山縣。她最初和獨立派的宗教人士高田集藏結婚，生下兩個孩子。一九二一年與丈夫離婚之後，和同伴創立了社會主義女性團體的「赤瀾會」。同年，她跟當時投身共產黨最有力的組織者——三田村四郎結婚，參與印刷工廠的勞工運動。一九二八年被捕，一九三三年再度入獄。她在一九三三年的集體轉

84. 牧瀨菊枝編《久津見房子的曆——明治社會主義からソルゲ事件へ》（思想の科学社，一九七五年）。

\*指岡山、廣島、山口、島根、鳥取等五縣。

向之後，脫離共產黨的運動，另外展開運動，營救尚被羈押在獄中的社會主義者。在這些入獄者中，有佐野學、鍋山貞親，以及她的丈夫三田村四郎。由於九津見房子本身沒有什麼學歷，所以就沒能親自建構證明其轉向的理論。在戰時日本轉向的激進主義者之中，九津見房子是罕見的人物之一。因為她雖然在書面上向日本當局聲明轉向，在行動上卻不轉向。因此，她既不屬於當時蔚為風潮、從共產國際的狂熱信徒轉移到信奉超國家主義的立場，也沒有從一個極端擺盪到另一個極端的傾向。因為她是過去日本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同時也是在獄服刑，著名的三田村四郎之妻。儘管如此，她仍成了尾崎秀實和佐爾格的同志，積極防阻蘇俄和日本發生軍事衝突。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津見房子再度被捕，被判八年的有期徒刑。一九四五年十月，因麥克阿瑟司令部的指令，才獲釋出獄。

戰後重建的日本共產黨，鼓勵九津見房子出來參選戰後的第一次大選。不過，這個提議被她拒絕；她寧願做為三田村四郎的妻子度過一生。三田村四郎曾以反共產黨罷工的領導者而聲名遠播。事實上，九津見房子在政治理念上與丈夫並不相同。一九六〇年，她以一介無名的合作者，而非領導者的身分參加市民運動，抗議再度崛起的戰時領導者岸信介

總理政府締結的軍事協定。一九六四年，三田村四郎去世之前，她一直跟他共同生活。我們從九津見房子的生涯看到：在日本人的轉向史中，她是一個難得而又獨立的女性，日本男性知識分子身上罕見的靈活性（不論是否為激進主義者），她也具備了。

戰爭期間對叛國賊的責難，大至日本全體國民，小至鄰組單位。這些細小單位發揮著與過去村落傳統不同的作用。過去的村落對各種傾向的住民都予以保護，但是鄰組只要從自己的周遭嗅出異國的氣息，便對這種具有外國形態的人士施加壓力，直要對方變成認同國家體制的真正愛國者。因此，許多人被捕、被拘留、受審判，或以微不足道的理由遭到迫害。在戰爭時期特務警察製造出來的犯罪中，最顯著的是一九四四年的「橫濱事件」。為此，朝日新聞社、時事通訊社、日本評論社、岩波書店、東洋經濟新報社、中央公論社和改造社等著名言論機構的員工，紛紛被逮捕入獄。其中，《中央公論》和《改造》在軍國主義時代之前的大正時代，即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旗手，但這兩家雜誌社，因為這次事件的擴大渲染，最後不得不宣布解散。一九四四年一月，這兩家雜誌社有幾名員工遭到警察逮捕；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情報局又命令這兩家雜誌社「自行」解散，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底終於解散。

橫濱事件第一次的逮捕行動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川田壽（1905-1978）和他的妻子定子（1909-1999）成為首批犧牲者。他們兩人遭到逮捕，是由一個搭乘俘虜船的返國者證實的。這艘俘虜船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從美國抵達日本，船上約有一千五百人。警察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對長期旅居美國、剛返抵國門的日本人進行逮捕。他們把這種隨機逮捕的方式當成一種實驗，認為可能揪出自美潛入日本的間諜！尤其，赴美國之前曾在日本參與左翼活動、留有案底的人士，更成了他們必須特別調查的對象。其中，有個落入此網的無辜者，大概想逃避漫長的拷問，於是向警方說，有個比自己更重要，姓氏川田的人物已經返國云云。

川田壽在基督教教友派（Ours）父母的培育下，進入慶應義塾大學就讀。在學生時代，他曾參加為日本共產黨募款的活動，而數度被捕。後來，他前往美國留學，一邊打工一邊讀書。羅斯福總統主持新政的時代，他曾以勞工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四處活動，但並非像逮捕他的特務警察所說：他是美國的共產黨員。一九四一年一月，亦即日美交戰的前十個月左右，他偕同妻子回到日本，在世界經濟調查會擔任資料室主任。川田夫妻遭到逮捕之後，在獄中頗受拷問，連他們的一些朋友也被捕刑問。但即使警察拷問，

依然找不出川田夫婦回國後從事左翼活動的任何證據，終於在拘留三年之後不得不釋放他們夫婦。但是釋放前仍有形式上的審判，川田壽被判三年徒刑，緩刑四年；川田定子被判一年徒刑，緩刑三年。起訴書上既沒有記載川田壽企圖重建日本共產黨一類當初警方所認定的罪行，更沒有所謂從事間諜活動的情事。其中，記載的唯一罪名是他在美國期間從事左翼活動，而這竟也違反日本的治安維持法。

僅因認識川田壽即遭逮捕的朋友中，包括高橋善雄，又以認識高橋善雄為由被捕的，則有當時擔任滿鐵東京分公司調查室主任的平館利雄，以及在同單位任職的西澤富夫。特務警察從他們的隨身物品中找到一張攝於富山縣泊鎮\*的照片。因為照片中，有細川嘉六這號人物。這位細川正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改造》八月號與九月號上，發表論文〈世界史的動向與日本〉（〈世界史的動向と日本〉）的人。細川嘉六（1888-1967）生長於富山縣的泊鎮，他因為要返鄉處理父母的喪事，所以藉此機會邀請朋友到他的故鄉一遊。那時候，東洋經濟新報社剛好出版他的《殖民主》（《植民主》），他獲得一萬六千日圓的版

\*現今稱為朝日町。

稅，這對出生在日本海邊且並不富裕的漁夫之子細川而言，算是一筆巨款，所以他打算撥出部份版稅和幾名好友共享。因為當時，要吃到新鮮的魚是非常困難的。但這次與政治毫無關聯的朋友聚會，只因留下一張照片，卻成為特務警察捏造的根據，進而被扭曲成一場企圖重建日本共產黨的會議！

其實，當初在泊鎮召開的「會議」並非如警方指稱的圖謀不軌，現在已無須置疑。因為戰敗後，細川選上共產黨的議員，西澤富夫也成了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即使在這時期，他們也沒有用戰爭時期重建黨的英勇事跡，來掩飾自己的過去。

戰爭時期最大的捏造事件，始於警察無意間從被捕者的隨身物品中發現一張照片。特務警察用這張照片製造幻想，並為了讓這個幻想有其根據，他們把這次聚會命名為「泊溫泉會議」，來呼應當初日本共產黨創立時召開的著名「五色溫泉會議」。事實上，細川嘉六招待朋友投宿之處是泊鎮上的「紋佐旅館」，館內無溫泉。就因為這場憑空虛構的「泊溫泉會議」，使得六十二位編輯和作家被捕，其中四個人死在獄中。

戰爭結束之後，川田夫婦以及橫濱事件其他的受害者們，一起控告了特務警察的惡行。在這起控訴中，詳細記載了他們被刑訊的情形。比如，用來刑訊的工具種類繁多，

有竹刀、竹板、五尺長的棍棒、鞭打用的繩索、用來刺人的傘尖、火筷子、專用踢踹人體的鞋子和鞋底等。警察還讓川田定子的下半身裸露，拿起警棒戳刺私處。記述這些刑訊之後，川田夫婦還說，不僅他們遭到刑求，因同一嫌疑被捕的大河內夫婦也受到慘無人道的凌虐。

這些指控就是中村智子在《橫濱事件的受害者》一書中補寫的部分<sup>85</sup>。幾年前，我曾在連載中讀過中村智子對此事的披露，但當時並未提到這部分。現在，這補寫的部分和我個人的記憶結合在一起。根據這本筆記指出，川田夫婦似乎完全不認識大河內，但大河內夫婦卻是我的朋友。一九四二年三月，我被美國聯邦警察逮捕，起先遭到拘押，後來被扣留。我在拘留所認識的一名日本人告訴我，就他已知的旅美日本人之中，大河內先生是最富傳奇性的人物。據說，大河內先生和這位先生的哥哥在同一個馬戲團中，這個馬戲團叫做「林氏兄弟馬戲團」，是當時世界最大的馬戲團。

85. 中村智子《橫濱事件の人びと》（田畑書店，一九七九年，增補版一九八〇年）。

有關橫濱事件，當事者的回憶錄頗多。藤田親昌、美作太郎、渡邊潔《言論の敗北——橫濱事件の真実》

（三一新書，一九五九年）。新版《橫濱事件》（日本エデ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一九七七年）。

我們再往前回溯一下歷史。二十世紀初，早年的傑出橫綱力士常陸山曾率領日本的大相撲團到海外巡迴公演。當時，隨團中有個叫太田川的相撲選手，他的相撲技藝在美國頗獲觀眾的青睞，因此，他並沒有隨大相撲團返回日本，而留在美國。他在「林氏兄弟馬戲團」的舞台初展身手，試演他自己編導的柔道劇。他導演的柔道劇其實是一種「幕間狂言」\*，藉以轉換模仿動物表演與雜技間的氣氛。首先，中央的圓台一片漆黑，發出下雨的聲音。接著，一個身穿日本和服的女性，一面用日式的油紙傘半遮著臉，一面緩步走到圓台的中央。這個女性正是相撲選手太田川的妻子。但就在這時候，衝出一個彪形大漢的惡徒（由太田川飾演，他是相撲選手，所以在美國人看來，也是巨漢），撲向嬌弱的婦人，想要搶錢。但只見這名婦女輕巧地抓住惡徒的手臂，施出柔道的手勢，便把他摔倒在地。惡徒的一名手下（由大河內先生飾演）見狀，想來拯救老大，而持槍準備射擊這名婦女。不過，他照樣被這名婦女用柔道摔得四腳朝天，最後兩個惡徒只好落荒而逃。劇情雖然這麼簡單，但卻廣受歡迎，據說曾在美國各地巡迴公演好長一段時間。大概是日俄戰爭後不久，美國對日本文化正產生興趣吧。

待在監獄期間，我們無所事事，聽到許多這類的故事。在那裡最常為人津津樂道的



大河內先生，其實還有許多逸聞。雖然我也聽過有關大河內先生的眾多故事，但是在這裡，我只想談一件耳聞，也就是他為什麼前往美國的理由。

他的本名叫大河內光孝，是子爵家中的次子。按當時華族子弟的習慣，他進入學習院就讀。讀小學期間，他發現有個低年級生看似非常孤單，由於他很喜歡這個學弟，於是把自己帶到學校的糖果——只是些廉價糖果和點心——送給那個學弟。事情傳出後，卻引起一陣騷動。當時，學習院的院長是乃木希典上將，想找大河內父母商談，但大河內的父母惶恐之餘，讓自己的兒子退學了。從那之後，大河內光孝先生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轉折。後來，他走上了歧途，父母無法管教，於是把他送到美國。在美國幾經輾轉流浪，最後進入了馬戲團。從這故事的脈絡中，各位想必已經察知，大河內先生送糖果的那名低年級學生，就是當時皇太子的兒子，亦即現在的天皇（昭和天皇）。

\*短喜劇，以諷刺諧謔為特色。原本在能劇的演出幕間插演，以緩和能劇悲戚哀傷的氣氛。

#學習院是學校的名字，這裡指的是學習院大學的前身，當時有初、中、高三級學校。這是日本的貴族學校。

我輾轉待過幾個拘留所，最後來到馬里蘭州米德要塞的戰時俘虜營。上述傳說中的主角，已比我先待在俘虜營。正如傳言所說，他是個心胸寬廣、性情豪爽之人，從他那裡，我聽到許多有趣的故事。但有關贈糖給天皇的故事，並非他直接告訴我的，而是我從日本人之間口耳相傳聽來的。我們的交往頗為密切，不僅同在這最後的戰時俘虜營，又搭同一艘「日美交換船」回去。這是最早的「日美交換船」，離開美國後，經由南美，繞過非洲，再經新加坡抵達日本，幾乎繞了地球的三分之二，花了整整兩個月的時間。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日本的，所以有許多交談的機會，我因而更加欣賞他的為人。回到日本之後，我志願當海軍的文職人員，前往南洋，但卻罹患結核性胸部骨疽，動了兩次手術，最後被送回了日本。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回到日本。回國後不久，在一九四五年的嚴寒時節見到大河內先生。那時候，他剛出獄不久，我問他為什麼被抓？按他自己的說法，連他也不知道理由。唯一的可能性是，大河內先生不改住在美國的習性，心直口快，可能說了什麼帶有「日本可能打不贏這次戰爭」之類含意的話，而遭鄰居密告入獄的。他們夫婦說，除此之外，想不出其他的理由。後來，戰爭結束，社會依然混亂不已，我因而與他們夫婦失去了聯絡。我心想，他們應該還活著吧。這次，我是

讀了中村智子的《橫濱事件的受害者》（增補版）中引自警方的筆錄，才知道大河內夫婦因為捲入「橫濱事件」被捕並受到拷問，以及大河內光孝與「橫濱事件」的關聯。

上述情事，讓我思及三點事情。第一，有名男子喜歡天皇這個「人」，到頭來卻背上莫須有的罪名，在天皇的名義下受到拷問。這是一個事實。第二，他從美國回來之後，當公寓的管理員維持生計，但正因為他是從美國歸來的，所以包括公寓在內的附近鄰居，都視他為外來者。可是他久居美國回到日本，在語言和習慣上，難免與在地人有很大的差異。但就因為他這種外國形態，鄰組便不予保護，並且對他的言論，大加撻伐！因為他與當時日本國民的多數意見大相逕庭，才遭到密告入獄的。儘管他是華族\*的妾腹之子，但在被捕之後，這種出身絲毫沒有用處。在這層意義上，日本的戰時法西斯主義隱含著一種堅實的衝動，亦即對特權階級的憎恨和圖謀消滅。在這種情況下，大河內先生自然成了戰爭時期，必須統一國民輿論的某種民主主義的祭品！第三，大河內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被捕，換句話說，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捏造的橫濱事件中所處的結構位置。在我看來，他甚至最終都不知道「橫濱事件」這個名稱呢！

\*日本於一八六九年授予以往的公爵、諸侯的族稱。依一八八四年的《華族令》規定，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爵，對國家有貢獻者也予以列入，成為有特權的社會身分。此令於一九四七年廢除。

## 原子彈的犧牲者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共同的事態：交戰的國家時常不約而同地透過國家特質，顯現一種心電感應般的方式，默契十足地持續瞞騙自己的國民。當我們思考戰爭這個層面時，可以從國家有意瞞騙國民的角度看出國家的特質。原子彈就是這眾多的事例之一。換句話說，我們從投下原子彈這事件可以得知，即便在戰爭期間或戰後，甚至在其後長期持續的和平時期裡，這兩個舊時的敵對國家，依然保持著共謀的同盟關係\*。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B-29轟炸機在日本本州的廣島市投下了二三五鈾型的原子彈。八月九日，另一架同型轟炸機又在九州的長崎市投下了鈾二三九型的原子彈。

\*應是指美、日均未把投下原子彈的事情明白告知自己的國民。

報紙向日本國民報導說，美國已用新型的炸彈來對付日本人云云；同時還傳述新型炸彈的威力，並勸告讀者穿白色衣服比穿黑色衣服更能防止新型炸彈的傷害。這類報導給人一種印象：僅做這種程度的準備有用嗎？有關新型炸彈的強大威力，大本營和報紙都沒有說出其嚴重性。日本投降之後，美國派出專家前往廣島和長崎確認原子彈的效力。不過，原子彈破壞力的真相，直到美軍結束佔領的一九五二年之後，才被日本的國民得知。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在舊金山簽訂和約的結果：佔領軍在日本審查書報雜誌的制度宣告廢除。發行週刊照片雜誌《朝日畫報》（《アサヒグラフ》）的朝日新聞社在佔領結束的當天召開編輯會議，決定出版受原子彈慘害的相關照片。長達七年遭到刻意隱瞞的原子彈下慘狀，透過《朝日畫報特輯》（《アサヒグラフ特集》）的披露，這時才為日本國民所認識。在這段期間，遭受原子彈之害的倖存者們，無不獨自承受原子彈後遺症的折磨，苟延殘喘或者死亡，他們的證詞始終沒辦法傳到本國同胞的耳裡。幾名倖存者有意以自家出版的書籍形式發表自己的受災遭遇，但是即便以這種形式，仍被佔領軍的審查制度禁止<sup>51</sup>。日本電影社曾製作了一部長達兩小時左右的紀錄片，可是連底片也被美軍抄

走，幸虧當時有幾名製作人員暗中保存了毛片；這是呈現原子彈爆炸後都市實況的唯一電影紀錄，該片一直保存到現在。曾有兩名朝日新聞社的攝影記者拍下廣島和長崎在原子彈投下之後的景象，其中一名攝影記者接到佔領軍的命令，要求他毀掉這些底片，但是他不予理會，而保存了底片。這些照片經過蒐集，終於在佔領結束後，得以向日本國民公開。

佔領軍當局認為，披露這些紀錄，之於他們推動佔領的目的有所阻礙。或許這種判斷是正確的，因為向來以寬大心懷、民主主義者自居的佔領軍形象，與帶給廣島和長崎市民的悲慘境遇太不相稱了！

日本投降之後，美軍公布一項數字：原子彈投到廣島市，造成七萬八千人死亡，一萬三千人失蹤。但是證據顯示，至少有二十萬人死於這場災難。根據日本紅十字會推斷，有二十五萬人死亡，十五萬人受傷；而且死亡的人數，隨著年月節節升高。到最近，其死亡率已超過未受原子彈遺害的同時代人。根據推斷，原子彈投在長崎造成的死亡，高達十二萬人。

86. 松浦總三《占領下の言論弾圧》（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版会，一九六九年）。

哈伯特·費思仔細研讀戰爭當時，美軍決策的參與者所能利用的資料之後，在《原子彈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一書中，做出這樣的結論<sup>87</sup>：

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對於這項早在一九四五年達成的結論，始終無法提出立論充分的反對意見。因為他們綜合研判軍事上的狀況與日本政府及民間的意見傾向後發現，日本的戰力已經嚴重耗損。同時預測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以前結束戰爭，就算（美國）不向日本投擲原子彈，或蘇俄不參戰，甚或不擬登陸日本的作戰計劃，日本也會投降。

日本投降之後，美國曾派遣專家到日本，確定和評估美國空軍攻擊的實態及其效果。費思的這項結論已由專家的報告得到證實。不過，費思自己仍說，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決定，不應受到譴責。他的立論根據在於：使用原子彈可以儘快結束戰爭的痛苦，拯救更多的人命。費思引用的資料指出，神風特攻隊發動攻擊以後，日本的「特攻機」擊沉了三十四艘美艦，其中包括三艘航空母艦；並炸傷兩百八十五艘美艦，其中包括各種航空母艦三十六艘、戰艦十五艘、巡洋艦十五艘、驅逐艦八十七艘等。費

思接受美國領導者的價值意識：在蘇俄欲加入分享獵物前，為了儘早結束戰爭，使用原子彈是正當之舉。但問題是，應否使用原子彈的判斷，跟此判斷是否原封不動地接受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戰爭領導者的價值意識有關。

英國的軍事史家李德·哈特就沒有受到美國領導者價值意識的束縛，他從軍事的觀點，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一書的最後階段，這樣寫道<sup>88</sup>：

……於是日本遂用無線電宣布投降。

其實，並不真正需要使用原子彈才能產生這樣的結果。誠如邱吉爾所說，當其船隻的十分之九都已沉沒或不能行動，其空中和海上的兵力都已被摧毀，其工業已被破壞，其人民糧食供給已日益缺乏——在種種情況之下，日本的崩潰實在早已成為定局。

美國的戰略轟炸調查報告書（*U.S. Strategic Bomb Survey*）也同樣地強調這一點，不過卻又補充說：「假使日本的政治結構能夠對於國家政策做比較迅速有效的決定，那麼在軍事已經

<sup>87</sup> Feis, Herbert,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sup>88</sup> Liddell-Hart, B. H.,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1970.



無能為力，與政治承認無可避免的現實之間的時差，也許即可以縮短。話雖如此，但似乎還是很明顯，即令不使用原子彈，空中優勢也仍能產生足夠的壓力，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並且無登陸作戰的需要。美國海軍軍令部長金恩（Ernest Joseph King）也認為，只要我們願意等待，僅憑海軍封鎖即可餓得日本人非屈服不可——因為他們缺乏油、米，以及其他各種必需的物資。」

但是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美軍決意不等呢？這就是問題所在！假設當時美國的目的是與蘇俄競爭，美國政府當然不能等待。另一方面，美國可能也抱持一種價值意識，要滿足美國內部的輿論，最好儘早結束戰爭。基於這些因素，美國政府認為不能空等，也決定不再等。這樣一來，可以說使用原子彈的決斷，不僅出於軍事上的需要，也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但是，美國不願意面對這個事實！

我再援引一下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其中便提及美國軍事領導者間不同的意見。曾經出任羅斯福總統與杜魯門總統參謀總長的李海（Admiral Leahy）上將也跟前述金恩上將相同，有不同的預測：

李海上將對原子彈的判斷為不需要，並且更加強調：「在廣島和長崎使用這種野蠻兵器對於我們與日本的戰爭無實質的助益。由於有效的海上封鎖和成功的傳統性轟炸，日本是已被擊敗並準備投降。」

但是，為什麼要使用原子彈呢？除了希望迅速減少英美兩軍人命損失的直覺想法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強烈的動機？還有兩個原因。其一便是邱吉爾本人所透露的。在他所敘述，七月十八日當天聽到原子彈試驗成功之後，和杜魯門總統會商時的情形裡，他曾對於當時在座諸公的心情做出以下的分析：

我們應該可以不再需要蘇聯人，對日戰爭的結束已經不必再依賴他們陸軍的參考，我們不需要再求他們幫忙。幾天以後，我告訴艾登先生\*說：「非常明顯的，在目前美國是不願意蘇聯人參加對日本的戰爭。」（艾登·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第六卷五五三頁）

\*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為二次大戰繼邱吉爾之後，接任英國首相。

史達林曾在波茨坦會議上要求分享佔領日本，使得美國人感到非常為難，而美國政府必定十分希望能夠避免這種情形發生。原子彈也許能夠幫助解決這個問題。蘇聯已預定在八月八日加入戰爭——也就是在投下原子彈兩天之後。

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的第二個理由，是由李海上將所透露的。他說：

科學家和其他人士想要做這次試驗，因為這個計劃已經耗費了大量的金錢。

原子彈的建造計劃共計兩億美元。一個和代號為「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的原子作戰具有密切關係的高級官員，曾經對於這一點解釋得更清楚：

這類原子彈必須是成功的——因為在它身上已經用了許多的金錢。如果失敗，我們對於這樣巨大的費用又將怎樣交代呢？想到人們的批評就令人感到害怕……但時間日益迫近，在華盛頓有某些人曾試圖說服格羅夫斯將軍 (General Groves)，也就是曼哈頓計劃的總監，趕緊急流勇退，以免太遲不得脫身。因為他們知道，假使我們失敗，格羅夫斯將會如何成為眾矢之的。

當這顆原子彈完成並投下之後，所有一切相關人員感到非常巨大的安慰，真有如釋重負之感。

此外，也有人不從歷史的軍事層面來看問題，而從未來世界一分子的角度闡述自己的觀點。羅勃·基蘭（Robert Guillain）是當時派往日本的法國記者，法國投降之後，他被扣留在日本生活。他在記述當時經歷的《日本人與戰爭》一書中，提出這樣的質問<sup>89</sup>：

白種人膽敢向非有色人種投下原子彈嗎？

他猜想，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否定的。他以白人新聞記者的立場認為，盟軍領導者的潛意識裡有人種歧視之嫌，這使得他們可以輕易下決定，向日本投下原子彈。

89. 羅勃·基蘭著，根本長兵衛、天野恒雄譯《日本人与戰爭》（朝日新聞社，一九七九年）。

Guillain Robert, *La guerre au Japon de Pearl Harbor à Hiroshima*, Paris, Editions de Stock, 1979.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在中太平洋比基尼環礁捕撈鮪魚的「第五福龍號」，淋到美國在水中試爆氫彈造成的灰雨。三月十四日，該漁船回到靜岡縣的燒津之後，二十三名船員隨即出現頭痛欲裂、嘔吐、皮膚紅腫和掉髮等症狀。九月二十三日，通訊長久保山愛吉（四十歲）死亡。

後來才知道原來從比基尼環礁捕獲的鮪魚含有放射能，於是「勿食鮪魚」的消息，旋即像電流般傳遍日本全國。或許加拿大人比較難以理解鮪魚的滋味，但在日本，這種食品具有獨特的意義：把生鮪魚片放在熟米飯上，是日本最高級的食物之一。因此對日本人而言，鮪魚包含著一種享受的浪漫。但現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喜好的鮪魚形象，卻讓人聯想到氫彈的恐怖。為此，許多壽司店因被懷疑是否使用「原子彈鮪魚」當材料，而被迫暫時關門歇業，魚市場也大受打擊。「第五福龍號」的母港——燒津的市議會決議要求美國政府禁止試驗原子彈與氫彈。這個決議進而引起全日本小村、町議會、縣議會決議發布反對原子彈與氫彈宣言的運動。只有東京都、宮崎縣、鹿兒島縣和福井縣等反對通過《禁止試驗原子彈與氫彈決議》。像燒津市議會這種地方鄉鎮，率先表明反對原子彈與氫彈試驗的世界性行動意志，的確在日本的反戰運動史中寫下新頁。

雖然東京都議會沒有通過《禁止試驗原子彈與氫彈決議》，但位於東京都內的某一區卻成為日本國民規模最大的反原子彈與氫彈運動中心。這個區，就是杉並區。杉並區的住民大都是以公司職員和公務員家庭居多。在杉並區發端，並以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為核心的反對運動，無形中創造出一種新的反戰運動的形式：主婦們選定時間站在街頭呼籲路人連署「禁止使用原子武器運動」，或舉行小型讀書會，探討原子彈、氫彈或以戰爭為主的書籍。此種運動形式，起初受到繼承戰前無產階級運動形式的運動者所鄙視，有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甚至批判說，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沒有「聯名簽署」這種東西！然而，共產黨員和社會黨員眼看此運動在民間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便主動接近參加。最後，卻因為雙方互爭運動主導權，導致運動走向分裂局面。

德川時代的東京\*，孕育出各種由中下層階級自由參與而形成的大眾文化的樣式。但是明治時代以後，城市規模超過江戶末期五倍的東京，在文化的形式上，很長時間處於瓦解江戶時代形態後，卻無能定型的局面。戰敗後的歲月就是這種不定型時代的極端

\*當時稱為江戶。

事例！韓戰結束之後，日本受到經濟繁榮之賜，像杉並區這種屬於東京的新「山之手」\*地區，已形成新型態中產階級文化的基礎，而「原子彈鮪魚」事件作為契機，便是肇端於一九五四年，家庭主婦反對運動急速發展的原因。至此，日本人自己和學者都沒有發現：他們正處於戰後中產文化革命的開幕時代；此文化革命的型態，幾年後終於以具體鮮明的形式，展現在民眾的面前。

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全民運動，為何不在其他地方，而在杉並區發生，主要是源於安井郁擔任杉並區公民館館長<sup>4</sup>這個偶然的因素。安井郁（1909-1980）原本是東京大學的國際法教授，但佔領軍以他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四處從事理論演說為由，撤去他的東大教授職位，於是他自一九五二年起改為擔任杉並區公民館館長。在此，他得到妻子的幫助，把住在附近的主婦們組織起來，舉行讀書會。我們可以將安井郁的戰後活動，視為他遭到佔領軍軍國主義領導者放逐的指令下，於戰後不久所進行的轉向形式之一。

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連署運動開始後不久，杉並區議會通過《禁止試驗原子彈與氫彈決議》；安井郁藉此機會，設計全國性的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連署運動，並決定將這項運動和一九五五年一月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結合。在同年夏天之

前，原本始於杉並區，由幾個家庭主婦所組成的小型讀書會「杉之子會」的運動，成功地取得杉並區總人口三十九萬人中，二十八萬人的簽名連署。後來這項運動，更成功得到當時日本總人口一億一千萬人中，共三千二百三十八萬人的簽名連署。一九五五年夏天前，來自世界各地的簽名連署已達六億七千萬人。比起世界各地的情況和人口比例而言，日本之所以獲得多數的簽名連署，主要是源於這個特別的原因：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只有日本國民受到原子彈的摧殘，而且是「三」蒙其害！

假使日本政府在十五年戰爭期間可以自由使用原子彈的話，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拿來對付美國吧。從十五年戰爭初期，日本發動戰爭的作風來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日本政府的立場來看，他們很難對美國使用原子彈表示強烈的反對，但從生活在日本的居民立場來說，其中包括朝鮮人和來自世界各國的戰俘，他們對原子彈的使用則有不同的看法。如前所述，在這些人之中，例如像羅勃·基蘭這樣的法國記者，在戰爭

\*「山之手」，指東京西側的台地，範圍就是現在JR山手線圍繞的地區。古江戶城人口原先都聚集在

「山手」，杉並區是「山手」地區比較晚開發的地方。所以作者說「新」山手。

#有點類似台灣的里民活動中心。



末期已被日本軟禁，但他對原子彈的看法就與美國人的見解稍有不同。換句話說，只要把世界看成是由國家構成的，只要把人民看成是國家的一部分，我們在批判使用原子彈之際，所言便顯得有限。杉並區的主婦們與日本的全體住民和世界各國的民眾有志一同，得以收集到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連署簽名的原因在於，她們代表的並非其所屬的國家政府，而是住在當地的多數住民。但是不久之後，政黨介入了這項運動，他們跟各國政府的力量結合，反而促使最先揭竿而起的人們所營造的統一狀態，走向分裂之途。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舉行了第八屆禁止原子彈與氫彈世界大會。日本社會黨和「總評」\*的勞工陣線提案，要向蘇俄的核子實驗表示抗議。但這個議題卻造成會場秩序大亂，日本社會黨及其贊同者因而退出了會場。禁止原子彈與氫彈大會發生分裂，未通過大會宣言，便宣告結束。後來，中共的核試驗更給這次會議帶來新的難題。因為各國社會主義的代表，每逢其國家代表遭到指責，便退出大會。這些國家代表始終站在與其政府所採行的、與當前政策不可分割的社會主義立場。也就是說，只要是社會主義國家代表視為正當的，或是由他們合理化國家使用原子彈，任何人都不准批判。正如過去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運動所顯示的，社會主義已經顯現出另類的國家主義的特徵了。

始於一九五四年，由杉並區家庭主婦發起的反原子彈運動，成為若干年後市民運動的先驅，也成為一九六〇年以後，在顯著的經濟繁榮之下成長的中產階級，對自我滿足的想法展開自我批判的動力。根據調查，現在（指一九七九年）已有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人自覺屬於中產階級，他們身上也的確有著中產階級的氣氛。而這種自我批判本身，即帶有都市中產階級氣氛的印記。正如前述，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主婦運動，是以鮪魚肉遭到污染事件為發端，這也可說是最早由日本公民發起的反公害運動。「公害」是明治時代以後，日本政府工業化政策下出現的特徵。由於日本是在幾個狹長的島嶼上發展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長期以來背負著嚴重的公害危險；這主要是明治時代中期以後，政府成功地矇騙民眾甚深所致。現在，政府在戰敗之後已經愈來愈無法保持過去的威權，反公害的抗議運動才得以發揮力量。但儘管在那樣的時代，技術者仍較傾向政府和企業的立場。然而，就在遭受特定公害的少數市民發出抗議之聲時，技術者和科學家及時發出聲援，反公害的聲音才得以傳進廣大日本民眾的耳裡。甚至在某些場合中，還能迫使政

\*全名為「日本工會總評議會」。一九五〇年成立，是當時日本最大的全國性組織，為二次大戰後日本工會運動的中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因與成立於一九八七年的全日本民間工會聯合會合併而宣告解散。

府和企業接受抗議內容。然而有些日本的跨國企業仍無視於這類抗議聲音，在朝鮮和菲律賓等地設立工廠，把公害輸出到這些國家，這可說是戰爭時期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戰後複製品！抗議公害的市民運動，並不因為把公害趕到國外去，就告結束，仍須收集來自國外對日本企業輸出公害的抗議聲音，並以此繼續推展運動。

反公害市民運動的理論架構，在很多方面創造出相反的做法，不同於始自「東大新人會」的大學生運動。在東大新人會成員看來，他們已經從理論上透視並理解文明的一般法則，也正試圖把這些法則嵌進他們眼前日本的特殊事例中。就反公害運動一事而言，則從特定運動或特定問題出發，然後再轉回尋求問題解決所需的知識性法則。新人會運動自始在本質上就是世界主義性的運動；反公害運動則從地區性的問題開始，繼續扮演著推動地區運動的角色，但是並不會只侷限在地區運動，最終仍然不得不採取跨越國界的行動模式。而這種行動模式特別適合用在反原子彈與氫彈的運動。有如地區和世界關係，反公害運動與東大新人會的運動形成對比，在日本國內批判權力運動中出現的新方式，已由內部衍生一股力量，要與向來代表日本文化特徵、此後也將留傳後世的鎖國性格戰鬥下去。

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受難者，不喜歡談論他們的遭遇<sup>90</sup>，也沒有立即參與反對運動。所有的原子彈受難者對未來的命運都感到失望無助，每天苟延殘喘。社會學家的實態研究中已經清楚表明這些現象；在此之前，這些現象也表現在廣島原子彈的受難者原民喜所著的短篇小說中。原民喜根據目睹的慘境，寫下一系列控訴戰爭暴行的短篇小說，卻在之後，也就是韓戰方酣的一九五一年，臥軌自殺了<sup>91</sup>。短篇小說〈夏天的花〉（〈夏の花〉，一九四七年）生動地再現發生在廣島的可怕情景；〈心願的國度〉（〈心願の國〉，一九五二年）則描寫遭受原子彈轟炸後，作者內心的幻想與孤獨。他在短篇小說〈格列佛遊記〉（〈ガリヴァ旅行記〉，一九五一年）中，這樣寫道：當我看到一匹馬垂頭喪氣地兀立在原子彈轟炸後的廣島時，我想起了在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第四卷「慧駟國遊記」中，那匹有理性而公正的馬。

90. Lifton, Robert J., Reisch, Michael, 加藤周一《日本人の死生観》上・下（岩波新書，一九七七年）。

大江健三郎《ヒロシマ・ノート》（岩波新書，一九六五年）。

長岡弘芳《原爆文学史》（風媒社，一九七三年）、《原爆民衆史》（未來社，一九七七年）。

91. 原民喜（1905-1951）的作品，二度被編成全集出版。《原民喜作品集》全二卷（角川書店，一九五三年）。《原民喜全集》全三卷（芳賀書店，一九六五—一九六九年）。

原民喜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同樣的，許多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受難者，都不願意談論他們的遭遇。在現實生活中，他們苦於找不到結婚的對象，為家有孩子而煩惱，在替親戚的子女撮合婚事時遇到困難。他們時常擔憂舊病復發的可能，也害怕疾病遺傳給下一代，還顧慮自己的有病之軀是否對健康良好的親朋好友造成困擾而惶惶度日。井伏鱒二的長篇小說《黑雨》<sup>92</sup>，就揭露了整個日本社會對原子彈受難者的歧視。

原子彈受難者之中，有詩人峠三吉和小說家大田洋子<sup>93</sup>。這些作家直到去世前，對原子彈災難的書寫仍執筆不輟。事實上，在戰爭結束的一九四五年秋天之前，大田洋子已經完成《死屍的街道》，但直到佔領下的一九四八年，才獲准以刪除部分內容的形式發表。大田洋子始終無法適應戰後的日本社會。她在《半人》（《半人間》，一九五九年）和《滿目瘡痍的人》（《人間檻樓》，一九五一年）中，不斷地凸顯原子彈受難者生活失調的痛苦。

也有一些作家沒有直接遭受到原子彈的摧殘，例如，堀田善衛就寫了《審判》這部小說，用國際性的視野，觀照「原子彈轟炸」為世界現代史的一部分<sup>94</sup>；在小說中，日本人和美國人雙方都以對等的主角身分活動。飯田桃的《美國的英雄》是一部由日

本人所寫，卻罕見地沒有日本人出場的長篇小說<sup>95</sup>。就這點而言，以一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美國人作為作品主角，可以說是日本文學史上的創舉！

92. 井伏鱒二《黒い雨》（新潮社，一九六六年）。

93. 峠三吉（1917-1953）在廣島遭到原子彈轟炸，戰爭期間信奉基督教，但戰後加入日本共產黨，在佔領期間寫反戰詩作。一九五一年，在《新日本文學》雜誌上發表〈原爆詩集〉，一九五二年由青木書店出版。

大田洋子（1903-1963）在廣島遭遇原子彈轟炸後，即開始書寫有關原爆（原子彈）的作品。她完成長篇小說《屍の街》，但沒能通過佔領軍的審查，無法出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刪除了部份內容後，才由中央公論社出版。完整版於一九五〇年由冬華書房出版。

94. 堀田善衛的《審判》（岩波書店，一九六三年）描寫投下原子彈的美國人保羅·李波特，和向中國人施虐的日本人高木恭助，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苦悶的人生。

95. 飯田桃（いいた・もも）《アメリカの英雄》（河出書房新社，一九六五年）。小說中的「美國英雄」就是投下原子彈的飛機駕駛員克勞德·伊瑟利（Claude Eatherly）。他一再犯罪，又自殺未遂，最後被關進精神醫院。

## 戰爭的終結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天皇面前召開的「御前會議」中決定向盟軍投降。陸軍和海軍雙方的參謀總長主張繼續作戰，最後他們把決斷委於天皇。天皇表示，他將接受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宣言。戰爭終於結束。這場戰爭造成許多國家人民的傷亡，其中包括三百萬日本人以及一千多萬中國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天皇灌錄的「玉音」播放到日本全國。

當時，羅勃·基蘭被軟禁在長野縣的輕井澤市，使得他有機會看見村民們聚集在附近一處民房前的情景。那間民房正是鄰組組長的家。村民們低垂著頭恭聽天皇從收音機播出的聲音，他們從未聽過天皇的聲音。天皇講話的方式及其內容，村民們似乎都不大懂，更不知道這次的廣播目的何在。廣播結束之後，經過普通日語解釋天皇的演說，村

民們才瞭解演說內容意味著日本投降。基蘭覺得，天皇講話的方式很像能劇演員，單調而又缺乏情感。不過，聽廣播的群眾也以日本傳統戲劇常見的演技形式，回應天皇的演說。他們用最少的肢體動作來表達內心湧動的情感，把深刻的感情隱藏在無動於衷的偽裝之下。但廣播結束以後，傳來了陣陣的啜泣聲。村民們紛紛回家，不再出現，整個村落陷入一種極度的沉寂。

這時候，最讓基蘭驚訝的是，留在日本本土的七千五百萬日本人在此之前寧死也不願投降，現在卻跟著天皇的演說「向後轉」了。第二天起，他們居然用親切的笑容向基蘭和其他白人打招呼。

根據當時的資料指出，日本宣布投降之後，有五百二十七名軍職人員自殺身亡。其中陸軍佔三百九十四人，海軍佔一百二十六人，有三名護士，其餘四名所屬單位待查。此外，也有三十九名皆非陸、海軍的人員在東京自殺，他們都是信奉超國家主義<sup>\*</sup>的成員，也就是尊皇攘夷軍<sup>\*</sup>、明朗會<sup>\*\*</sup>、大東塾<sup>s</sup>的會員，其中也包括一轉念間便加入集體自殺行動的青少年。他們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麥克阿瑟的軍隊登陸日本本州之前自殺的。整體而言，美軍是在平靜中佔領日本的，其間並未遭到來自日本方面的武力



抵抗。至此，奪走三百萬日本人生命的戰爭終告結束。

構成日本全國四個大島上的住民們在美軍登陸之際，都決意進行「本土決戰」以保衛祖國。然而，真正進行決戰的並非這四個島嶼，而是遠離本土的沖繩群島。

一九五一年，在中國和蘇聯沒有參加的情況下，對日和平會議在舊金山召開。在會議上，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答應由盟軍（其實是美軍）繼續佔領沖繩群島。一九五二年，在付出同意美軍繼續佔領沖繩的代價後，美國才結束對日本本土的佔領。但這件事，並沒有對當時日本國民的意識造成任何沈重壓力，因為沖繩群島不僅位於日本群

\*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強調國家主義因素的政治體制，也指主張這種體制的思想和運動。以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期至二戰期間的日本和納粹德國為典型。

#日本的右翼團體。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十名成員用手榴彈自盡，五天後，三名該成員的妻子舉刀自刎。

※日本的右翼團體，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十二名成員遵照日本傳統切腹自殺。

§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以影山正治為首組成的右翼團體，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十四名成員切腹自殺。

島的南端，在文化傳承上，也與本州的各島嶼有些不同。根據傳說\*：沖繩群島是由「Amamikū」這個地域之神創造出來的。天神派遣自己的子女下降到沖繩群島上，建立最早的王朝；這個王朝據說維持了二十五代。（在這一點上，沖繩與大和王朝的傳說頗為相似。）在此之後，發生了反王室叛亂；平亂之後，又建立起新的王室。一六〇九年，日本南端的薩摩藩出兵入侵琉球，沖繩自此成為薩摩藩的殖民地。但是薩摩藩深怕攻打沖繩（當時與中國有朝貢關係）一事觸怒中國政府，因而讓沖繩居民保有中國傳來的習俗。薩摩藩把沖繩做為自己與中國貿易往來時的轉運站，然後再透過這個轉運站與美國和歐洲進行間接貿易。薩摩藩用這種方式獲得殖民地，並掌握豐富的砂糖產業，不但得以富強自己，也蓄積了日後推翻德川中央政府、展現革命勢力所需的國際視野和洞察力。

一八七九年，明治維新後十二年，東京的中央政府改變過去由沖繩群島世襲君主擔任知事，來維持其支配地位的制度，而改由東京直接派人出任知事職務。沖繩王朝至此終告瓦解。不過，沖繩的文化特色並沒有遭遇翻天覆地的改變。換句話說，受到中國強烈影響的沖繩，其據說為日本文化原型的傳統，依舊保持至今。因此，沖繩雖然被納入

日本的版圖，仍能維繫其獨特的文化。這就是美軍結束日本本土的佔領時，沖繩雖為例外，但日本人卻無切膚之痛的背景。

一九五〇年代以後，日本本土進入急速經濟恢復的階段，有個叫劉連仁的勞工，曾對當時的情況留下見證<sup>96</sup>。劉連仁是戰爭時期從中國被強制帶到日本的勞工，他在逃離工地後，孤身躲藏了十三年。類似劉連仁這樣的勞工，還有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九人，他們都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內閣指示下，從中國被帶到日本從事繁重的勞役。約佔這些人數六分之一的六千八百七十二人，兩年間即告死亡。有八百五十名中國勞工在

\*指琉球的古老傳說。一八七九年日本正式併吞琉球王國方改置沖繩縣，參見本書頁四十一關於琉球王國的譯注說明。以下相關段落的翻譯仍保留作者原語，但提請讀者留意。

#現今鹿兒島縣。

96.上田廣《原始林的野獸と共に——劉連仁日本潜伏記》（穗高書房，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七年，劉連仁擔任中共高密縣井溝人民公社草泊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歐陽文彬根據劉連仁口述（被強行帶走）寫成的《穴にかくれて十四年》已出版問世（《現代人物事典》朝日新聞社，一九七七年）。

「花岡事件」的相關資料有：野添憲治《花岡事件の人たち》（評論社，一九七五年）。（補注：野添憲治《中国人強制連行・花岡事件關係文獻目錄》能代文化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秋田縣花岡山抗議這種殘酷的對待，其中四百二十人遭到殺害。劉連仁趁在北海道的勞役工地時，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逃入山中，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才被發現。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sup>\*</sup>，也是訂定強制中國勞工勞役的決策者。岸信介政府原本打算把被發現的劉連仁視為非法居留者而加以懲罰，但這個決議隨即遭到日本輿論的反對，因而作罷。當劉連仁被問到「為什麼躲藏如此之久」時，他回答說，我時常在深夜出來偵察村民的生活情況，有時從窗外窺探屋內發現，村民們的生活和戰爭期間的匱乏狀態比起來，顯然富裕快樂得多，往往讓我以為日本已經打了勝仗。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名美籍的和平運動者嘗試在日本全國進行反越戰的演講旅行，當他遊歷從北至南的島嶼之後，說出了以下的感想：同一時期，住在沖繩群島的日本人，卻不能獲得像包括北海道在內的日本本土同樣的繁榮<sup>57</sup>。這位名叫拉爾夫·費查斯頓的黑人回到美國以後，卻被反對撤銷歧視黑人條款的右翼激進分子預埋的炸藥炸死。他簡約概括地描述環繞日本全國的印象：就和平問題而言，日本人可分為沖繩和沖繩以外的日本人。當時，沖繩的美軍基地已被作為開打越戰之用，因此，住在沖繩的日本人對戰爭的感受，遠比住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來得深刻許多。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因為和平憲

法中，不准日本政府和國民參與戰爭的保障，而有安心之感，並且極力讚美這種狀態；但相對於住在沖繩的日本人而言，他們卻有一種正在支持越戰的現實體認。

民俗學家柳田國男指出，「日本文化的祖先是從南方經沖繩到日本的。」這是在他最後的著作《海上之路》（《海上の道》，一九六〇年）提出的假設，同時也是他畢生研究日本風俗習慣的結論。在日本本土，各種傳承<sup>97</sup>都被巧妙地揉合成莊嚴化國家制度的一部分，但在沖繩則因為沒有結合國家的操控技術，而留存為民眾儀式的一部分。傳承和祭典已深入沖繩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至今仍具有比日本本土更旺盛的生命力<sup>98</sup>。

\*相當於台灣的經濟部長。

97.有關拉爾夫·費查斯頓「縱貫日本之旅」的感想收錄在鶴見俊輔、小田實、開高健合編的《反戰の論理》（河出書房，一九六七年）。

#各種制度、信仰、習俗、口碑、傳說等。

98.住谷一彦《アカマタ・クロマタ——八重山印象記《南海の秘密結社》》（《みすず》一九六四年一月号）、《南西諸島のGehin-kaji——新城島のアカマタ・クロマタ覚え書》《南西諸島の神観念》（未來社，一九七七年）。

沖繩的祭典給住在東京的學者印象深刻；可參閱住在沖繩的研究者：新川明《新南島風土記》（大和書房，一九七八年）一書。

投降後不久，有段期間日本國民曾強烈主張用科學的法則，代替現有的神話和故事傳說。這種科學主義一方面得到佔領軍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得到以蘇俄政府權威為背景的日本共產黨支持。儘管這兩支科學主義流派，在日本投降以降時看似新穎，也似乎不容置疑，但隨著時間推移，雙方都露出了破綻。傳說和儀式所表現的日本舊有傳統，現在已被認為不應該全部捨棄。這些傳說和儀式在過去始終被充當工具，用來正當化現存政府的政策。但一般認為，這種舊式招數，已經不是詮釋傳統的唯一方法。在沖繩文化型態中，女性在宗教儀式中擔負重要的角色，在社會生活中也參與基本價值的開拓，而這種力量對於改變日本本土男性至上的社會生活，也帶來了啟示作用。日本戰後的知識氛圍就在這種情境中變易。沖繩的傳承和儀式，以明治以後日本史上未曾經歷的方式，攫住日本人的想像力；而它也提供了找出日本古老文化型態的線索，因為這些線索是無法從近代日本官僚性或殖民地依附文化中發現的。

沖繩對明治以來中央政府的百年統治發出不平之鳴；他們站在十五年戰爭犧牲者的立場，也站在戰後被割離本土，繼續被美國佔領的立場，對戰爭時期和戰後的日本中央政府發出批判之聲。換句話說，這就是現代日本內部的第三世界發出的吶喊！和柳田

國男一樣，柳宗悅很早就開始關注沖繩的文化了。他對沖繩「民藝」的探索研究，也刺激了日本本土的工藝家。戰前，柳宗悅及其友伴曾數度前往沖繩旅行，當時中央政府強制沖繩住民使用東京腔標準日語，他曾因此政策與中央政府爆發衝突。在一九四〇年旅居沖繩期間，他也曾因為提倡保護沖繩的語言而被警察帶走。從當時\*日本政府的標準來看，他的意見顯然是危險思想！柳宗悅當時說，一國的文化力量來自於該國內部地域文化的匯聚；相反的，地域文化一旦變得薄弱，國民全體的文化也會失去特色。每個國民若不能充分掌握各地孕育的語言，豈能找到適合自身的表述方式呢？詩人但丁的《神曲》，就是用當時義大利的地方語言寫成的。沖繩人學習目前東京公定的東京腔標準日語，或許有所益處，但也請各位傾盡熱情，保存你們祖先留下的語言！同時，也請各位記住，正是這種語言培養出女詩人恩納鍋<sup>註</sup>的優美詩作，也請你們更加維護此語言，直到沖繩的語言創造出偉大的文學來！到那時候，沖繩一定會吸引所有日本人的目光，而

\*即戰爭時期。

#相傳生於十八世紀中期的恩納村，但生卒年無從查考。作品有：用琉球方言寫成的短歌《琉歌》，

八、八、八、六形式。

世界各國的人也會因為要翻譯這類文學作品，而學習沖繩的語言。<sup>99</sup> 這席話是柳宗悅在十五年戰爭正酣時說的。若從當時東京政府國策中心領導的日本文化為背景來看，尤其在十五年戰爭史中，柳宗悅這樣看待沖繩，可說是一種預言式的聲明。戰爭結束以後，許多人開始覺得柳宗悅的見解是正確的。戰爭期間，柳宗悅已經不把地方文化當成是「分銷處」，接受以東京為「總經銷」的海外世界思潮，而是將它視為創造世界文化的場所。這種觀點，可說是日本戰爭時期思想史的主要遺產之一。<sup>100</sup>

直到戰後，我們才瞭解這樣的事實：沖繩不僅為我們提供推斷古代日本狀態的線索，也提供了構築未來日本的重要啟示。沖繩時常自覺到自己的負面角色，因為它現在是美軍對付亞洲國家的前線基地，同時也具有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的困難。沖繩警告日本本土的住民：六〇年代以後的日本經濟發展若不加以抑制，勢必會侵犯到亞洲鄰國的權益。而如何建立一個對戰後世界沒有威脅的日本，這個展望便是透過日本全體國民，努力繼承沖繩經驗而表現出來。投降後不久，日本本土的住民完全忘了沖繩的存在，後來才興起和沖繩結合的希望，而這個願望在一九七二年終於實現。現在，沖繩仍和日本本土不同，島嶼的絕大部分均為美軍基地，住民們也和美軍士兵往來密切地生活著。然



而，當沖繩群島違反美國政府，回歸日本時，對設置核武設施一事，至少已決定接受和日本本土同樣的待遇。雖然這只是極其些微的形式表現，但也表現出對日本中央政府在戰爭末期讓沖繩住民背負痛苦的自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對日本人而言，僅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戰爭結束」這件事上。戰後不久，日本民眾並沒有立即在八月十五日這一天，舉行所謂紀念集會的儀式。但是慢慢的，紀念這個日子及重新思考戰爭的集會每年都在召開。當我們把這種對戰爭的回憶方式，和後來日本在越戰中支持美國戰爭政策的事實，結合起來思考十五年戰爭的時候，它便帶來一種新的意義。事實上，包括許多支持舊軍國主義的日本人在內，他們都已經察覺，美國的越戰政策和日本往昔對亞洲的戰爭政策頗為相似。因此，紀念八

99. 柳宗悅〈國語問題に關し沖繩県學務部に答ふるの書〉（《沖繩朝日》、《沖繩日報》、《琉球新報》同時刊載，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僅《琉球新報》分十四、十五日兩天刊載）。這篇文章是針對沖繩學務部發表在上述各報的〈敢て県民に訴ふ、民芸運動に迷ふな〉的反駁。《柳宗悅全集》第一五卷（筑摩書房，一九八一年）。

100. 大江健三郎《沖繩ノート》（岩波書店，一九七〇年）。

月十五日的集會，透過與越戰的交會，便成了反戰活動的開端。當這種結合國外的戰爭，並從國際視野中審視八月十五日的習慣形成時，這一天對日本而言不僅是戰爭的結束，也意謂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sup>101</sup>；進而，我們也可以視這個日子為世界史中某些戰爭的一部分，或者也包括往後可能發生的戰爭！由此看來，日本的十五年戰爭不僅不是日本的特殊現象，同時也被視為與其他各國推動的各種戰爭有所關聯。

出現這種另類戰爭觀點的原因之一，在於戰後的日本新生代，用兒童的目光凝視著戰爭時期已成爲大人的前一代日本人，其在面臨戰敗、投降以及外國軍隊佔領時，態度如何轉向所致。日本的孩子在佔領之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長，的確是他們形成此一觀點的重大原因。因此，爲了瞭解佔領時期兒童性格的形塑，我們必須回溯至戰爭時期，看學童是如何疏散和躲避戰火的。最近，我在蒙特婁的報紙上，看到一則在戰時英國度過孩童時代的人所寫的回憶文章。當時年紀尚小的派崔西亞·湯普森（Patricia Thompson）這樣寫道：

前一天晚上因為空襲，我沒有睡好，所以在學校的教室裡睡得很沉。不過，老師並

沒有因為這樣而責罵我，反而把我抱出教室，把我帶到另一個小房間去。那房間是專為像我這種在戰中疲累的孩子特別準備的。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但也沒什麼辦法。<sup>102</sup>

這個故事恰巧與戰時日本小學生所寫的回憶文章形成明顯的對比。一九四一年一月陸軍省<sup>\*</sup>編纂的《戰陣訓》<sup>#</sup>，和一九四一年七月文部省<sup>\*</sup>編纂的《臣民之道》（《臣民の

101.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東京第十二頻道播放「徹夜長談——思考戰爭與和平」。一到深夜，就在主持人說「假使天皇說還要戰鬥下去，你們覺得會戰鬥下去嗎？」的同時，電視台製作單位沒有預警地停止節目的播映，但討論會仍持續到清晨，隔天由其他團體召開各類「重新思考戰爭的會議」接續下去，形成了二十四小時的馬拉松聚會。這時候，向來把八月十五日這一天當成國內經驗的日本人，又多了一種國際經驗，他們終於勇於從日本加害亞洲各國的立場重新看待日本政府間接支持越戰的事實，這種動向已在八月十五日紀念集會上表現出來。往後的八月十五日紀念集會，便由越南和平市民聯合會、海神會、國民文化會議等團體擔綱領導。有關禁播「徹夜長談」節目的經緯，請參見市民聯合會編的《ベトナムに平和を》，收錄在《資料「ベ平連」運動》上卷（河出書房新社，一九七四年）。

102. Patricia Thompson, "A Story of England at War," *The Gazette*, Montreal, Canada: November 10th, 1979.

\*戰前日本不是陸海空三軍制，而是陸海二軍制，除了陸軍省外，還有海軍省，陸軍省加上海軍省類似台灣之國防部。

#指戰場訓示。

※類似台灣的教育部。

道》，均被視為軍國臣民應具備的德目，不但受到大肆讚揚，甚至還強迫灌輸，把它當成小學生理想教育的根本。《戰陣訓》是在當時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的監督下編纂的，他提出明顯不同於明治初期發表的「軍人敕諭」的觀念：士兵要絕對服從天皇，不可被活抓；同時暗示士兵的家屬，必須要有覺悟，有時候因某種狀況，戰歿者的屍體仍無法送回家中。教師們將這種做為軍國國民的德目，強迫灌輸給小學的少年男女，正好扮演著相當於軍隊組織的上級角色。在學童們於戰後發表的疏散感言中，適時保護兒童的慈祥老師僅佔少數。這類扮演上級角色的教師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這天突然「見風轉舵」的舉動，無形中讓這些學童對叛離目標的教師們留下難忘的印象<sup>103</sup>。有趣的是，學童們過去使用的教科書，不只教導修身，也包括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科在內的教科書，都必須把讚揚日本國家體制的內容全部塗黑之後，才准予使用；除此之外，先前教導學生為了維護國家體制隨時要有「玉碎」覺悟，並且在背誦敕語時稍有差錯便加以痛毆的教師們，現在卻把確實可靠的科學理念當成佔領軍直接傳授的真理，灌輸給學童們。日本投降時，六歲至十五歲的兒童和少年，大都不信任上述的成年領導者，其後這種觀念也用來質疑這些領導者。他們強烈質疑佔領軍的聲音也值得我們注意。一九六〇

年，戰時領導者岸信介出任首相，重新締結「日美新安保條約」時，他們便組織起體制外的主要抗議團體。五月十九日，岸信介及其帶領的自由民主黨，在眾議院以多數表決通過日美軍事同盟的議案，這是合法的法定程序。在野黨強烈要求再三討論這個議案，但岸信介首相卻認為不能再等，因為他準備配合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問日本的行程，把通過的日美軍事同盟當成禮物送給艾森豪。岸信介採取的手續雖然合法，但是由戰時的內閣大臣，也就是現在的首相，以多數黨為恃而強行通過的軍事協定，終於喚起民眾史無前例、自發而廣泛的憤怒。抗議的群眾包圍國會長達一個月之久。根據報導，事態達至

103. 山中恒從這個經驗出發，並翻印同時代的相關資料，寫成《ボクラ少国民》五集：《ボクラ少国民》、《御民ワレ》、《撃チテ止マム》、《欲シガリマセン勝ツマデハ》、《勝利ノ日マデ》（辺境社，一九七四—七九年），還把三十年後會見當時少年男女的採訪稿寫成《戰中教育の裏窓》（朝日新聞社，一九七九年）。

戰爭時期學童疏散的相關著作有：中根美恵子《疎開學童の日記——九歳の少女がとらえた終戦前後》（中公新書，一九六五年）、月光原小学編《學童疎散の記録》（未來社，一九六〇年）。另外，根據當事者的經歷寫成的長篇小說，最早的首推柴田道子的《谷間の底から》（東都書房，一九五九年；後來收入「岩波少年文庫」，一九七六年出版）。

頂點的六月四日，在日本全國舉行抗議示威的群眾有五百六十萬人。眾議院通過此案生效的六月十八日，有三十三萬人包圍東京的國會。這可說是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抗議國會行動。在這場抗議運動中，學生團體在三天前的六月十五日闖進國會，東大女學生樺美智子（1937-1960）在學生團體與警察機動隊爆發的衝突中死亡。當時艾森豪總統已在訪日途中，而且已抵達菲律賓，當他得知樺美智子的死引發強烈的抗議運動之後，遂取消訪問日本的計劃。岸信介首相也因而被迫下台辭職，但是「新安保條約」已通過立法，日本牢固地被置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

那時候，日本和中國的「戰爭狀態」尚未結束，也沒有簽訂和平條約。在這種狀態下，又在沖繩設置美軍基地，從當時中國的立場來看，整個日本正隱藏在沖繩的背後，無疑對中國形成軍事威脅。這個事實的認定，導致日本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政府行動。我們要問，當時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士參與抗議行動的？粗略而言，在抗議運動風起雲湧的一九六〇年，過半數的日本國民都有經歷十五年戰爭的記憶，而這些記憶從日常的睡眠狀態中重新被喚醒<sup>[1]</sup>。整體來說，參加抗議的學生和市民，並不是回應國會裡面左翼政黨的呼籲，才參與抗議行動的。在學生中，最激進的團體屬於「共產主義者

同盟」，這是一個獨立於日本共產黨之外，並與之持批判態度的組織。在這場叛亂中，無論是共產黨或社會黨，他們對抗議行動的影響力可說微乎其微。反對運動的高潮，隨著岸信介辭職、池田勇人出任首相之後，漸趨平緩下來。眾所周知，池田勇人向來以身段柔軟著稱，他的主要政策在於如何提高日本國民的所得。反對運動如此偃旗息鼓，顯示出大眾的抗議並非基於意識型態，而主要是源於岸信介首相必須負起十五年戰爭的責任，以及日本人愧對中國人的罪惡感，撕破了舊日傷痛所致。這個抗議運動最具象徵的女性——樺美智子，去世時才二十二歲，是東京大學日本歷史研究所的學生。戰爭結束的時候，她僅是七歲的小學二年級學生<sup>105</sup>。

另一個同屬於共產主義者同盟，代表當時激進主義學生的是柴田道子（1934-1975），她寫出了日本第一部以學童疏散為主題的小說《來自谷底》（《谷間の底から》，一九五九年）。當

104. 美國的報紙沒有掌握到這方面的動態。日高六郎編《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岩波新書，一九六〇年）。

105. 樺美智子（1937-1960）的遺稿，由樺光子編成《人知れず微笑まん》一書（三一書房，一九六〇年）出版。

時，有讀者寫信告訴她「被歧視部落」<sup>\*</sup>。長期以來在日本遭受歧視的慘境。她在查訪和紀錄被歧視部落民眾的心聲以後，寫成《被歧視部落的傳承與生活》（《被差別部落の伝承と生活》，一九七二年）一書。就在「被歧視部落」出身的青年，被控涉及強姦殺人案而引發狹山事件<sup>4</sup>時，她更是傾其全力營救這名青年，動員組織向有關當局抗議，卻在一九七五年因舊疾氣喘復發而死。當一九六〇年的抗議運動走向式微，整個日本沉浸在經濟繁榮的氛圍裡，許多早年參與抗議運動的人，都被埋進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但是柴田道子仍在自己的道路上前進，持續支援少數團體的運動。佔日本社會壓倒性多數，並具有中產階級意識者，始終排擠著這些勢單力薄的團體。柴田道子婚前是一名公司職員，後來成為律師的妻子。戰爭結束的時候，她是十一歲的小學六年級學生。確切地說，樺美智子和柴田道子無論在其所屬的激進派團體內，或就領導整個戰後日本的年長領袖而言，她們已經從從男性領導的制約中超越出來了<sup>100</sup>。

今天，新的一代已經出現，比那些在日本投降及戰後不久，讀過塗黑教科書內容的人，還更加年輕。在戰爭期間長大成人和戰後成長的世代間，約有十年左右的世代差異；這些年輕的世代，今後仍會對年長的領導者抱持不信任的態度吧。其實，這些年齡層的



人無關乎是無黨派或激進派，不信任感已成為他們的心理特徵，而且在今後數年的日本社會裡，這個年齡層將扮演重要的角色。<sup>107</sup>

根據曾參與勞工運動組織的大野力指出，逃出都市空襲的日本人有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人因為強烈感受過戰爭的殘酷，在戰後對反戰運動都抱持強烈的道德意識；第二種類型的人，則因為親眼目睹自己的家屋輕易地被戰火燒個精光，以致衍生出今後要培養興建不易燒毀住房的技術之動機。戰後成長的世代在這兩種類型中，比較接近戰爭

\*指過去受迫害、歧視的特殊部落，受封建社會遺留的偏見的影響而無故遭歧視的地區。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埼玉縣狹山市發生了川越高中高一女生遭綁架殺害的命案。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身「被歧視部落」的青年石川一雄（當時二十四歲）被控涉嫌遭到逮捕，一審被判死刑，被告律師團堅稱被告無辜，要求重審。但後來仍被判無期徒刑定讞，被告亦服刑，現已假釋出獄。這事件被稱為「狹山歧視性審判」。

106. 柴田道子（1934-1975）的遺稿集《ひとすじの光》（朝日新聞社，一九七六年）。

107. 北川修（1946）就讀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時，即組織民歌改革會，一九六七年，以唱片歌曲へ帰つて来たヨッパライ（走紅整個日本，成為戰無派（指未經歷二次大戰者）的代表性人物。著有《戰爭を知らたい子供たち》（プロンズ社，一九七一年，另有角川文庫版）。

時期成長者之中的第二種類型，換句話說，他們較具「技術心性」<sup>108</sup>。一九七七年，文學評論家江藤淳（1933-1999）一再主張，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發生的事，對日本這個國家並非是無條件投降<sup>109</sup>，因為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所以日本政府的決定是有條件的投降。在江藤淳看來，那些把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成前提而展開所謂日本戰後文學的主流作品，全是贗品，它們將在現今明顯事實的強光照耀之下逐一潰散！對出生在戰後六〇年代以後，在經濟繁榮中度过安定生活的年輕世代來說，江藤淳是一個極富魅力的文學評論家。他欲極力批判的是，以《近代文學》為首的作家們所寫，代表日本戰後文學主流的作品。江藤淳選定的主要論敵就是撰寫《轉向文學論》（一九五七年）和《簡明戰後文學史》（一九六六年）的本多秋五（1908-2001）。江藤淳逐一點出戰敗後許多評論家沒能看出的若干細微事實，並認為無論是勝者或敗者，都應該把波茨坦宣言的條件當成基準並加以遵守。可是如國際法學者高野雄一所指出，波茨坦宣言中准予日本民主化<sup>\*</sup>，是同盟國對日本提出的條件，而不是日本和同盟國談判的結果<sup>110</sup>。因此，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所定的投降條件，以及承諾陸軍和海軍的無條件投降，正是這個事實的留存。進一步說，同盟國和日本的意圖在於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發生的事實，當成日本的無條件投降。

後者，也就是日本政府方面對八月十五日的事實認定，已清楚表現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日本報章雜誌刊載的各類意見上。其中，有些文章使用「無條件投降」一

108. 大野力〈戰爭責任についてのシムボジウム〉（思想の科学研究会，一九五九年夏季大會上の發言）。

109. 江藤淳把他和戰敗時擔任日本政府重要官職者的對談內容，以連載的形式刊載在一九七七年《現代》雜誌上，將近一年。他在對談中說：「無條件投降的是陸軍和海軍，而不是日本國。所以我堅信，日本是接受波茨坦宣言明示的七個條件而投降的。」

江藤淳《もう一つの戦後史》（講談社，一九七八年）。他根據這個論點，反駁戰後文學最具代表性的評論家本多秋五。江藤淳《忘れたことと忘れさせられたこと》（文藝春秋，一九七九年）。

本多秋五的反駁文章，參見《「無条件降伏」の意味》（《文芸》一九七八年九月号）、《江藤淳氏に答える》（《毎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八日晚報）。

\*即言論、宗教、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

110. 國際法學者高野雄一批判江藤淳的推斷，見於《無条件降伏論争の問題点》一文（《朝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三日晚報）。

國際法學者批判江藤淳的文章，還有松井芳郎寫的《喪失の戦後史と戦後史の喪失》（《科學と思想》第三八号，一九八〇年一〇月）。

詞，佔領軍當局也未予否定。正因為同盟國領導者執著於「無條件投降」，所以從軍事觀點來看，才使得戰歿者增加到不必要的地步，這個事實正是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中強烈主張並視為整體的結論。他在該書最後一節這樣寫道：

於是這個「不需要的戰爭」，儘管不需要，卻又延長下去，更有數百萬計的生命做了不必要的犧牲。而最後的和平適足以產生新的威脅，和對於另一次戰爭的恐懼。為了迫使對方「無條件投降」，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做了不必要的延長，其結果只是使史達林坐享其利——開闢道路好讓共產黨支配中歐。

江藤淳的論點目標，主要著眼於那些沒有戰爭記憶的日本新生代讀者，比起戰後活躍的文學評論家，他能夠用更高的敬意看待明治以後的日本遺產。仔細分析戰爭期間的事件，剛好可以凸顯明治以後的傳統及其未竟之處。針對本多秋五的這種批評，江藤淳已藉由否定日本無條件投降，引起了雙方支持者的論戰。依我看來，他的論點今後將會透過世代間的對話被延續下去。最後一提，以上的論述純屬我個人的見解。

## 回顧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我在接觸「日本戰爭時期精神史」的時候，都把重點集中在「轉向」的範疇，或許這可說是我研究「轉向論」的方法吧。有個學者曾試圖對學術方法的過度繁瑣提出警告，並故意提倡所謂「松果<sup>\*</sup>學」的創新之見，也就是對各種類型的松果，進行嚴密分析與分類的方法。也許在各位看來，「轉向論」和「松果學」同樣是毫無益處、令人繁瑣的論述。不過對我而言，所謂「轉向論」，或者更簡單地說，研究轉向，是瞭解自我所處的位置之後，在嘗試探索周遭知識環境時，對我幫助甚大的方法。這不僅有助於我論述和評價戰後的日本，也同樣幫助我論述和評定明治以後的日本。尤其在理解日本以外的各國文化思潮發展過程中的事件時，這種方法對我而言更是一種指引。

\*松果，意指學術。

這也可以把它擴展為比較轉向論。姑且不論好壞，只要國家強制力的運作和個人的自發行為並存時，在這兩種力量的交互作用下，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各種型態的「轉向」。

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的方法是失敗的，但我仍盡全力把「轉向研究」限定在用紀錄的方式，以此來對照國家權力的動向和個人選擇的軌跡。這種實例研究，有助於預測和釐清我們即將面對的各種困難。

這裡有一本李莉安·赫爾曼在一九七六年出版，題為《無法安眠的時代》的書<sup>11</sup>。這本書主要描寫當時的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在戰後整肅共產黨分子的行徑。一九五二年，李莉安·赫爾曼收到必須向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報到的命令，同樣遭到傳喚的有劇作家克利福德·奧德茲。去眾議院之前，他邀請赫爾曼在一家叫巴爾貝塔的餐廳用餐，他說：「仔細聽好，我教妳怎麼應付委員會那些傢伙，最好讓那些傢伙看清楚：什麼樣的人才激進主義者。」奧德茲是一九三〇年代以《醒來歌唱》這齣戲劇聞名的左翼作家，也是鼎鼎大名的奧裔電影女星露易絲·蕾娜（Luisa Rainer）的丈夫。後來，他寫了一齣叫《前程似錦》的戲劇，由威廉荷登（William Holden）主演，並搬上銀幕，在我學生時

代是一部非常有名的電影<sup>11</sup>。但是在李莉安·赫爾曼應訊的前一天，奧德茲卻已親身在眾議院非美委員會裡，在會中他為自己過去的錯誤信念致歉，並作證指出他的許多朋友都是共產黨員。李莉安說：「所以，我愈來愈搞不懂他在貝爾特餐廳講的一席話。那天晚上，他也許相信自己對我說的話。可是幾個星期過後，在面對可能犧牲自己在好萊塢的前途時，他只好改變自己的決定。我忍不住要說，陳腔濫調現在愈來愈大行其道了！電影製片廠的主管們都知道，對許多人來說，要捨棄自家庭院的游泳池、網球場、收藏的名畫，以及面臨即將到來的貧困，無非是極其痛苦之事，所以他們就拿它充當有力的武器。」

幾個星期之後，導演伊力·卡山（Eli Kazan）向赫爾曼表示，他打算到非美活動委員會充當「合作的證人」，因為若不這樣做，他就沒辦法繼續在好萊塢拍攝電影。

11. 李莉安·赫爾曼（Lillian Hellman）著，小池美佐子譯《眠れない時代》（サンリオ，一九七九年）。

Hellman, Lillian, *Scoundrel Tim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1976.

12. Odets, Clifford (1906-1963) 《やぶに歌え》（*Awake and Sing*, 1935）、《ゴールデン・ボーイ》（*Golden Boy*, 1937）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早上，李莉安·赫爾曼到非美活動委員會應訊。應訊時，她只回答有關自身問題的詢問，凡涉及他人的詢問，她一概保持沉默。在麥卡錫掀起獵共風潮的時代裡，赫爾曼是第一個有所堅持的證人，因為她回答委員會的詢問時，拒絕構陷他人入罪。在赫爾曼之後，也出現了像劇作家亞瑟·米勒那樣採取同樣立場的人<sup>113</sup>。另外，更有像多爾頓·特朗波那樣決不妥協的硬骨頭，由於當時他掛名所寫的劇本已被好萊塢的高階主管拒用，只好借用他人之名繼續撰寫劇本<sup>114</sup>。總之，在麥卡錫的獵共狂潮中，赫爾曼是第一個敢與之對抗的女性，因此可說是意義非凡。

赫爾曼在應訊作證之後，無論在個人生活或財務上，都蒙受重大的損失。因為她必須賣掉持有的農場，在沒有現金收入的情況下，過了中年，仍得在百貨公司打工維生。當時，達西爾·哈梅特和她住在一起，他就是《馬爾達之鷹》和《沒有影子的男子》等偵探小說的作者<sup>115</sup>。他是因為拒絕作證舉出「人權會議」等組織在籌募保釋公積金時捐款者的姓名，而獲罪入獄的。

回顧麥卡錫獵共的時代裡，赫爾曼說出這樣的感想：「自從我第一次踏上國會的大門，以及後來在這時代發生的種種事情，我付出了龐大的罰款。我對自由主義抱持的



信念幾乎喪失殆盡了，但相對的，我也得到了某種微妙的啟示。我很難說清楚這種感受，姑且稱它是一種『正直』吧。」赫爾曼還說，其他國家並沒有像美國那樣掀起所謂的獵共運動。她說到其他國家的時候，主要是指英國，但在她的腦海中，日本顯然榜上無名。

113. Miller, Arthur (1915-) 戲劇《セールスマンの死》(Death of a Salesman) · 一九四九年：《ゴッホ》(The Crucible) · 一九五三年，取自十七世紀獵逐女巫的故事，來描寫置身在美國獵共運動中的感受。

114. Trumbo, Dalton (1905-1976) · 在一九四七年麥卡錫獵共運動中，他被指名為美國電影界十個不合作者之一，由於他拒絕在聽證會上作證而遭到叛刑。後來，他易名撰寫劇本，以羅伯特·里奇(Robert Rich)之名所寫的〈黒い牡牛〉獲得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九屆)奧斯卡編劇獎。六十年代以後，開始用本名寫作。一九七一年，他把自己的小說〈シヨニーは戰場〉(Johnny Got His Gun)改編成電影劇本，自任導演，榮獲坎城影展最佳評審獎和國際評審團獎。

115. Hammett, Dashiell (1894-1961) · 十四歲起開始工作，當過報童、鐵路雜工、碼頭工人等。一九二九年出版長篇偵探小說《赤い収穫》(Red Harvest)。隨著《マルタの鷹》(The Maltese Falcon) · 一九三〇年)和《影なき男》(The Thin Man) · 一九三二年)被改拍成電影之後，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作家。為冷硬派(Hard boiled)的先驅者。出獄以後，未再發表作品，最後酒精中毒而死。

在此，我想起大學時代的一個同學，在日本戰敗不久以佔領軍的身分到日本來，他告訴我：「美國最惡劣的時代來臨了。美國歷史上即將出現第一個『大政贊翼會』。」當時，他們應該可以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教訓。在這一點上，我這位朋友是頗具洞察力的，至少當時美國培養的所謂日本專家和日本學者智囊團，尚未培養出具有如此敏銳與氣度的日本專家來！

話題再回到李莉安·赫爾曼。她最早的重要戲劇《孩子的時間》〔*The Children's Hour*〕處理的，就是何謂「正直」的主題。後來，作者卻在現實生活中上演了這部戲劇。這是一齣以同性戀為主題的戲劇，劇中描寫兩個大學時代為同學的女性經營一所私立學校，但她們卻為學生人數的減少而坐困愁城。因為有惡劣的謠言攻擊說，學校有兩名老師是同性戀者，使得學校不得不關門大吉，最後甚至導致一名老師自殺身亡。那名老師在自殺前，告訴她的朋友，自己有同性戀的傾向。不久，她為這位朋友舉行葬禮。此時先前因聽信謠言而遠走的未婚夫，突然出現在這名女老師的面前，安慰她說，現在已證明那件事只不過是謠言云云。但只見這名女老師不理睬未婚夫，便轉身離去。對劇中的女主角而言，只聽到同性戀的流言就一走了之的未婚夫，根本不是一個正直的人，也不值得她

繼續關注。這齣戲劇的結構和它在劇中所展現的「正直感」，與作者身處麥卡錫獵共風潮中的處世之道極為吻合。

麥卡錫的獵共風潮也波及到加拿大的犧牲者——E·H·諾曼。查理·泰勒所寫的《六個旅程——加拿大的型態》對諾曼的一生有精闢的分析<sup>116</sup>。

諾曼是加拿大傳教士的兒子，生於日本的農業地區。三〇年代，他赴英國的劍橋大學研讀，成為共產黨研究會的一員。那是西班牙爆發內戰的年代（1936-1939）。當時，在諾

116. Norman, E. H. (1909-1957). 僅在日本有出版全集。大窪愿二編譯《ハーバート・ノーマン全集》（岩

波書店，一九七七年）。全集第四卷末

附有大窪愿二的《覚書ハーバート・ノーマンの生涯》。

對諾曼因為承受政治重壓，進行分析的有：馬場伸也《二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狭間で——占領とノーマン》（《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国際政治学》東京大学出版，一九八〇年）。

英語版的《諾曼傳》似乎仍在準備中，至今可信靠的是Taylor, Charles, *Six Journeys: A Canadian Pattern*, House of Anansi Press, 1977（後來有出版R. W. Bowen Edity, *E.H. Norman: His Life and 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日譯版《E·H·ノーマン》（補注：リプロボート著、中野利子譯，一九九〇年出版）。

曼看來，共產主義是防堵法西斯主義唯一的道路。離開劍橋大學之後，他去哈佛大學攻讀博士課程。他的博士論文《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被選入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的專門論文叢書，並出版問世。這個時期，他的觀點從共產主義轉為自由主義的立場，他是抱持這種思想立場進入加拿大外交部的。日本投降之後，他旋即被派往日本協助佔領軍的工作。佔領後不久，他在日本監獄和十五年戰爭期間貫徹「非轉向」的共產黨員會面。麥克阿瑟根據諾曼直接提供的資料，越級批判當時日本政府的政策，並下令：釋放所有戰前即被日本拘禁的政治犯。在佔領的最早階段，E·H·諾曼在同盟國的管理中，是精通日語的少數人才，且能充分運用那些可作為判斷基礎的調查資料，當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他的所有建言，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並非照單全收。例如，諾曼反對在東京大審中判決死刑。他認為對那些在這次野蠻戰爭中，必須負起責任的領導者所處的最重刑罰，以褫奪公職最適當。這種詩人般的正義感充分展現出諾曼的價值意識。

佔領時期展現巨大影響力的諾曼，在往後的時代逆流中遭到了報復。在他擔任加拿大駐日大使不久後，受到佔領軍內部左翼分子的流言中傷，而被加拿大皇家騎馬警察訊問。獲得清白之後，他被任命為紐西蘭的高等事務官。後來，加拿大政府得知諾曼的經

歷沒有瑕疵，於一九五六年任命他為加拿大駐埃及大使。當時，埃及正處於英、法為了蘇伊士運河，對埃及大舉進攻所引起的混亂局面\*。由於加拿大總理雷斯達·比亞森<sup>†</sup>採取讓聯合國軍隊介入交戰雙方陣營，以維持和平的外交政策，諾曼成功地說服了埃及總統納瑟<sup>‡</sup>，達成任務。可見諾曼並沒有對埃及的理想失去支持。而加拿大登上世界的外交舞台，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不過，在麥卡錫影響下的美國，又有了另一個理由搬出舊日流言。當時，美國參議院國內治安小委員會召開了一系列公聽會。參議員們意有所指地認為，諾曼於過去盟軍佔領日本時，在獄中會晤過日本共產黨領導者，是基於他和蘇聯政府之間的秘密協定。該委員會傳喚諾曼的舊友們在公聽會上作證，主要目的是給他的舊識和朋友造成一種印象，認為諾曼就是協助蘇聯惡毒秘密計劃的爪牙！我們可以看出，召開這樣的公聽會，在於抹殺諾曼在埃及所做的努力。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清晨，諾曼從位於開羅的九層公寓樓頂躍身而下。他在留給哥哥哈瓦德（Howard）的信中寫道：

\*指發生於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是由英、法、以聯軍對埃及的戰爭。

† Lester Pearson，加拿大第十四任總理，因調停蘇伊士運河戰爭，而在一九五七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 1918-1970，為埃及第二任總理。

我正被目前的處境所壓垮，覺得生活在幻影中已經太久了。我自覺到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之路，請原諒我！因為事情不像外表那麼糟糕。神知道這種做法太過分了。不過，我從不曾違背我自己的忠誠誓約。可是因為交往而加在我頭上的罪，現在把我壓碎了。

或許都太遲了，但我仍祈願能得到神的寬恕。

諾曼在寫給哥哥哈瓦德和兄嫂奎恩（Gwen）的第二項備註中，再次為他的無辜補上一句：

很遺憾，我沒能撐忍下去，但是我對基督的信仰，一直支持我走到最後的日子。

我們從李莉安·赫爾曼和E·H·諾曼的例子可以得知，其實轉向的問題不只發生在戰時的日本境內，也發生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像蘇俄的布哈林\*、索忍尼辛#和中國的

老舍<sup>\*</sup>的遭遇就是最好的明證。在這之前，我很少引用日本以外的例子，但我認為透過與國際實例的比較，將來較能帶來具體成果。在我們探討日本現代史的短暫時間裡，日本戰後轉向的現象，比一九三〇年代德國共產黨員的轉向，更接近於同年代的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員轉向的軌跡。在戰後的日本，激進派學生並沒有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極端的傾向。這種分類是根據格布利·阿蒙德在《共產主義的魅惑》中所整理的分類法<sup>17</sup>。之所

\* 1888-1938，共產主義的重要倡議者，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開除黨籍，並處以極刑。

# 1918，曾遭受政治迫害而被監禁和流亡。

※ 1899-1966，中國現代作家，遭受文革迫害而投湖自殺。

17. Almond, Gabriel Abraham (1911-) ·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比較轉向論」在學術上能發展到什麼程度，我不得而知，但我們仍可以繼續努力，把日本十五戰爭期間發生的事件，參讀以下：比如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の周作人》（筑摩書房，一九七八年）、益井康一《漢奸裁判史：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みすず書房，一九七七年）、D·J·史汀巴克《第二次世界大戰下のフィリピン人の対日協力》（マニラ、ソリダリダート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等著作。雖然我不認為從這些著作可以得出根本意義的判斷，但仍希望藉此闡出共同論述的場域。

以有這種變化，是因為日本的社會結構在日本投降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整個社會對那些極力批判現存秩序的激進者，不再長期監視或在意識型態上予以歧視，而是採取更柔性寬容的態度。

要探知是否有「轉向」之實，有許多種方法。一種就是日本共產黨在面對黨員轉向時所採取的方法。在他們看來，凡是脫離本黨思維邏輯的黨員，就是轉向和背叛，亦即沒有運用科學的觀點來掌握社會現狀。日本共產黨只把「轉向」限定在一九三〇年代發生在日本的特有現象，他們認為：這是絕對主義之半封建主義的天皇制，和共產黨員鬥爭中發生的事態。這時候，所謂的轉向，是指激進主義者屈從於天皇的權力，沒有成功地運用科學的觀點掌握一九三〇年代的日本狀況，同時又偏離基於日本共產黨方針，應明確指示普羅大眾的階級觀點。吉本隆明試圖對既定的轉向觀點提出反論，在他看來，所謂的「轉向」，就是知識分子投身現代日本社會結構中，進行思考失敗後，在知識分子間造成的觀點轉移。吉本隆明透過這個定義，把無法有效解決一九三〇年代的所有狀況，都納入轉向的範疇。這時候，「轉向」便成為一切非有效思考的另一代稱，其中還包含共產黨員在獄中進行的「非轉向」。我則把「轉向」看成國家行使強制力的結果



——在個人或某團體中造成的思想變化。這可做為一種指引，以便記述各種狀況下發生的不同型態的「轉向」。為了找出「轉向」的特徵，我們可以記述國家權力的特質及其如何行使強制力，和個人回應國家暴力時的思想變化。至於「轉向」本身在本質上是好是壞，不以這種定義來判斷。然而，在我記述戰時的「轉向」時，我一直希望能夠從轉向後出現的各種思想中，看到意義豐碩的事物。而指引我思想的，就是在當前中國聲名惡劣的孔子\*，其《論語》中的那句話：「觀過斯知仁矣。」

現在，我再歸納一下上述的話，我們探討的問題是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戰爭時期日本的思想歷程。在這十五年期間，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支配著日本。日本政府不努力在日本內部進行社會改革解決困難，卻選擇了用軍事向外擴張的道路。這是政府採行的國策，而配合這些國策使其理論和正當化的任務，便落在日本知識分子的肩上。為了達此目的，日本政府甚至動用包括下獄在內的各種暴力。方法上，下獄所以奏效，在於政府領導者巧妙地利用長期成為日本傳統的鎖國性格。這種傳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實施近代化之前的德川時代。「鄰組制度」的引進便是其開端，流言和思想的自由表現從此

\*指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揚秦的思想。

受到箝制，大眾輿論也逐漸被規格化。在這種「舞台裝置」中，先前的激進派和以進步思想自居的「東大新人會」輕易地屈服了，甚至改變自己的思想，為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國策宣傳。這就是一九三〇年代「轉向」最普遍的型態。

十五年戰爭期間，持續的抗議和抵抗仍可見諸於其他地方。在此，鎖國性格的傳統以另一種方式復活。眾所周知，北一輝和權藤成卿都是日本超國家主義的理論家<sup>118</sup>。北一輝提倡利用天皇的軍隊促使國民的收入平等化，並在天皇的名義下，使日本走向社會主義化。正因為主張這種思想，使他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被套上與改革派軍官謀反事件勾串的罪名，而遭到處死。就權藤成卿而言，他所主張的傳統式國家主義在於恢復舊有的習俗，以便使衣、食、住得到確保。他把基於徹底農業化的自治，當成超國家主義的思想基礎。權藤成卿的理論不僅和被視為保守學者的柳田國男的理論有密切關聯，也跟明治後期最早的社會主義倖存者——也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家石川三四郎淵源頗深。在「東大新人會」方興未艾之際，石川三四郎用不同的方式來詮釋該成員高喊的所謂「民主主義」的口號。他把「democracy」翻譯成漢字的「土民主義」，意思就是依土地生活的自治。他對「民主主義」的解釋，和當時的學生運動形成對立。由於石川租了六百坪的土地種菜，才得以在漫長的戰爭時期維持自己的生活，一直活到八十歲。甚至在七十歲那年，自

己還爬上高處修理屋頂。因為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活，使得他不必只靠寫作來確保自己的生活所需，也不必在戰時的著作中附和政府的國策。他勸私下前來向他求教的訪客，採取逃離軍隊或非暴力怠工的方法<sup>119</sup>。柏木義圓也是明治時代社會主義的倖存者之一，他當牧

118. 北一輝（1883-1937）違反統治階層的意圖，故意用字義「一君萬民思想」來解釋明治以後的天皇制，藉此突破中央強權，開啟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權藤成卿（1866-1937）提示日本自古以來統治階層即有體恤百姓的思想，試圖藉此打開現存制度的改革之路。《北一輝著作集》全三卷（みすず書房，一九五九、一九七二年）。五十嵐曉郎編著《「北一輝」論集》（三三書房，一九七九年）。有關北一輝的事蹟，我先受教於久野收先生。久野收、鶴見俊輔《現代日本の思想》（岩波新書，一九五六年）。傳記方面有：田中惣五郎《日本フアジズムの源流——北一輝の思想と生涯》（白揚社，一九四九年），同《增補版北一輝——日本のフアシストの象徴》（三三書房，一九七一年）、渡邊京二《北一輝》（朝日新聞社，一九七八年）、松本健一《若き北一輝》（現代評論社，一九七五年）。《權藤成卿著作集》（黑色戰線社）一九七二年起已出版至第七卷。另有瀧澤誠《權藤成卿》（紀伊國屋新書，一九七一年）、瀧澤誠《近代日本右派社会思想研究》（論創社，一九五五年）等傳記。
119. 石川三四郎（1876-1956）。《石川三四郎著作集》全八卷（青土社，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未收錄其中的文章可參閱《石川三四郎選集》全一〇卷（黑色戰線社，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傳記：北澤文武《石川三四郎の生涯と思想》全三卷（鳩の森書房，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補注：大原綠峯《石川三四郎》リプロボート，一九八七年）

師維持生計，透過他主編的小型刊物《上毛<sup>\*</sup>教界月報》持續批判中日戰爭<sup>120</sup>。這份雜誌時常遭到查禁。不過，由於他敦親睦鄰和親切待人，直到死前仍受到鎮民們的愛戴，這並不是因為他的非戰思想，而是來自他溫和的品格。出身律師的正木寬持續出版個人雜誌《接近》<sup>121</sup>，他在雜誌中徹底追查戰時一名嫌犯被警察拷問致死的經過，最後證實警方確有刑求之實<sup>\*</sup>。他的批評時常集中在特定的焦點，用實證的方法加以檢證。因此，他才能持續出版《接近》直到戰後的歲月。桐生悠悠也是在死前透過一份小刊物持續批判戰爭的獨立新聞記者之一<sup>122</sup>。另外，辻潤這名大正時代僅存的達達主義者也值得注意。他公開表示，從不相信大正時代以來的政治口號，更不相信任何政治上的意識型態。外來的各種進步思想就像頭垢般從他的頭上掉落下來，可是政府強迫灌輸的軍國主義也沒有佔據他的腦海。他手拿洞簫過著乞丐般的生活，在戰爭末期因飢餓而死<sup>123</sup>。

\*上毛為「上毛野」地名的略語，即上野國的古稱，現今的群馬縣，也就是該刊物的創辦地，該刊物由「上毛教界月報社」出版。

120. 柏木義圓（1860-1938）著作方面：《柏木義圓集》一卷、二卷（未來社）。傳記：伊谷隆一《非戰の思想》（紀伊國屋書店，一九六七年）。柏木持續出版的雜誌叫《上毛教界月報》。

# 批判時局的雜誌。一九三七年創刊，一九四九年十月停刊，共出版九十八期。

121. 正木ひろし (1896-1975)。十五年戰爭期間持續出刊的個人雜誌《近きより》全五卷 (旺文社文庫，一九七九年) 已重印出版。傳記：家永三郎《權力惡とのたたかい——正木ひろしの思想活動》(三省堂，一九七二年)。

※指著名的「八海事件」。一九五一年，山口縣有個老婦人慘遭殺害，一名青年遭警方逮捕後旋即被判刑取供，該青年因不堪拷問，供出四名無辜的童年玩伴。正木寬見義勇為擔任其辯護律師，他們四人終於一九六八年十月獲判無罪。另外，為了證明警方確有刑求導致該名青年嫌犯致死，正木寬帶著醫生至墓地開棺，斷其頭顱化驗 (即著名的「斷頭驗屍案」) 後，證實警方敗訴。

122. 桐生悠悠 (1873-1941)。個人雜誌《他山の石》(一九三四—四一年)。《畜生道の地球》(三啟社，一九五二年)。《桐生悠悠々反軍論集》(新泉社，一九六九年)。《桐生悠悠々自伝》(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版会，一九七三年)。傳記：太田雅夫《桐生悠悠々》(紀伊國屋新書，一九七〇年)、井出孫六《抵抗の新聞人桐生悠悠々》(岩波新書，一九八〇年)。

清澤洸 (1890-1945) 不像柏木義圓、桐生悠悠和正木ひろし那樣在戰爭時期不斷地透過個人通訊批判軍方，他雖然受到軍方壓迫失去發表的園地，但仍持續透過日記批判戰爭，在戰爭期間去世。他的《暗黒日記》全三卷 (評論社，一九七〇—七三年)。(補注：《清沢洸》中公新書，一九八七年)

123. 辻潤 (1884-1944)。《辻潤著作集》(オリオン出版社，一九七〇年)。傳記：三島寬《辻潤》(金剛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玉川信明《評伝・辻潤》(三一書房，一九七一年)。折原脩三《「老いる」の構造》(日本經濟評論社，一九八一年)一書中，有述及辻潤及其兒辻誠之間的思想傳承。

後來，福島鑄郎、大久保久雄合編《大東亞戰爭書誌》全三卷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一九八一年)、及其

上述的例證也可作為無效的社會主義和無效的自由主義的例子。但這時候，我們必須記住，正是這種試圖對狀況發揮作用的慾望，才使得眾多大正時代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代表性評論家，變成十五年戰爭期間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領袖。這些無效的抗議和抵抗的各種方法，都是試圖恢復明治以前鎖國時代文化傳統所做的嘗試，而這個傳統始終留存在東條英機政權無法剷除的思想和感情深層裡。因此，這些方法才得以在戰時的鎖國狀態中，以另一種鎖國狀態保存下來。而且這種鎖國狀態的傳統，在日本投降及被盟軍佔領後的和戰時截然不同的狀況下，仍顯示出一條可以充實獲致發展下去的道路。

日本只有小得無法與美、俄超級大國相比的軍備，絕不能仰賴軍事的強制手段，必須尋求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這種展望可以避免戰時利用鎖國狀態，走向軍國主義的凝聚和向外擴張的道路。但無論是留在日本的大批朝鮮人、戰爭期間比本土居民遭受更大災難打擊的沖繩住民，或身受原子彈遺害的受難者，他們對作為精神遺產的十五年戰爭，都持否定的態度，而這種戰前日本人不敢想像的態度卻有助於改造鎖國狀態的傳統。戰爭期間高倡的思想方式，在獲致足以與源自西方思想的體系較量的自信後，進而

把日本的傳統美化成絕對的普遍原理。這是扭曲日本傳統導致的結果。事實上，日本傳統有一種特徵：無論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時代，都避免用同一種方法去結合或束縛他人。這種消極的特性也是日本思想的長處。不勉強的、以普遍的原理看待事物，在日本的村落培育出一種傳統：只要對方是村中的住民，就不會因其思想有異而排斥他。經由集中解決目前的具體問題，面對地球上不同民族間的思想互動時，我們用日本人的作風——沿襲日本傳統的方法，或許可以發揮作用。這是在西方各國知識傳統的基準下，不大受到尊敬的另一種知性狀態。

李莉安·赫爾曼受到參議員麥卡錫的攻擊後發現，美國知識分子間的自由主義傳統是何等薄弱。毋寧說，她姑且不管對方是知識分子與否，某些人和她身上具有的那種「正直感」更值得她去信靠。現在，說不定她跟我有相同的感受。我認為，透過生活方式互動所得的正直感，遠比知識分子操弄的意識型態更具重要的精神意義！

《戰時下の言論》全二卷（日外アソシエーツ，一九八二年）出版問世。今後的研究可運用這些戰爭時期的雜誌、論文、單行本的總索引。可惜，這本講義（在時間上）未能得其教益。

## 後記

一九七九年九月至八〇年四月，我得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贊助，前往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婁市的馬奇爾大學講課。我把前半的英文講義譯成日語，用口述的方式錄成卡帶，再請稻垣壽美子整理出來，便成這本書。

原講義的內容並未更動，現在覺得該補充的，都以注釋的形式加上。

講課自然會受到聽課者的影響。聽課者雖然只有十個左右，但面對這些反應熱烈的聽眾，是我過去在大學授課時未有的經驗。因此，我努力讓授課內容符合他們的要求。

在此，我要感謝這一年來教室的人：借給我場地的馬奇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保羅·林、山姆·努莫夫、烏德·格列斯，英文系約翰·隆茲利諸位教授，讓我享受蒙特婁快樂生活的馬奇爾大學史學部太田雄三教授，以及蒙特婁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管理員加藤典洋先生。



我是在美國度過十五歲至十九歲這段時光的。那時遇上美日爆發戰爭，我經由俘虜營，搭乘交換船回到日本時，已經滿二十歲。戰爭時期的日本對我衝擊非常之大。戰後在日本生活，我曾一度放棄英語，但後來興起再次藉由英文追述當時的衝擊，再試著把它譯成日文的念頭。我由此獲致了日文和英文在我心中對立和互助的經驗。

從十六歲到十八歲，我寄居在美國的楊格先生的家裡。無論是在戰爭期間或在戰後，我一直惦記著那段時光。這次我來加拿大短期講學期間，楊格夫人和次子查理斯·楊格（我的老同學）造訪蒙特婁，這是我們睽違四十年後的重逢。這四十年來，我希望能由這本書表現出來。

在我寄居時期，楊格先生一家共有五個人，現在只剩下楊格夫人和查理斯兩個人。在此，我要將這本書獻給：包括逝者（漢特夫人、克尼斯、南茜）在內的楊格先生全家。

感謝稻垣壽美子和高村幸治先生在製作本書時的辛勞。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鶴見俊輔

## 解說

加藤典洋（文藝評論家、明治學院大學教授）

正如作者在「後記」所述，這本書的前身就是作者於一九七九年至八〇年期間，在加拿大的馬奇爾大學授課時所準備的講義。上課的時候，我這「假學生」去充當旁聽生。同場的旁聽生還包括：邀請鶴見先生來加拿大講學的同馬奇爾大學的準教授太田雄三先生，以及在我上班的蒙特婁大學擔任兼職講師的兩名美籍日本研究者羅勃·李克特（現任和光大學教授）和亞蘭·沃爾夫（前奧勒岡大學教授）等。另外，在六名正式的學生中，辻信一（現任明治學院大學副教授）後來進入了康乃爾大學研讀。課程在秋冬兩季講授，教室的空間不大，頂多只能容納二十五人左右。

我是在鶴見先生來加拿大的前一年，由當時任職的國立國會圖書館派我到屬於法語圈的蒙特婁大學東亞研究所，負責擴充圖書設備的工作。在工作上用法語溝通，已經備感吃力，面對尚未聽慣的英文授課，我勉強只能聽懂一半。

鶴見先生每次準備的講義筆記都很嚴謹，而且通讀內容。偶爾，他會抬起頭來詢問學生「各位有什麼看法」，或在講到某個段落時被學生問起時，回答說「這個問題是如何如何」等。

從學期的後半開始，每次下課後，我們一行五、六個人沿著大學直達聖勞倫斯（St. Lawrence）河的道路，走進熱鬧的市街，來到一處叫「panpan」的咖啡館，品嚐咖啡、蛋糕，開懷暢談，無形中成了一種慣例。

十一月的加拿大，一到傍晚五點鐘，天空一片昏暗。街上盡是凍雪，我們時常一邊漫步，一邊聊談著剛下課後討論的問題。

至於當時我是如何出言為難和騷擾鶴見先生，但最後終於大開眼界成為溫順的「假學生」的經過，我在另處（〈鶴見俊輔——被誤解的權利〉）已有提及，不再贅述。簡而言之，聽過鶴見先生的授課後，我才深刻體會到大學的課程足以喚醒人的自覺！兩年後，我從加拿大返回日本，開始從事舞文弄墨的工作，直到現在我仍認為，而且把這個課程當作是所有工作的活水源頭。

這個幾乎未曾有過的、明瞭易懂，且廣泛探索日本近代精神史的講義，有部分是針對完全不瞭解日本的外國年輕學子所準備的。鶴見先生關心的是，日本近代史中有哪些經驗值得年輕加拿大學子的注目？就會為他們一一解說，而且通常是用提綱挈領的方式加以講解。

這本書總共探討了十三個題目，論述每個話題時，作者都以自己寫過的數本著作為基礎講述。這種事之所以可能，因為他不但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學識淵博的人，同時也是罕有的鴻儒之士。確切地說，在他的精神世界裡，從幼年時期到成為鴻儒之士的內在時間是連貫的。舉例來說，他四歲時蹲在路旁觀賞蒲公英看得入神時的情感，始終未曾中斷，一直延續到現在，化為現在的老年情境。（據作者說，他少年時期曾蹲在書店的櫃子下，拿起書本興趣盎然地耽讀了起來，會意過來時已經黃昏。）在觀察這樣的人物時，我有此深刻的領略。

綜觀日本的近代史時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一八六七年的明治維新；第二階段為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勝利為止的時期；第三階段為以一九三一年的日中戰爭為分界點；第四階段為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第五階段為一九六〇年的安保鬥爭前後。後

安保鬥爭的日本社會，就不屬於「精神史」，而是大眾文化史的範疇。若不這樣聚焦，就無法掌握到時代的脈絡。這就是作者的「概略」史觀，所以課程編排分為秋冬兩個學期，講授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的「戰爭時期日本的精神史」和一九四五年以後至現在的「戰後日本的大眾文化史」。作者關注的重點在於，如何看待日本主流文化向次文化過渡的社會轉變。誠如作者把「精神史」稱為 *intellectual history*，把「大眾文化史」稱為 *cultural history* 那樣，這語境既包含思想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同時也包含知識分子的歷史和大眾的歷史。於此，我不禁想起，以魚類為主食，但也追捕逃上陸地的獵物能力的魚類；這種魚雖說是魚，但卻可爬上陸地追蹤獵物。誠如作者所言，我們若不具類似的複眼同時觀視此二者，就很難探索日本近現代史的發展。而只要具備這種複眼，我們就不會把一八六七年以後近代的歷史，簡單地看成近代史，相反的，應該可以從日本列島自古以來「概略」書寫的歷史聯繫中看出端倪。

舉例來說，日本藉由建立滿洲國扶持傀儡政權的作法，是自古以來實際掌握權力的統治者在近代日本的首要發明，其後義大利、德國以及戰後的蘇聯和美國也加以仿效，難道這不是日本的始俑之舉嗎？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時日本人趁機殘殺朝鮮人的事

件，難道不是起因於一九一〇年「日韓合併」支配異族的事態以來、日本民眾漠然以待的「內疚感」的爆發嗎？此外「轉向」這種近代日本誕生的精神史概念，在看待二十世紀世界的動向時豈不助益甚大嗎？——這些都是作者提出的創見。相對於向來極端保守的史觀，作者都在本書中為讀者娓娓道來。

這本思考事物的範本，極具技巧地提供人在生存上、書寫和思考的探索。

在論述上，作者到底有何訣竅呢？

只要話題侷限在個人身上，就難免以自我為中心。也就是說，寫書人有時為了講一件事，卻因為自己意興過及，往往超出話題的範圍，而導致「偏離主題」。雖然論述事物不像「飯吃八分飽」的比喻，但言而未逮仍是重要的。因為沒講完的接著續寫即可，這就是作者論述的節奏。我們要猶如能輕快彈開指尖的鍵盤，或是如同樂意放手讓孩子離開身邊的母親一般，在不受自己思想束縛之下，與自己的思想訣別。作者雖然不曾這樣親口告訴過我，但我從作者的身教習得了這種訣竅。

我在大學教書以後，曾用這本書當教材講授過一次。那時候我講解得並不得當，可是我仍希望單純的如「外星人般」的現代年輕人能夠讀這本書。正像這本書對我有如此

意義那樣，相信對年輕的讀者而言，在他們進行思考時，它一定可以幫他們「帶到遙遠的入口」。在此一提，我的英文能力並不強，但我還是希望日本的年輕讀者閱讀最早為這本書所準備的英文版（英文版已由英國的書店出版）。例如，書中出現的「鎖國性」原文為self-containment，這句話還有「自我遏制」的含意。另外，李莉安·赫爾曼在書末所說的「正直」一詞，原文為decency（正派），由此可知，在指涉人的品格時，英文的語意顯然要來得切中要義。

歷經數年重讀此書，以前未注意的地方，現在卻覺得意趣盎然。在五島列島天主教的傳說中，聖經耶穌的故事被改成天父對耶穌訓示說：希律王（在伯利恆）屠殺幼兒都是因你惹起的，為了這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名死者，你要捨身犧牲！日本在藉由攀登文明階梯與外國接軌的作法中，其實仍存在著自古不變的「鎖國性」。因此與其輸入最新思潮突破鎖國狀態，群眾運動的萌芽反而來得較具破壞力。所有在鎖國體制中的任何抵抗，大都以鎖國中的鎖國型態出現，其本身也時常因尚未完成即告結束。「對此冷笑是容易的，但我們更應該面帶笑容地加以關注才是。」——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

鶴見先生講學期間寄居在一棟樸素的公寓裡。我們趁冬季學期即將結束的機會，

在公寓裡舉行了一場小型聚會，大家都在字帖上共同題字留念。只見鶴見先生於其題下《荀子》中「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的名言。意思是說，相信應當相信的，是誠實可信；懷疑應當懷疑的，也是誠實可信。

從初次借閱先生的講義筆記研讀，到回顧講課的全部內容，匆匆已過二十年，至今，我仍要感謝這本書對我的教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鶴見俊輔原著；邱振瑞譯．

——初版——台北市：行人，2008 [97年]

296 面；13 x 19 公分

譯自：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ISBN 978-986-83442-2-8

1. 日本精神 2. 第二次世界大戰 3. 日本史

731.378

96019409

*SENJIKI NIHON NO SEISHIN SHI, 1931-1945*

by Shunsuke Tsurumi  
with commentary by Norihiro Kato

© 1982 by Shunsuke Tsurumi  
Commentary © 2001 by Norihiro Kat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82  
by Iwanami Shoten: Tokyo.

This Chinese (traditional)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2008 by  
Editions du Flâneur: Taipei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Iwanami Shoten: Tokyo.

---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原著者：鶴見俊輔

譯者：邱振瑞

總編輯：周易正

執行編輯：宋玉雯

文字編輯：姚立群、楊惠芋

美術編輯：黃瑪琍

印刷：崎威彩藝

定價：340元

ISBN：978-986-83442-2-8

2011年01月 二版一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者：行人文化實驗室

發行人：廖美立

10049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20號10樓

電話：886-2-23958665 傳真：886-2-23958579

郵政劃撥：50137426 <http://flaneur.tw>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2-89902588

# 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鶴見俊輔

ISBN 978-986-63442-2-8

00340



9 789868 344228